

20 世纪 60—80 年代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历史回顾 国际研讨会会议记录

3 月 24 日会议记录

党研室领导致欢迎词

尊敬的各位会议代表，各位来宾，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历史回顾国际研讨会现在开始，在这个简短的开幕式上，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各位领导和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各位代表，参加开幕式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有，孙英主任，王伟华副主任，谷安林副主任，我们还有一位张启华副主任，她晚一点到，正在路上，李忠杰副主任，黄修荣研究员，黄小同研究员，室务委员、科研管理部主任。以下我依次介绍参加会议的各位代表，沃伊泰克马斯特尼，北约华约平行史项目主任；李向前：中央党史研究室政党政治中心主任；沈志华，陈兼；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俞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研究员；李丹慧：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叶桐，前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陈德来前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朱安康，前中国驻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大使，罗文：波兰国际事物研究所前中国处主任，范成祚，前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李凤林前中国驻保加利亚、俄罗斯大使，罗明，原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施罗德，前东德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白寿绵，前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刘彦顺，前中国驻波兰大使，马尔科姆·伯恩，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副馆长，卢西，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助理教授，谢尔盖·拉琴可，伦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谢菲尔，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奥斯特曼，威尔逊中心冷战室项目主任，文安立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我是章百家，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三部主任，下面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致词。

孙英：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来宾，我十分荣幸的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欢迎各位来参加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历史回顾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政党政治研究中心，与在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北约华约平行史项目联合举办的，并且得到了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项目的协助，回顾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国与东欧各国关系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加强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一部分是当年中国和东欧国家外交官，他们都是资深的外交家，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另一部分是中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通过亲历者的对话，通过当事人和历史学家们之间的对话，与会的各位一定会加深对这一时期许多重大事件的了解和认识。作为东道主我预祝这次国际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以下呢，请允许我简要的介绍一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基本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 1980 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研究机构，负责相关的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内部设有三个研究部，第一研究部负责研究 1921 年到 1949 年的中共共产党的历史，也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的历史，一共是 28 年。第二研究部负责研究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段历史，第三研究部负责研究 1978 年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此外我们还有三个专门的机构，一个是政党政治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外国政党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这次会议就是由这个中心来主办的，另外两个专门机构，一个是负责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一个是负责中共党史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此外呢，我们这个单位还有一个杂志社，这个刊物的名子叫中共党史研究。另外有一个出版社，是中共党史出版社，主要出版相关的中共党史的有关的图书资料。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共有工作人员 200 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也就是教授副教授有 51 人。有博士 12 人 硕士 53 人，学士 59 人。20 多年来我们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共党史的专著和论文。还和其他单位合作，开设了一些专题的电视片，我们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 70 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简史等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的和和社会的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目前的北京正值早春和风吹拂，春光明媚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再次祝愿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各位健康愉快，热忱的欢迎所有的朋友以这次合作为起点，能够保持与我们的亲密而友好的联系，谢谢各位。

章百家：下面请苏黎世大学北约华约平行史项目主任致词

沃伊泰克马斯特尼：对于我们北约华约平行史项目来说，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和中国的学者共事，我就接着孙英主任的话，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北约华约平行史项目，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一些成果，我们的这个平行史项目，是 5 年前就是 98 年成立的，组创者有好几个人，当时我们是在冷战研究项目工作，当时我们在做一些研究，之后也在本次项目中扮演了许多重要的角色，那么这儿就有来自华盛顿国家档案安全中心的波恩先生，还有维也纳国防大学的代表，我们还有别的与会代表，他们有的来自西欧，其中最重要的是挪威奥斯陆防务研究中心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冷战研究中心的代表我们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时在布鲁塞尔冷战研究档案开始公之于众，当时我们还得到了瑞士方面的帮助，他们得到了北约和平伙伴项目的帮助，帮助我们进行有关历史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是要研究国际关系和安全网络下的一些问题，而这个安全网络是一个关于安全问题的数据系统，他是要从开放的档案中获取资料进行研究，我们这个项目开始时，我们希望关注北约史的两大集团，一个是北约，一个是华约，我们希望可以平行研究这两大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名称中有平行这一个字眼，我们当时还希望能够把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的学者，都代入到我们的项目中来。自 8 年前我们的项目成立以来，我们已经找到了大约 20 个协作机构，他们或是研究所，或是学者自己组成的研究小组，他们来自北约和华约的成员国，此后我们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研究了北约和华约的演变的历史，我们许多研究成果在我们的网站上都发表，我这里特别想强调我们这个网站，它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用于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最主要的是希望这些文件，一旦公众可以获得，就把它放到网站上，让公众查阅，让学者研究，我们会把它用它原先的语言，把它放在网站上，之后还会把它翻译成英语，在准备本次研讨会的文件时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你们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关于东欧和中国在 60 到 80 年代历史的一些档案，尤其是来自东德罗马尼亚，捷克，和保加利亚等国的档案，我们还组织过一些会议，这些会议涉及的是北约和华约两个集团在冷战时期的对立状况，就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大会，我们是涉及了双方的一些评价主义和战争计划，那次会议是在挪威召开，会议的文件集也即将发布，今天的这一次研讨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这也是我们这个平行史项目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既请到了原先涉及双边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大使和官员，让他们相互见面，并且还请到了学者与会。这对我们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但是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我想提近几年我们所召开的一些会议，关于古巴导弹危机这和苏联

美国和古巴官员一块召开的，他们之间可以和学者进行互动，之后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项目，它牵涉的是关于卡特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美关系，还有关于苏联侵略阿富汗时期的，所有这些会议，我们都希望把当时的当事人带到会场让他们相互见面谈话和历史学家谈话，让他们带来一些当时的文件，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议所遵循的一些前例，下面我想大概说一说，我们这个研讨会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并且感谢参与组织本次研讨会的一些人士。

我们这个想法是两年前开始的，当时我访问中国，我和陈起华副主任见面谈话，当时我们就看有没有可能去举办一个研讨会，关于亚洲的冷战情况，以及华约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情况，能够把当时的外交官参与进来，然后是在6月份的时候，北京大学也赞成这一个想法，它到我们的一次年会，那是在苏黎世，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小组，我们准备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党史研究室的参与，他们愿意做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因此我们非常感谢章百家研究员谢谢你给我们的帮助，以及您所代表的党史研究室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的参与，在过去一年中，我频繁的和李向前研究员有接触，每天早晨我打开我的邮箱的时候就希望见到他的邮件，而且经常我可以收到他的邮件，他会让我当时那一天过的非常愉快。在这儿我还想提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这儿见面，还是因为，许多机构的参与，这也得益于互联网，因为我们的这个会议，如果没有电子邮件是不可能召开的，因为直到昨天可能我还没有见过绝大部分的与会代表，我们当时还没有与我们中方的主办者见过面。但通过互联网，我却觉得，我实际上早已和大家相识了，那么我还想感谢我所在的机构，也就是北约华约平行史项目，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东欧国家去找到合适的与会人选。而且他们所找到这些与会者，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当时的一些很珍贵的史料，他们中有很多默默无闻，但是我还是想感谢他们，这儿我还想提几位，他们对于本会议的召开，也做出了很多贡献，首先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立先生，他答应我来主持这次会议，我这儿还想透露一个小秘密，那就是他还是我们前次一个研讨会的协调人，那是关于阿富汗的一个研讨会，那么当时我就向他提出邀请，他很愉快的接受了邀请，我这儿还想感谢贺氏波格博士，他来自华盛顿大学，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他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前身的一个组织者。他在布达佩斯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他和他的同事在那里做出了一个先期的准备工作，帮我们调查了东欧国家的一些档案，主要是关于在60年代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方面的档案，和在布达佩斯那次会议上，有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你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得到。

本次研讨会我们将关注60年代之后的那段时间，主要是70和80年代，当然我们也会谈及60年代的双边关系，最后我还希望感谢奥斯特曼先生，他是威尔逊冷战中心的主任，他帮我们翻译了一些我们找到的文件，我想说的是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翻译工作要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把文件从罗马尼亚语翻译成了英文，同样翻译了的还有保加利亚方面的文件，从德文翻过来的文件，那么在这方面我还想感谢，尤其是谢非尔夫妇，他的夫人帮助我们把这些文献从德文译成英文，我们还会从捷克翻过来的文件，本次研讨会可能不会用到，但是在这之后这些翻译，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发布，但是我们这次研讨会所涉及的不光是那些文件，还有那些当时当事者他们在当时所做的话一些记录，我们的这一个项目还一直致力于各方可以公布更多的文件，尤其是中方，我们这次开会，时值中国外交部首次开放档案，本次研讨会所涉及的时间段，可以称作是中苏关系的最低潮，但之后结局很圆满，冷战结束了，在70、80年代的时候，也是中美建交的时代，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得一个成就之一，在70年代后期，西

欧就进入了与中国关系的事业，中国和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也同北约发展了关系，这方面我们可能以后也会谈到，所以我期望通过本次研讨会，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理解，70、80年代的一些事件，为何发生如何会发生我们还可以得到各方的一些意见，知道如何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本次研讨会最终将涉及80年代末冷战结束时期，本次研讨会都会录音，那么我希望，通过和中方的合作，能够记录下我们这儿的发言，并且经过编辑，能够以后以中文和英文同步发表，至于我们的英文发言，我们希望能我们的网站上发表编辑过的英文发言稿，而且也希望由苏黎世的安全研究中心进行发表。供国际学者参阅，最后我想说，我希望20、30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次研讨会的时候，各位学者会把本次研讨会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冷战时期的历史，就好像现在我们回顾70、80年代历史的时候，也认为当时是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样，最后呢，我希望代表北约华约平行史项目，向中方东道主表达我们的感谢，希望我们的研讨会能像我们面前的这些花一样，能够常盛永开。谢谢。

章百家：最后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政党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前致词。

李向前：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刚才孙英主任和马斯特尼先生已经做了精彩的致词，现在我代表党史研究室研究中心再讲几句话，作为中方会议的协调者，我想这次会议能够顺利进行，有许多人需要加以感谢，首先我要感谢马斯特尼教授，还有沈志华教授，牛军教授，是他们在2、3年之前开始提议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我还要特别感谢沃伊泰克教授为准备这次会议所花费大量的心血，从邀请的与会当事人到学者，到会议提供大量的档案，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我们全体与会者，以及我们政党政治研究中心，将从这些新鲜材料中，获得重要的学术资源，不断推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还要感谢，威尔逊国际交流中心，冷战室项目中心，奥斯特曼教授，和华盛顿大学冷战室项目的詹姆斯教授，这次会议得到了他们的有力支持，其次我要感谢每一位参会者，特别是我们资深的当事人他们有的年事已高，有甚至还带着病痛却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我们这次会议，并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使我们深受感动，我相信，有当事人之间的对话，有当事人和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将是非常丰富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他们给了这次会议以全力支持，我们在为这次会议做准备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使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会议的筹备工作，我想我应该代表所有会务人员和后勤人员，向支持我们工作的领导们和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致意，当我们这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共同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我们的宾馆第一次迎来了外国客人，我们新建的这个学术报告厅第一次用来召开国际研讨会，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我们政党政治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我期待着通过这些第一，将迎来我们党史研究室，更多更富有成效的学术活动，也希望国内外的学术界支持我们，关注我们，祝会议取得成功，谢谢各位。

章百家：我们的开幕式就到此结束。下面我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是开幕式以后请大家到我们大楼前面去照相合影，我们每位正式代表前桌子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家照相时所站的位置，请大家看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然后合影以后，我们有一个短暂的茶歇，我们的讨论会预计在10点15分进入我们的学术讨论，讨论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穿便装。现在请大家到楼前去合影。

章百家：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讨论会的第一个议题。我们的讨论会是从这一节从10点15开始，到12点结束。我们有一小时45分钟的时间，在开始以前，我请阿诺先生，就我们会议的一些注意事项讲几句话。

阿诺·威斯塔特：我的好朋友我的新朋友在北京，这个会议很重要的，但是很困难的，本次会议很重要，因为这是北京第一次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我们的这个议题很难，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些话题，他们难度很大，有些话题呢，在今天看来还比较难处理，因为它涉及面很广，今天到场的当事人很多，但我却要讲，这没准是的好事，因为这样就需要我们去克服这些挑战，就像刚才我们在开幕式时候说的，我们想要迎接这些挑战，我们就需要直视历史，去探讨当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并且试着从中汲取教训。马斯尼在他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将有两位协调人来引导我们的这次会议，中间会涉及到当时的有关各方，我从中得取的一个教义就是呢，章百家先生和我在这儿，将会给每一个想发言的同事以发言的机会，这样来说，我们在时间上就会有一些限制，每一次会议的开始的主旨演讲，每一个人不能超过 15 分钟，所以比如说在第一节会议中，李凤林大使和罗明大使，每个一个人最多都只能发言 15 分钟，在此之后呢，其他的与会者那么我这儿的与会者是指当时的当事人，我们的前大使，即指中方，也指中欧国家的前大使，我们会邀请你们作出评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这儿有一个创举是罗文斯基先生在前一次会议当中发明的会议的开法，就是你可以举起您一根手指，来表示你想做一个最多 3 分钟的一个概要的发言，如果您想问的是一个很简短的问题，是针对前面的发言提一个问题，那你可以给我们看您的两个手指，这样您就可以直接向您的前一个发言人提问。不知道大家都听清楚了没有。好的，本次会议就将按这样的开法来开，从主办者方面考虑，会议不会延期，到时候我们的这一节会议就会结束，那么可能不是每一个想发言的人，都有机会发言，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会记录下您的姓名，这样可以在下一节会议时，优先安排您发言。对于到场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你们的作用是向我们的当事人提出问题，希望你们的问题能够简短到位，这就是本次会议的规则，我们会首先听各位当事人发言之后，学者会提问，那么之后双方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好的，现在我把话筒交给章百家先生。

章百家：下面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的主旨发言人李凤林大使发言，我们第一个议题是中苏分裂背景下的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

李凤林：两位主席我非常荣幸做第一个发言，希望第一个发言能够不至于开一个坏头，中苏关系分裂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我想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作为背景，需要首先讲一讲中苏关系，对于中苏关系分裂的原因，冲突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想非常简短的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很概括的讲这么样几点，第一点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以老子自居指挥一切，谁不服从就施加压力，扣大帽子，甚至出兵干涉内政，中苏分歧早在 1921 年中共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毛泽东采取了容忍忍让的态度，分歧尖锐化的导火线是 1956 年的苏共 20 大，开始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没有采取说理的方法，而是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的关系方面，其中撕毁原子弹合作的协议，撤退专家这两件事情后果最为严重。

第二点，中方曾经几次妥协，局势几度缓和，但是苏方没有采取回应的行动，从而失去了几次改善关系的机会，这几次机会我指的是 1957 年 1960 年和 1965 年，毛泽东一直不愿意中苏分裂，最近公布的一些毛泽东内部的讲话可以证明，而苏方则坚持一贯正确，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对中苏的分裂双方都有错误，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双方都谈了一些空话，在对话政策方面，中苏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处境不同。所出现的问题本来可以协商解决，但是苏方要求中方服从

苏联的全球战略，容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这是错误的。而中国当时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完全否定，也是错误的。第四点，毛泽东赫鲁晓夫两位领导人的个性，对中苏分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关于中苏分歧。第二点中国同中欧东欧八个国家的关系，总体上都是受制于中苏关系，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关系的基本的态度，是以苏划线，由于这些国家对中苏分歧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中国对这些国家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五国同苏联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是反对苏联的，罗马尼亚是调和的，南斯拉夫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中国开始反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70年代中国同南斯拉夫又在共同反对苏联的基础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阿尔巴尼亚最早站出来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中阿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但到了70年代阿尔巴尼亚对中美关系改善不满，而批评中国的修正主义。中阿关系破裂了。罗马尼亚对中苏分歧保持中立的态度，中罗之间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如果把中苏关系，中国同东欧的关系放在当时整个国际关系大背景下观察，应该指出中国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国家安全。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几次调整，其核心动因，都是国家安全。也就是确定对中国的威胁来自何方主要的是中苏美三角关系的问题。1965年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以后，到1969年中国同时反对美苏两霸，叫做反帝必反修，到7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的降级，每个明显表现出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而苏联却采取了一系列威胁中国安全的措施，对此毛泽东提出了苏攻美守的态势，提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一条线一大片的反苏统一战线的设想。公开的提法是反两霸侧重打击苏修。对于防止外敌对中国可能进行突然袭击，中国是做了认真准备的，早在1964年总参谋部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并且成立了工作组，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西方传媒散布苏联可能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中央军委8月28日发出了备战命令，9月召开了全军的备战工作会议。10月8日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我想谈几件具体的事情。

可能有助于判断当时形势的发展，珍宝岛事件的时候，我在驻苏联使馆工作，当时国内传来的消息是说黄总长，当时的总长认为中苏必有一战，大打中打小打，中打是肯定的，但是使馆的看法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不会进攻中国，还可以举一件事情，但是在1997年，我在莫斯科同俄罗斯边防军总司令尼克拉也夫大将有过一次谈话，谈到1969年的边界形势，他当时在中苏边界虎林的对面任团长，他说苏军没有进入备战状态，当时得到的指示是严密监视对岸的动向，另外有一个苏方解密的材料，这是1969年8月15号苏联总参情报部向苏共中央每日呈送的关于中国的部分，有这样的一个报告，我引用这个文件我从俄文翻过来的，本年8月14日，与苏联蒙古毗邻的边境地区，中国军队的战斗部队组成，部署和行动均未发生重要变化，同时我还可以讲一下，林彪一号命令之后，中苏边境中国一方进入一级战备，当时我们有些边防战士的反应，是叫做鸭子凫水，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鸭子凫水的时候，两只脚很紧张，但是身体很平稳，这个意思就是战士想说明，你们上边折腾我们，要我们备战，实际上上面是很平稳的。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我想举这件事情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中苏双方都是担心，对方可能发动进攻，可以说明双方当时对形势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那么至于这个时期，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利用矛盾孤立苏修这就

是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的理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有两个中间地带，但都是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第四最后，1979年以后，中苏关系进入正常化的谈判时期，从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大家知道的三大障碍，可以看出早已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消除对中国的威胁，中国要为和平建设创造有利的和平环境，那么在这个时期，中国同东欧国家本来就没有厉害冲突，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很自然，而且东欧国家都走在了苏联的前面，谢谢。

章百家：下面我们请罗明。

罗明：今天我要谈的这个话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对于政治家来说是非常富有教义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过去30年中国际关系中的发展和变化，在这儿不可能谈到当时所涉及的所有时间，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如果都谈的话只能谈的非常泛，但既然我们所探讨的几乎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所有双边关系，我们就不能忽视为什么当时的关系，被人们认作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人曾说，这种新型的关系，是在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中建立的，在这些国家中争论和冲突是不可能的。这些国家都有共同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都信同马列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国际大同，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石就是对于苏联的忠实，在当时的那个体制下，各党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对于国家间的关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制度，应当是为各国间的关系树立一个典范，当时大家想这一最终将引致社会主义遍布全球，并且取代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在国家间关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也并非偶然。

当时一党指责另一党是教条主义，对于国家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最基本的原因，就引发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一致行动，那些就是历史。而且当时的那些形势，还非常的模糊，非常的不准确，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且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无法使用于当今的世界，更糟糕的是，当时的那些关系并不能使争论和冲突防患于未然，逐渐间国家间的教条主义关系不存在了，是法制重新规范了他们间的国家关系，在政府间关系中，物质的力量比政府的想法更重要，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现在很有必要谈及当时人们把苏联当做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对于如何构件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如何发展经济是至关重要的。苏联还被视作是解放了所有的东欧国家，并且对于中国东北的解放也贡献良多，我们还应当记得，中国当时没有顾及雅尔塔协定中规条，还是称呼自己为一个人民共和国。并且愿意遵守国际法的所有国家建立关系，当时中国是倒向苏联的，但是这是在华盛顿无视中国发出的善意举动之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还有必要记得，就像阿尔巴尼亚，当时南斯拉夫也刚刚摆脱了德国人的占领，罗马尼亚刚刚和轴心国开展，并且和苏联军队一道把自己国家从德匈占领中解放出来，我们还应该记得，在过去那些年中，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个人经历，对于当时的情形有不同的判断，我的观点是，当时的中苏分裂，并当在上述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它好像中苏之间的离婚，换句话说，是中国放弃了它在宣布自己在人民共和国所承担的那些义务，和处于奴役的地位的那些职责，而转而争取到了这样一个地位，在一个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小弟弟，实际上呢，中苏分裂始自60年以前，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中苏之间的论战，在之前就发生了。他是在56年的时候，当时涉及到重新评估斯大林，以及匈牙利和波兰当时发生的事件。

此后还发生了对于当代修正主义的大肆批判，当时最大的错误就是向美国示好，以及和美帝国主义者合作，同时我们还应当记得，当时的那些分歧，那些争

论和那些冲突，在社会主义国家间逐渐积累起来，这是自 50 年代开始的，而且之后可能会影响到那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在那些年中，中国被美国和他的盟友放逐，有禁运有各种各样的威胁压力，没有办法收复台湾，没有办法加入国际组织，所以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觉得，有必要摆出一强硬的外交姿态，而当时苏联是和美国冷战的前锋，他非常希望和中国接近，所以在那么一个大背景下，从中方来看呢，南斯拉夫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员，当时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稀少，而阿尔巴尼亚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帮北京发出声音，其他的东欧国家和中国只是保持了一般的关系，但是呢它们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牵扯到了双方在经济商业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中苏分裂持续了很长时间，结束是在 70、80 年代之间，历史应当记得，当时应当有一个中苏同盟友好合作条约，那是在 50 年 2 月 14 号签订的，但是后来没有得到遵守，历史还应当记得，当时苏联被认作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代 表，是和美国站在一边的，都是帝国主义的代 表，它已经不在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员，历史还应当记得，中美开始恢复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开始和世界其他国家建交，也是在当时发生的。历史还不应该忘记，中国之后恢复了它在国际组织中应有的地位，并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恢复到了世界历史政治舞台，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 1960 年的时候，这也是本次研讨会开始讨论时间的起点，在 60 年的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然除了南斯拉夫之外，都是挺好的。党际之间有正常的交往，政府机构之间有正常的互访，并且在国际组织和会议中都有很好的合作，中国和当时东欧国家之间的商贸往来，在中国的外贸中也占了很大的地位，双方的经济合作都致力于使双方共同实现工业化此外在科教文卫方面，有很多合作项目，还交换了留学生和运动员，当时的双方的政府都觉得这样的关系，非常合适。中苏关系分裂在 60 年代发生的，当时发生的许多非常重要的事件，他们逐一发生没有间隙，开始的时候发表了列宁万岁的小册子，在 60 年的时候，但到 69 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中苏边境冲突，后来这一冲突，既涉及到马列主义的问题，也涉及到了党纪和国家间关系的问题，这一进程因为中苏之间的一些争吵，而变得非常的复杂，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些国家对中苏论战的话题的看法而受到影响，而更多的是受到当时的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看法的影响。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受到指责，说他是搞修正主义，但是自 1964 年修天以后，人们对他的态度就变了，当时社会主义大家庭反对召开 26 党的会议，这是为了惩罚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他愿意和中国共产党一起，这是自 1960 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他不光赞成北京的看法，而且也愿意共同反对前苏联的共产党。所以中国一直把阿尔巴尼亚视作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给了他大量的援助和贷款，以帮助阿尔巴尼亚发展它的经济和社会。

罗马尼亚共产党希望避免当时涉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他们希望能够结束中苏之间的论战，并且和双方都构件正常的国家关系，所以中罗关系只是受到了中苏论战很少很少的影响，而且在 1968 年之后，双方的关系发展非常好，在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那些当权的政党，不同程度上都跟随着前苏联他们都批评中国共产党，并且都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他们态度的结果，在 64 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方面就减少了他对上述国家的批评，也并不它们视作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直到 80 年代初期才恢复，尽管发生了上面这些情况，上述所有国家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以重新恢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

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到那个时候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的一般的关系了。是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它主要的考虑不是教条主义方面的考虑，而是各国的国家利益谢谢。

章百家：谢谢两位主旨发言人，他们非常好的掌握了时间，这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哪位先生愿意提出问题。

提问：谢谢两位大使，你们讲的都很好，我对李大使有一个问题，您讲到69年的情况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学者有了很好的介绍，我所感兴趣的是，早期的79年的时候，中越之间有分歧，有几千的人派到了中蒙之间的边境，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家对这个情况都不太了解，那么我对苏联在79年这个行动有什么看法。

提问：非常感谢，你们谈的很好，我有一个短的问题，给李大使的问题是，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开会的时候，马斯替尼教授提到了我们从波兰方面找到了很多文件，并且把它翻译出来了，这是在关于57年到64年的中波关系的，这是当时东欧方面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记录，从记录中我们发现，中国在56年的时候是支持波兰的，所以在中苏分裂的时候，波方应该支持中国，应该同情中国，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员在当时觉得他有多大的机会，可以把波兰或者其他东欧国家从东欧和苏联的国家集团中分裂出来，但好像当时中方的努力不太成功。

卢西：非常感谢你们当时的发言，我想问，罗明大使，我很感兴趣在64年的时候，有两个罗马尼亚的代表团，当时在三月份和9月份的时候访华，我们对于第一次访问所知甚少，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第一次代表团访华时候会谈的主要内容，以及他们的成果。谢谢。

阿诺：我想再说一点，希望所有的发言人都能说话清楚，慢一点。并且能对着话筒说话谢谢。这样可以使我们的会开得更顺利。

提问：李大使刚才您提的两件事我觉得非常重要，可能我没有听清楚，一个是1964年你说总参报告的具体时间，第二黄总长的意见和当时大使馆的意见有分歧，黄总长的意见是什么时候提到，你们大使馆接到的。

章百家：我们还是先请两位大使做一个回应，不然的话问题太多。

李凤林：苏联在蒙古驻军的问题，这个问题总体来讲，中国方面非常关注，而且这个问题呢一直在后来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成为中苏之间改善关系的一个重大的障碍。这个问题我想可能会有另外的机会专门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我们这次会议要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同波兰的关系，这里我想讲那么几点，第一，就是早期1957年，在波兰事件的时候，中国确实是支持波兰的，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发点，就是反对苏联的老子党的作风，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这是第一点，这就是中国当时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兄弟党之间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不是老子党的关系。第二点就是说，因为我讲到了一个中国当时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区别对待，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据我了解，中国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努力，要把一些国家从苏联的阵营里面分裂出来。相反，中国方面对东欧这些国家是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比方说，在公开论战里面，尽管这些国家包括领导人，对中国方面都有过不少的批评，但是中国方面，无论是领导人，无论是报刊，从来也没有指名批评这些国家，更没有批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这是第二个问题。沈教授提的问题，我想特别强调一点的，就是黄总长的这个说法，不是正式的文件，而是通过私下的渠道，传达的一种信息。所以这个只能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另外不可能有任何的文件。

沈志华：大概几月？

李凤林：珍宝岛事件之后。

罗明：我试着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那是关于 64 年时候访华的罗马尼亚代表团的问题，3 月份的时候第一个代表团，之所以能够成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之间，在 64 年年初的时候有了沟通，我想那应该是在 1 月份的时候，那是我方的大使，和刘少奇副主席的会见达成的共识，在那个之后呢，因为双方有想法要有一个会谈，来探讨当时国际工运中的一些问题，罗方领导人决定派一个代表团，是由当时的总理率领的，当时代表团的成员，还有部长委员会的副主任，以及党的秘书长。我记得我参与了访问的安排，我当时是一名翻译，当时访问最主要的目标，或者说唯一的目标，就是试图防止中苏之间继续公开的论战，因为我们当时说法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澄清双方所有的分歧点，两个很大的党很难说清楚所有问题，那么我们这些小党就更难做了。而且当时我们没有时间，因为国际工运在当时的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所以罗方代表团访华的时候，我们试着阻止中苏论战，那么其奥赛斯库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并且希望能够终止中苏之间的论战，但是我们方一个代表团成员，作为他的个人努力呢，他提到了我们和苏联的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是关于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一些问题。他说呢，我们和苏联在这方面有非常严重的分歧，但是我们不会把它拿到大街上来说，并且不会公开与他们争论。之后我们另一位成员，就提问了说，提到了南斯拉夫问题，并且向中方领导人建议，重新考虑对于南斯拉夫的态度，并且考虑到，南斯拉夫在这么多年一直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态度。这一点对于我们也特别重要，因为南斯拉夫就紧靠着我们，所以从地缘战略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劝说努力没有成功，当时我记得毛泽东主席说，你没有攻破我们的堡垒，你没有进到我们的家里来。但是谈话的结果是很积极的，我们之间开始了对话，之后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和中方讨论这些问题，就像刚才在我发言中提到的，我们当时争论的那些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还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都是这样，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时一方对另一方的态度，中苏之间双方的态度是更重要的。那么至于罗马尼亚第二个访华代表团，我想说的是。

我希望提醒各位注意，开始的时候中方领导人决定只邀请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来访华，来参加国庆庆祝活动，但是两周之后，我们又收到了另一份电报，说中方会邀请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派遣他们的代表团到中国参加中方的国庆活动。所以我们就派出了一支代表团，那么就我的记忆所及，当时东欧的所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派出了代表团，但是大家都记得，罗方派了代表团，因为这次访问在当时来看非常重要，而且在三月份的访问之后，中方又派了一个代表团是由李先念同志率领的访问了罗马尼亚，而 10 月份的时候我们方代表团又再次访华，第二次罗方的代表团，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而且谈话的气氛是非常积极的。

章百家：第一呢，请大家注意，我们有许多当事人，请大家的问题，不要仅仅集中在我们的两个主旨发言人身上，第二点，我们的讨论会的议题，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如果有涉及其他时间段的问题，请到那个时候再提出来。第三点，就是现在谁和上面的问题有关的比较简短的问题可以首先提。

陈兼：我有两个简短问题，李大使和罗明大使所讲过两个问题，有一个是 1969 年李大使还有其他大使参与的话，中苏分裂，中国同东欧国家一些国家的关系，特别同匈牙利的关系，在 1970 年有所改善，比如在贺电当中称呼同志，给他捐款，当时出现，这个有时间关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罗明大

使，因为现在中国和罗马尼亚关系当中，有两个问题与您刚才谈的有关系，一个在 1967 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当时会议主席，曾经访问中国，提出要不仅对中苏关系要，而且对中美关系进行调停，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进一步的说法。第二是在 1971 年 6 月，其奥赛斯库主席访问中国，那么这一个在当时认为，同中苏分裂以后的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不知道在这一方面，罗马尼亚方面，特别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后有什么关系。

李丹慧：我想给罗明大使提一个问题，这个和单元的议题有关，中苏分裂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我们都知道，1968 年 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了一个招待会，8 月 23 号周总理出席，并且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给苏联扣上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帽子，这个会本来中方是决定让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出席的，后来临时换成了周恩来，我不知道罗马尼亚大使馆什么时候知道，是周总理出席这个会，第二个问题，周总理出席这个会，肯定代表中国方面阐述中国当时对苏联的立场，而且肯定是很严正的立场，那么当时出席招待会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使，也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不知道就是罗马尼亚方面，对这个是是否有所考虑，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个，我想给那个刚才学者，他提的那个，就是中越第二次战争。

牛军：我的问题跟李丹会的问题有一些就是很接近的，在我的印象中，在苏联在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实际上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都曾经向中国方面表达过他们的立场，我认为实际上，这两个东欧国家对苏联侵略捷克的发展，其实对中国领导层认识这个问题是有影响的。

章百家：大家提问的时候一定注意，你们的问题是不是和这一节有关。

俞邃：刚才罗明大使谈到了在中苏分歧分裂的过程中，东欧各国的态度不一样，这是符合实际的，我想提一个问题，不仅请罗明大使回答，也请在座的原来的东欧驻华大使考虑一下，在波德保几个国家，是跟随苏联敌视中国的，当时这些国家领导集团内部，是不是在苏中关系这个问题上，跟随苏联访华，有没有分歧，有没有档案材料来说明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这个请罗大使和其他有关大使，我还想知道，当时因为这些国家，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也是不满意的。那么怎么处理呢，既要跟苏联反华，又要发泄自己对苏联同志的不满，我想是有分歧的，我想能够听到一些，有关档案资料方面的材料。

老外：我有一个问题，那是根据李大使的问题提出的，他提到当时对于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的这么一个考虑，那么当时在可进和周恩来会见的时候，是中苏双方开始谈论他们的边境谈判，当时苏方提出了一个草案，是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当时中方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最后没有签署这样的协议谢谢。

老外：给罗明大使的问题，在 66 年的 5 月或者是 6 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据苏联领导人说，当时这个访问没有成行，当时斯库和周恩来有许多交流，你当时的看法是什么。

提问：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是首先是我想指出，我们已经得到了罗方当时访华的档案，我所指的是第二次访问的档案，另外我们还得到了当时 68 年 8 月份的时候，中方的使馆发送的电报，所以我希望可以和中方当时的记录有一个比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1964 年 1 月份的时候，罗方和刘少奇谈话的记录，那么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一份记录，但是我的问题是，在赫鲁晓夫 64 年 10 月份下台之后，中方的期待是什么。东欧方面的期待是什么，你们会觉得苏方领导人的更迭对于中苏的分裂有什么影响，我们从东欧方面传来的档案是说，周恩来在 64 年 11 月份访问了莫斯科，希望能够改善中苏关系，当时在谈话之后他非常的

失望谢谢。

提问：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接连发生，我们知道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是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但是紧接着，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中共中央转变态度，支持甚至劝说苏联去武装干涉。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急剧的转变，不知哪位中国的外交官能够做一个解释。另外据我所知，在波兰事件发生的时候，波兰大使馆主流的意见，包括主要的领导的意见，对事件性质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事件，所以应该采取镇压的或者支持镇压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有不同的意见，据李深知回忆，比如说像新华社的谢文清他们认为，不是反革命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所以呢，大使馆最后把不同的意见，都报到中央来了，中央采取了后面一种判断，那么与前一个问题相联系，为什么对匈牙利事件判断就完全的相反，是认识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不知道怎么来解释和说明。当然也影响了中共对这些事件的政策。好谢谢。

罗文斯基：李大使你说介绍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我想问你，关于1969年3月的报告以后，是大概8和9月修正的，中苏打仗的可能性，不过起码时间很限制，我们还回到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我不完全跟你同意，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第一个阶段，我在中国工作，我应该说，那时候中国不帮助我们，在我们跟苏联很多问题，我记住我离开华沙的时候，我的外交部长给我们说，这是65年，……。实际上从1965年底，或者从1966年，我知道这是内部的情况，一直到69年中，你们实际上用一切的方法，把我们跟苏联团结在一起。谢谢。

提问老外：我想补充一个，我非常高兴李先生所提出的看法，我认为呢，把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一律看待是不对的。

章百家：我想先应该请两位大使作一个短暂的回应。

罗明：首先我得承认，我不能特别记得刚才都问的哪些问题，首先呢，我想说刚才提到在67年的时候，我方有一个代表团访华，我想说的是，那不是个正式访问，在68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代表团，是由我们不同的领导人率领的，共有三个代表团，当时我们访问的越南，当时他们得到了这么一种看法，就是要帮助越方和美方要进行沟通，我们这个代表团，在北京过境，有两个代表团曾在北京过境，在当时呢，罗马尼亚方面，已经会见过美方的代表，还见到了美国政府的其他的官员，得到了一些消息，而这些消息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是有帮助的。虽然当时我的职务不是很高，我当时是驻悉尼的总领事，但是我自己也会见了美方的人员，他们也跟我提出了这些问题，那就是，罗方是否愿意帮助美中达成一个对话，我说好的，而且我自己也对此作出了贡献。至于71年其奥赛斯库的访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在6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罗马尼亚非常严正的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发表的言论的资助，我们很受鼓舞，那是在我们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所发表的一番谈话，在此之前呢，周恩来总理还和我们的大使有了交谈。当时给我们的，他们中方的支持的信息更为积极，中方给我们的支持成了我们此后立场的一个根据，帮助我们修正我们对于68年捷克事件以及对于苏罗关系一个看法的依据，之后在70年的时候，部长委员会的副主席就访华，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访问，在70年的时候，我们的副总理也访华，在71年的时候，其奥赛斯库访华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成功访问的前提，那么我们都得看到，他当时的那个访问，成果是很好的。中方罗方都很满意，当时我们重新建立了，我们的传统友谊，而且也有党际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还发展了更广泛的我们在不同领域的合作。在66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你刚才问到，是不是一次失败的访问，但是我的看法是他不是，

但是我也得承认，那次访问中有一个小事故，那就是罗马尼亚无法接受关于当时的一个公开，关于领土的一个争论。那么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布加勒斯特那个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其奥赛斯库他们很公开的谈话，他们没有看着稿子念，那是因为之前，关于罗的领土的问题，已经达到了一致的意见。双方不再争论了。但是至于其他的会见的成果，我们都很满意。那么我想呢，我们很满意，我想中方对那次访问的结果也应该是满意的。

至于匈牙利东欧东德捷克和波兰的领导人他们的领导人对于中方的态度上面的异同，我想他们之间可能是有一些分歧，但是我只想提及，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我们又有了其他的领导人的变更，像格莫尔卡，他的位置也发生了变更，刚才有一个人说到，东欧五国，不是铁板一块，我在我的发言中也提到了，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中国的代表团，和匈牙利有接触，他们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在60年布加勒斯特，代表团团长彭真与匈牙利代表团有接触，并且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边，然后在莫斯科的时候，中方又和波方转达了同样的意见，但是我个人认为呢，那些国家很难改变他们原先的立场，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看法是那么固执，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些领导人本人，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如果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来看的话，他们当时很难重新改变他们的立场。我不知道我是否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李凤林：涉及到对我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关于波匈事件我不讲了，我们有两位非常权威的大使他们谈，还是谈和我有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同波兰的关系，这里面呢，波兰的朋友提到了，中国还是采取了一切的手段，来分裂包括波兰同苏联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想讲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的政策是要孤立苏联，但是说到底呢，所谓一切手段，你说一切手段，那么中国方面的手段，也没有什么手段，最主要的是，中国方面希望同东欧这些国家，尽可能的保持一个正常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当时绝没有幻想，能够使这些国家完全改变一些看法，同苏联，不赞成苏联的观点，这个实际上也不可能，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奢望，这个我想罗明大使刚才已经讲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关于1965年周恩来同可西金的谈判，关于互不侵犯的条约的问题，我首先讲的，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中苏边界谈判的过程里面，苏联方面针对中国方面建议，在争议地区撤出武装力量，使边界谈判能够在和平的气氛下进行，是根据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的，关于苏方提出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中方为什么没有同意，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方认为当时中苏之间还有一个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是说，中苏之间是盟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专门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这使人不可理解。所以呢，这个就没有提上，根本就没提上日程，最后一个问题，关于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国方面有什么期望的问题，这个中国方面首先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到底因为什么，他的下台同中苏分歧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是肯定中方关心的，第二，如果他的下台同中苏关系有关系，那么是不是此后呢，有可能改善中苏关系，所以中国方面呢，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这个期望呢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中苏关系。但是谈判的结果呢，就是苏方明确的表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苏联的新领导，对中苏关系问题，我们的立场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细节也没有变化。俄文用的是（），就是苏联方面说的很死，我们会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这个对华的政策。所以我们感到很失望。那么在这之后，我今天在我这个里面讲到一个，65年是一个机会，我没有讲64年，64年好像也是一个机会。65年就是科西金从越南回国的路上经过北京，那么这

次会谈里面，除了越南其他的问题，这个我们会有在另外的场合去谈，就中苏关系来讲，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方面希望苏方，不要召开一部分共产党国家举行的磋商筹备会。而且当时中国方面呢，明确的讲，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召开这个会议，那么这就意味着，中苏两党的分裂，那么 1965 年的 3 月，苏共还是开了这个会，虽然改了名子叫协商会议，所以我认为，中苏两党的分裂，就是 1965 年 3 月这个会议，应该作为一个标志。谢谢。

章百家：我们刚才两位大使罗明大使和李凤林大使已经回答非常多的问题，我想应该允许他们休息一会儿，那么我们的学者，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关于波匈事件时期，这个中国的政策为什么会发生了变化，内部的不同意见后来是怎么反应上去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苏分裂的时候，东欧国家内部有没有这个分歧，每个国家内部，有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是不是请其他一些大使来回答这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刘彦顺：196 年 10 月发生了波兰 10 事件，波兰 10 月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是当时呢，波兰要改换新的领导，就是在 1948 年被批判为右倾民主主义的哥穆尔卡要重新出来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这件事引起赫鲁晓夫的不安，因为苏联的一般做法是，他是以老子党自居，干涉各个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兄弟党的人事变动，苏联要参与干预的，赫鲁晓夫不同意哥穆尔卡重新出来担任第一书记，在波兰党将要举行第八次中央全会的时候，也就是定于 10 月 19 日举行八中全会，这个时候赫鲁晓夫突然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他本人以及重要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国防部长，突然飞到华沙，事先没有通知波兰方面，要求在华沙降落，要求参加波兰党的第八次中央全会，当时正在进行的波党中央全会，不得不临时休会，推选出来格莫卡，还有西蓝（）这些人到机场去迎接赫鲁晓夫。这里有个插曲，据说赫鲁晓夫的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说法不一样。有的说是一个小时，有的是两个小时。他要求降落波兰方面不允许他降落。这个后来呢说，这个飞机已经没有油了，再不降落就要发生重大的事故了。必须在这儿降落，在这种情况下呢，波兰方面允许他降落了。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与此同时，在 10 月 17 号，苏联已经开始调动军队，调动驻波兰的军队，调动他周边的军队，准备用武力干涉这件事，如果波兰不听话的话，他要准备动武。同时苏方也把这个意见，通知给中国共产党，对这件事情当时我是在华沙的，我在华沙是学习，在外交学院学习，当时波兰的情况是十分紧张。

华沙大学各所大学的学生，都不上课了，自动的有的上街有的是在学校里面纷纷议论，这件事怎么办。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同够莫卡联系在一起，当发生这种紧张状况的时候，我们使馆也非常关心我们留学生的情况，要我们注意安全等等。我们也经常到使馆去要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我们是青年学生，不完全了解这个波兰的社会政治情况。使馆也向我们做一些解释，我记得有这这么一件事情，也就是在 10 月 23、24 号的时候，我去上课的时候，波兰同学就抓住我的手，向我表示感谢，说中国共产党支持我们，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中国同志，好像他就是波兰的代表，我就是中国的代表。群众的情绪非常高昂，非常激动。普遍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了他们。确实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了他们，因为毛主席在北京对赫鲁晓夫要用武力干涉波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就是毛泽东说了一个不，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当中是很重大一件事。我看阅读吴龙西同志十年论战的回忆录里面，他在文章里面，有个非常精彩的描述，就是说，毛主席在接见尤金的时候，说不的时候，是在一个晚上，政治局会议之后，他把尤金请来了，尤金带着他的助手，一位参赞做记录，

毛主席当时是在卧室，穿着睡衣，跟尤金谈话，尤金很紧张，毛主席表示了说，我们中国不同意对波兰采取这种强硬的做法，出兵的做法，请你赶快把这件事情，报告给赫鲁晓夫，当时尤金呢，不断的说，点头称是，是是。同时呢，还不断的用手绢擦汗，可见当时情况的紧张。这段描写呢，在十年论战里是非常精彩一段的描写，中国说了不，对形势的判断，确实华沙就是我们驻波兰使馆的判断，和中央的判断是有不同的。因为在华沙呢，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看到波兰人的情绪，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呢反应出的，就是对苏联的不满，所以在华沙看到呢，多半是群众的对苏联的不满的情绪，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是，苏联是老大哥，大家都要同他友好，大家不能说苏联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人说他不好了，这是一种什么情绪呢，在使馆看来，这种情绪恐怕是不正常的情绪，所以使馆在向中央报告的时候，也是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就主张说，这是一种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要求平等的，要求主权这样一种反应，这种情绪的反应。有的就觉得，这可能是反苏一种情绪的反应，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作为使馆呢，我当时是学生，我听到了王并南大使一个在波兰的，八中全会后，给我们学生做的报告，他就很坦诚的讲，他说使馆对八中全会对波兰形势的估计，和中央的估计是不一样的。毛主席批评了我们。

我作为青年学生听了这个报告，当时我给我印象特别深的，那就是说，我们一个资深大使，**王炳南**同志，他当着群众的面，讲了使馆对形势判断有误，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这个事情对我王敏南同志产生非常好的印象。那就是说，我们中国外交官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这是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印象。这件事我就暂时说这些。

老外说中文：刘大使是波兰通，了解波兰问题非常好，所以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那时候，在北京，我记得我们驻北京的大使，他在一天中午给我打电话，有的时候给他翻译，毛主席要我夜里一点还是一点半要到中南海去，按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我以后王敏南大使，也给我谈这些事情，不过他也加上一个词，他说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全会以后，……。我作为常常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地方，在华沙，最受欢迎的客人，有的时候我进去，苏联大使就离开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那时候是特殊的情况，

章：我们现在还有 5 分钟的讨论时间，我允许两个人提意见。提问题。

和学文：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说的，给我描述当时的事态的发展，我有一个很简短的问题，我的一个同事，他对于 60 年代波兰的事态有很多的研究，他说，波兰的改革派的人，像在非正式的场合和中方有沟通，哥穆尔卡，而且说波方表示，他会成为领导人，我想问的是，当时波兰的改革派和中国的朋友，是否有内部的沟通的渠道，我想知道，中方是否事前得到了波方的通报，当时在使馆有一些内部的争论，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读到当时的一些使馆发出的电报，那就更重要的。谢谢。

沈志华：我问罗文大使，当时向苏联赫鲁晓夫透露消息的是卢克非斯基是他的国防部长，当时改革派要把政治局改组，要把这些苏派搞下去的时候，他究竟他实际的方针，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后来苏联要出兵和不出兵，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像后来格莫尔卡解释的，说我们并没有反对苏联的态度，只是党内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是后来，他不出兵，但是赫鲁晓夫得到的消息，是他们要搞倒这些人，所以他要出兵，我不知道当时波兰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跟赫什伯格想的一样，哥穆尔卡上台前后，究竟跟中国有没

有联系。

提问：刘大使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王炳南讲大使馆的判断跟中央不一样，大使馆认为他们错，能不能具体讲，大使馆是什么样的判断，中央是什么样的判断。进一步说明一点。

刘彦顺：使馆的判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方才已经说当时我是学生，我不可能十分清楚使馆的具体的判断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从后来的一些资料里面了解到，使馆的判断那基本上认识就是说，这件事情是有反苏情绪，群众的反苏情绪，矛头是反对苏联的，而不是说，波兰要怎么怎么地，要重新怎么怎么地，不是这样的，基本是这么一个东西，反苏是个主要的东西，恐怕第二个判断，是什么样呢，因为 1948 年哥穆尔卡曾经受过批判，作为右倾民主主义，所谓的右倾民主主义就是反对苏联，因为当时哥穆尔卡是主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走波兰的自己的道路，这种主张是苏联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作为右倾民主主义把他拿下来，批判了，甚至送到监狱里监禁起来是不是他重新上台了，是不是右倾民主主义翻案了，这样的问题提到了纸面上了，我觉得使馆的判断，可能在这两方面，有他这么一种看法。中央是有不同判断的。因为据有的资料说，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就讲过这样的话，说使馆有新华社的一种意见，方才有个同志讲是谢文清记者了，有他的意见，也有使馆的意见，看来少数人的意见是对的，还是波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人家要反对这个不平等，使馆很可能多听了苏联大使的意见，毛主席有这样一个批评。

老外说中文：那时候我是留学生我在中国，第二中央的看法是什么，毛主席跟他谈时候，一直强调，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依靠我们国家的条件和我们的历史，这个是一开始最基本的出发点，这个在这个问题跟大使馆有区别。第三个问题，我只要说，波兰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中国第八次全国会议是奥哈布这个是 1956 年 9 月份，他也谈了跟中国领导人，第三个问题，什么消息没有公布，因为这是特殊的途径。第四个问题，如果中国有一个苏联元帅，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你们的翻译怎么样啊，我们很长时期没有办法翻译，不过情绪是明确的，一有条件，这个首要的问题，谢谢你。

老外：在这里有一位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领导在匈牙利事件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改变了态度呢立场，我以为是因为头几天认为这不是反革命，过过几天就认为这是反革命，这主要是这个原因，这是怎么样来判断，怎么样来评价，第二，当时我在这里学习，当留学生，匈牙利留学生他也能证明，支持匈牙利事件，以后呢，我们从中国方面没有体会到任何消极的手段，

章百家：朱大使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朱安康：关于匈牙利事件为什么有另外做法的问题，波兰事件是发生在 10 月下旬了，波兰事件以后，匈牙利 10 月 23 号受波兰的影响，匈牙利几十万群众上街游行，开始的时候，是和平游行，主要是对党的政策不满，对拉个西的个人迷信，其他一系列政策不满。但是后来，到了 24 号，25 号，局势就失去控制了，失去控制以后，有人拿枪杀人了，一些共产党员一些保安队员，都被杀了。这个事件的性质开始有些变化。这个时候我们正好有代表团，在苏联跟苏联谈这个问题，刘少奇他率的代表团谈这个问题，我们对苏联讲了，波兰事件是因为苏联对兄弟党不正确的态度引起的，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但是匈牙利事件有些变化，这个现在开始使用武器来杀人了。所以苏联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们也只是提到这个为止，当时赫鲁晓夫说，他们要商量商量。后来刘少奇率领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开会，最后决定要出兵。是在那个情况下，

通知我们的。我们表示同意。这个事情后来有些讹传，说我们是坚持要他出兵，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当时对局势的分析，有另外一种看法了，第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我们当时对匈牙利的事情的全部经过，也不是很了解的，第三，即使我们中国不主张出兵，但是局势发展到后来，恐怕苏联也会出兵，就是这么个情况。

章百家：我们现在会议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分钟，我们最后请两位主旨发言人，做一个非常短的回答。

罗明：首先呢，我想说明一点，中苏分裂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和当时的一些军队的调动有关，是一种教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受到当时各方意识形态的一些限制。但是我想说是在这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不是由于东欧国家对于争论话题的观点所驱使，而主要的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就是这些东欧国家，对中国和苏联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谢谢。

李凤林：我很简单两句话，涉及到的问题很复杂，因为就是包括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现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研究，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是回顾历史，那么既然回顾历史呢，我想我们需要全面的对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就是当时国际关系的大的背景，当时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当时中国的地位，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华沙条约组织本身当时所处的两级对抗大的局势，恐怕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也还要注意，不能脱离开这样的一种大的背景，

章百家：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我们的当事人谈了许多非常宝贵的情况，我们上午的讨论就到此结束。

24日下午

阿诺：本轮讨论的议题是中国东欧与越南战争，从64年到73年，这是很重要的议程，因为它讨论是在冷战过程中，亚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在此期间中国和东欧的国家都有了很重要的参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呢，我想主要是由各位的演讲当中体现出来，其中有一些问题，是涉及到对越南反美的支持，中国支持越南反美，东欧也参加了这个支持，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在印度支那地区，这种冲突对于中国和东欧国家来说，他们是怎么看待的。同时我们也要从更广泛的一个局域来看，就是中国和东欧国家在越南战争时期的关系，同时还要看看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我和几位大使以及外交官谈了这个问题，谈到我们要涉及几个国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有一些什么问题。以及东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和苏联之间的分歧，同时也包括中国的态度。所以我们是同时从一个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关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做政策决定的。从64年到73年，我们有两位主旨发言人，束特先生会首先讲讲他的看法，然后刘其宝先生，接着我们就会开始进行提问以及问答的程序。主要是请我们前任的大使以及外交官们发言。同时也请我们的历史学家，提一些简短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一轮的讨论，能够提前结束，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启程去参加一个欢迎晚宴。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尽量节约时间，不管是在做提问，还是在回答的时候，现在我们请施罗德先生。

施罗德：第二次越南战争，是1946年到1989年印度支那一系列战争中的核心部分。印度支那的战争对于20世纪后半叶超过20年的时间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体现在很多方面，越南战争并不是从越南打起来的，1946年到

1954年第一次越南战争，在我们看来是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是为了打败外来的干预，五是以保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日内瓦会议是于54年4月26号到7月20号召开的，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结束了这一部分的战事。这一部分的战事是在法国和越南进行的，在日内瓦之后，越南的南北双方，都开始试图弥合在17度纬线分裂他们国家的这么一个后果，为此呢，日内瓦公约要求越南南北双方都在两年内进行选举，但是在1956年的时候，他宣布南越成立，并且反对进行自由的选举。这就在越南境内又有一个新的冲突的层次，在1960年的时候，越南工人党第三次党代会，决定了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就是在北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试图解放南部。民族解放阵线在南越的成立，随后实现了。

但随之而来是在南越，我们发生了一场内战。当越南南部的内部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向有利于越共方向发展的时候，而他是由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的，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决定大规模的介入，这是在军事方面的介入，以支持南越政府，但是很快的，美国的介入，就有了自己的发展的势头。事实上呢，美国的军队他们就接管了军事的指挥权。在1964年3月，双方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那么在美方是3比2。在1969年4月之前，美国军队的集结已经达到了54万人。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能表明真实的军事集结情况。当时武器的集结以及进行针对双方首领的军事行动的能力，以及运输能力，以及军队的流动性，以及军队供给的能力，在双方来说，都是不可比的。所以双方的军事力量它的军事力量角度来说，数量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估算双方的力量对比。就我们考虑20世纪的所有战争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越南人是没有办法赢得这一场战争的。

不仅美国和它的盟国这样想，而且苏联和中国也是这么认为的。对于苏联和中国来说，他们对战争发展的前景并不怀有乐观的情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和中国进行了非常严肃的外交活动，希望可以约束第二次越南战争的规模，并且使它早日结束。它们希望通过谈判来达到这一目的。虽然中国和苏联并没有完全步调一致，但是他们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还必须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他的领导层，还必须和越南方面打交道，双方都希望能够控制战事带来损失的规模，双方都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寻找一个解决冲突的方式。在今年3月4号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德国电视的报道，是关于当时的越南的国防部长一个采访。他当时是用法语说的，他说邓小平和科西金他们给我出主意说，不要跟美国打仗，因为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第二次越南战争，并不只是一个局部的战事，战事的绝大部分都涉及到中国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的利益。以及他们各国之间的关系。苏联以及他的盟国，以及美国和他的盟国，都要受到这一场战事发展方向的影响。

对于东欧国家来说，还有另外一层复杂的因素，那就是他们和苏联和中国的党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也是它们必须首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从60年代以来，在世界共运的史上就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转折性的事件。在国际共运的争论中，它的主要的一点，就是怎样在当时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参与的国家之间的团结。从苏联方面来说，所谓恢复团结就是要回到50年代时候的无产阶级大团结。怎么来看待这句话呢，不光中国人这么想，其他人也这么想，那就是说，那就必须承认苏联共产党它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大家必须听他的，看他如何指挥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管理方式。所以苏联的领导人就不顾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而一心要恢复到40、50年代的国际共运

发展的那个状况。但是从中国方面来说，它的看法却又不同。他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来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方提出的设想是，可以有一个关于未来国际共运发展方向的大致的建议，这是在1963年6月14号的时候，由中方作出的。我们也把它称作25点建议。中国共产党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讨论，讨论它所提出的这一个建议。这就是第二次越南战争开打前的世界局势。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是在向两个方向使劲，第一个方向是组织起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在物质层面在技术层面给予它支持，另一个方向呢，则是动用一切外交资源，来试图把这场战事控制在一定的区域内，而且从苏联方面来看，它希望可以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维持此后的维持世界局势缓和的趋势。直到70年代之前，越南战争对于中国的领导层来说，是它们永久争论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一场争论牵涉到他们如何看待当时的战略决策。而在他们的争论中，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和苏联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应该如何相处。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如何打破他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领自己所应得那个地位，因为毕竟他是二战的一个战胜国也是一个大国。比如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如何获得他应得的地位。但是在这个时候，在安理会中，却是由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这就和上世纪当时的国际具体的形势不相符了，而且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途径中国向越南进行物资的援助。在经过漫长的讨论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那就是在1965年12月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签署了一个协议，这是关于如何向越南运送物资的协议，根据这一个协议呢，越南将在他自己的领土上，正式接受别的国家运送给他们的援助物资。所以这些物品在经过中国的时候，将被标注为是属于越南的物品，根据当时签订的这个协议呢，中方愿意保证武器弹药以及其他非常重要的装备的运输。这些装备将通过铁路来运输，它的成本由中方来支付，其他的物资的运送，则是通过海路。东德方面提供的救援物资一般都不是军备用品，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中间有许多非常复杂的因素。但是之后中国和东德终于签订了一个双边的年度协定。在之后的每年中，每一年的秋天，东德的武官和中国外经贸部一名代表，就会签度一个年度协议，在之后呢，东德方面的武官就得到了一份文件，是关于前一年履行协议的情况的，之中有中方提供的所有关于物品运送的细节，以及包括运送的费用和成本等等。

这样的一份文件最后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做结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这些物资的援助，是对于越南人民斗争的一种友好的表示，一种援助。并且不向东德方面要求任何财政地补偿。1965年2月份的时候，美军空军开始对越南进行轰炸，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它的空军力量，就面临到一个难题，那就是他们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的空军它的飞机所能到达的高度，越南的地面部队的火炮没有办法打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提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防空的武器，这个里面就包括当时非常先进的防空导弹，以及早期预警的电子设备。以帮助越南方面抵抗美国的进攻，但是在当时在越军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专家他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些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式。这就使局势变得非常复杂，面对着种情况东德决定向越南的空军，派送志愿者。他们可以帮助越南的军官和士兵怎么使用那些武器。希望可以手把手的教他们。越南民主共和国他拒绝接受东德派给他们的志愿者，但是他希望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培训。这样就可以更新越南的防空武器装备，以及相关的人员培训。而由他们自己来完成防御的任务。与此同时，越方的军官就在德国受训，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

大家原先未曾想到的问题。

这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体制比较弱，所以没有办法承受得了运送那么多东西的重量，之后呢，越南的空军又送了一倍的人，以完成军队所需要的任务，尽管有上述这么多困难，但是在越南还是构件了一套防空体系，而且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而且就我们在西方来看，这是除了东德以外，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最先进的防空设备了。越南的官兵不仅特别高兴，士气大涨而且学习掌握这些武器非常快，这样我们原先安排训练他们的时间就可以随之缩短。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从66年到67年，是中国和东德的关系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一段时间。在67年的2月份，中国驻柏林的大使被召回，而下一任大使直到70年的时候才到位。但是东德在北京的大使却一直在岗。东德的领导层情况也很复杂，一方面德国的社会主义统一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党际关系非常好。这对于双方处理政府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比如一直到60年代以前，中国和东德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因为东德低处欧洲的中部，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并且是一个分裂的德国的一部分。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做出决策要看二战的战胜国比如苏联怎么想。东德的西边的边境，也悄悄是北约和华约的军事分界线。而在东边呢，东德又是华约以及苏联军队的分界线的所在。最后一点麻烦呢，就是东德它的存在是当时一个具体的政治历史的发展现实。它是苏联的一个亲密的盟友，这和当时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得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东德在东欧和其他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它需要苏联的直接保护，正是因为东德在这一方面对苏联有非常高的依赖性。所以我们的党对于苏联共产党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们。

苏联驻柏林的大使，同时也是苏联占领区的负责人。他要求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直接和党政高层联系。所以在事实上东德政府有义务在任何时刻提供对方想要的任何信息。除此之外苏联对我们还有监视和控制，这不仅在最高领导层以及在安全政策制定部门，情况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外交方面作出任何决策，都有义务要向苏联方面通报以不损害他们的利益。而东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必须事先向苏联通报，举例来说，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访问东德的时候，邀请我们的总理能够回访中国，在1950年年初的时候，如果能有这样的高层互访，那将是非常好的，但是局势在1955年的下半年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我们和苏联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及东德成了华约的一个成员国。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虽然东德的领导人，还有昂那克，他们都很惋惜中国和苏联关系的破裂，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有知道，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东德的领导人希望可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来恢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因此就东德来说，它不仅和苏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对苏联非常依赖也是因为我们在政治理念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认为苏联它认为地恢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方式是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所以我们对它给予了支持。当时人们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总的来说，中国拒绝一个两级的或者多级的世界秩序，即使有，它也不是应当建立在多级竞争的基础上的。中国希望建立一个国家间的体系，可以向各国开放，并且可以向各方面发展关系，这样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国家，就可以协调他们的国家利益，以共同挫败那些邪恶的势力。但是中方并没有把事情解释清楚，所以东欧国家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一点，没有理解问题的核心。比如说，就东德领导层的态度来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的辩论，一直感到很困惑，而中共内部的他一场辩论，最后使得中共领导层的人员发生了若干次的变动。但是就我看来，在5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这5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应该是就长期来看，只有和中国合作而不是反对中国，你才可能成功，谢谢。非

常感谢。

阿诺：下面我们请刘大使来发言。

刘祺宝：在座好多大使，他们讲比我们讲的很强一点，因为我讲很坏的地方方言，刚才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原来准备都是想讲讲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为了节省时间，不想讲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材料交给会议，现在我想刚才那个，我的德国朋友做一些补充，我想讲的这几点，一个就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战争的一些想法。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在 1954 年以后，就是印度支那日内瓦会议以后，平静了一个时期，在越南发生了冲突了。主要是越南南方，越南的北方呢制止越南南方的进一步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在当时这个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是也是积极支持越南的南方人民斗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他们这个斗争我们认为是民族解放的斗争。是广大的人民要求民族的统一，要求社会的改革。后来在这样一个斗争当中，越南南越方面的这个政权是维持不下去了，外国积极支持西贡的政权因此这个矛盾就发展起来，后来外国通过这个事件，战争扩大起来以后，中国根据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包括首领在内，都是支持越南民族共和国的在这个里面，从中国方面讲起来，这个是个正义的斗争，

从苏联方面其他方面，我认为他们在当时从现在看起来，他们也是支持越南民族共和国。我想讲的一个思想就是，尽管在那个时候，中国跟苏联已经有分歧了，但是在支持越南这一点上有共同点，越南领导人主要的领导人胡志明他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享有很高的威信，在越南人民当中也是，他当时在中苏争吵当中，是采取中立的立场，他希望中国跟苏联不要有矛盾，不要争了。大家一起来支持他，大家都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他的思想。他对苏联共产党也是不满意的，他对赫鲁晓夫这个打翻斯大林是不满意的，但是他当时也是，东德的立场是在这个之间是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既能得到中国的支持，也能得到苏联的支持，也能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这个基本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并不知道刚才那个德国朋友，掌握的一些材料，就是说，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在当时中国跟美国他是都不愿意正面冲突，但是中国对越南的支持，并不像我们在朝鲜那样，我们打过去，没有这个事情，美国人在越南北方轰炸，没有炸到中国来，因此这个战争是个局部战争，没有引起中美之间的直接的武装的冲突。这个里面呢，我不认为中国要限制越南人的解放斗争，我认为中国还是支持他这个解放斗争的。可能在这个策略上，具体策略上，可能有些这样那样的情况。因为我没有看到更具体的材料，很难作出判断和评论，这是我想讲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根据我知道的材料呢，应当是中国对越南的这个解放斗争，主要是靠越南人民自己的，他们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的确离不开其他国家的援助，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很客观的，当时根据邓小平一次对外国朋友讲话里面，他说至少我们前前后后给越南的援助，大约要有 200 亿美元。这是一个，

其次当时虽然我们中国没有到越南去直接参加战争，但是中国想了很多的办法支持他，譬如说道路坏了，中国的工人帮助他们去修，有的工厂坏了我们帮助他们修复，在整个从战争期间，我们在越南牺牲中国的工人，以及中国援助的人，大约有 1400 人以上。在这个里面，我想再补充讲一点，本来我想把这个问题展开讲的，因为在越南跟中国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后来，抗美援朝结束以后，1975 年以后，发现了第三世界，把他称为第三世界的印度支那战争，这个里面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里面是很复杂的，有苏联的因素很重要的因素，苏联支持越南，打柬埔寨。还有这里面很重

要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是 1969 年去世的，越南的胡志明在世的时候，他的领导人，他的中央的第一书记就是李（），这个人也是很长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后来也是，倒到苏联那边去了，到了 1986 年 7 月份，李（）去世，新的领导上台，叫月问林，他上台以后，这个人事变动的因素，整个苏联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特别是个儿把桥副上台以后，最后第三世界印度支那战争，以政治解决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我们先就不讨论了。在这个里面，我想讲一下，也是东欧国家，应当说，第二次越南战争，也可以说第二次印度战争当中作出了贡献，他们援助了越南，在当时中国是处于国内比较混乱，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我们要走到那一点，援助越南，在中国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刚才德国朋友也讲了，当时东欧国家跟苏联援助越南的物资，都要通过中国了。特别是陆用的东西，中国是免费给他们运输过去的，而且一般情况之下，在中国国内专门有一支力量，来保证运输顺利的完成，是这么个情况。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因为我们两个商量，我们节省时间，希望不超过这个会议规定的时间，我希望下面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特别希望美国，东欧国家的大使先生只要你们知道的话，你们可以讲一讲，你们当时，对越南援助的情况怎么样，你们对今天讨论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阿诺：现在可以提问，但是之前呢，我想用协调人的职权，我自己先问一个问题，这是向中方的，包括刘大使，以及其他的大使，中方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苏联以及部分东欧国家支持越南抗美的真实的目的，就是能够控制越南，并且使越南和中国反目，因为虽然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多，而且是中方的材料，但是中方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当时中方领导人普遍都有这样的想法呢，还是刚才刘大使说的，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呢。谢谢。如果刘大使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可以先回答，之后我们再答其他的问题。

刘琪宝：这个是讲秩序的问题，这涉及到我们中国个中人，当时对赫鲁晓夫，以及对其他东欧国家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在历史上的，他们的历史地位，他们的历史的作用，他们的优点，跟他们的长处跟他们的短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时我们讲，苏联对越南是支持，我们是这样讲的，苏联的情况的话，应当说他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在开头的时候，我们李凤林大使，从更高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概括的看法，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割裂的时候，我有一个新的看法，时间更远更有新的看法，新的看法不是否定旧看法，而是看法更深刻，更加知道内在的联系，因为苏联的历史，大家已经很清楚了，苏联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不存在的原因很复杂的，我们今天理解这个问题的话，也应当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来看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另外一个呢，我也是德国朋友提出来的问题，是不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领导人很复杂的了，在越南问题上，在援助越南的问题上面，从我们在座的中国朋友据我了解也是，因为当时也是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国内没有什么争论的，这个都是服从的，都是由中央，由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决定的，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是在中国国内有很大的争论的。

阿诺：李凤林大使。

李凤林：我想谈一点我的看法，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是 65 年这一段，就是中苏关系同越南战争这个关系，我想提这么一点背景材料看看有没有帮助。关于

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越南的物资，这是 65 年以后的事情，当时我可以讲两件具体的事实，大家来判断。援越物资当时是中国免费运输，刚才施罗德先生已经讲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国内是有一个援越办公室是李强负责的，我参加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当时同苏联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争论，比方说，有的时候苏联提供给越南的物资，军事方面的，越南方面觉得，目前他们还不需要，但是呢又不好向苏联人说你不要给我，于是越南人就要求中国方面把这个物资暂时存放在中国境内，这个就是中国方面受到非常，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因为每次运输单子都是有的。所以后来就发生过历史学家们都知道，苏联人从高层领导包括国防部长，都公开指责过越南，说是中国是阻挠他们的物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很有意思，就是有些，比方说是苏联方面提供的物资，因为都是靠铁路运输，那么一些军车上，按规定是要加罩，但有的时候，苏联人不加罩，就是敞开篷运输，这件事情使中国人发生很大的怀疑，你这是什么意思，给美国人看的。那么我想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当时中国同苏联在援越的问题上，我想中国人是真诚的，关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包括中国人在那里，这些事情我想，现在据我看到很多的著作里面，包括李丹慧教授作品的里面，都做了很详细的阐述，中国有多少人，多少物资，非常细了。

我不讲了大家都知道，我想呢，东欧国家对越南的援助，也是积极的，也是真诚的。分歧在什么地方，中苏之间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中苏之间的分歧，还不在于像刚才您讲的，是不是中方相信或者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对越南的援助就是想要控制这个越南，我想这个问题呢，是一种误解，这个问题呢，可能是由于后来，越南对中苏态度的变化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越南具体讲就是发生了变化，引起了中越之间的变化，我想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专门讨论的。那么就中苏之间来讲，这越南的战争分歧的，这里面呢，首先看苏联，苏联是在 1964 年以后，对越南的问题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讲了。那么当时我觉得，最主要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中国方面，当时的观点是，美国处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需要把美国拖在越南，苏联方面想要解决要给美国找一个出路，那么这个呢，就是 1965 年科西金同周恩来谈话里面的，大概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谈到越南的问题，我觉得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在这里。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之下，那么中苏双方对对方的意图方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判断，苏联方面一方面呢，他要帮助美国找一个出路，特别是他要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要援助越南，所以这是这个对苏联来讲，我觉得他在一种很矛盾的处境下，所做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他要援助越南，但是又不能太多又不能太坚决，因为他要考虑美国的因素，我想这个是当时中苏双方的态势，或者说是判断对方的立场上面的一个差别。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您刚才的演讲，非常有用，也非常切题，我想请李丹慧和陈兼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首先我想从何氏伯格教授那儿接一个问题，我希望有东德的前大使，来回答中方的问题。一会儿我可能会请你们中一个人来回答。

提问：非常感谢。我会问题提的尽量简短，但是我的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因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东欧外交和越战的书籍，我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背景，以帮助大家讨论，因为苏联担心受到中国的批评，说他帮助美国，所以他没有直接介入和华盛顿内河那场争吵，这在 65 年 67 年的事情，所以东欧国家就可以挑头来使北约和美国之间，能够谈判。在这一方面呢，匈牙利和波兰在此间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帮双方带话传信，65 年底到 66 年初的时候，以及在 66 年秋天的时

候，在越南曾经有一些轰炸事件，但是匈牙利和波兰的领导人，他们没有能够阻止这一事件，他们就指责中国，一个波兰的外交官他帮美国往越南带信，他就说，中国阻止他到越南去，是为了想抢在他之前，往越南派一个使者，派一个中国自己的使者，所以我有问题，第一个是中国或者东欧的外交官能不能告诉我们，中国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去防止东欧的外交官到越南去以使美越之间进行谈判，第二个，河内方面有没有告诉北京，他希望能够和美方进行谈判。因为我们知道，李孙在 66 年的时候曾经秘密访华，他有没有跟中国领导人说，他希望能够进入谈判。

阿诺：非常到位的问题，我可以请东欧的某一位前大使来回答他的问题吗。或者就此前的演讲做一个评论。

罗文：在那个时候我在外交部就职，是关于国土主权方面的部门。我个人的印象，我强调个人的印象是，因为匈牙利提供了物资，而且不少呢，在中国方面，特别在文革的时候，好像这个运输问题，有的时候遭到的阻碍，但是呢，归根到底，中国把所有的物资都运输到越南，这是我个人的印象。

阿诺：谢谢，有谁愿意再继续提问题吗。

罗明：我记得，周恩来和我方领导人的一个讨论，是在 66 年的 6 月份，我很惊奇的发现，他们讨论的主要的议题就是对越南的支持。周总理说了两点，都是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尽可能的去从物资政治上以及道义上援助越南，包括南北越。我的结论就是，这一次的讨论，就使得罗马尼亚对越南的资助大大的增加了。从这一点来讲，我想说的是中方是赞成支持越南的，另一点呢就是，周恩来总理提到，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估计这是提到波兰以及匈牙利方面的努力，他们赞成在越南达成一个协议，中方认为这样子是不是太草率过急了一点，以我的看法，根据中国传统的这种战略眼光，应该挑一个合适的时间来进行谈判，如果时间过早，而当时的条件又不是很成熟呢，那么谈判的结果可能就受到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罗马尼亚方面的领导人，在 66 年的夏天，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开始谈判，但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由于美方的利益，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罗马尼亚开始积极的参与了这个进程。在 67 年以及 68 年，在我的印象当中，有三个罗马尼亚代表团，到河内访问，他们主要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怎样推进那里冲突的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也记得，根据东方的这种策略，罗马尼亚的代表团，得到了建议，要在对美国的评论当中，相对有批评的色彩，这样越南的方面，就能够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并且也做出了这方面的努力。因为越南的这种反抗的思想在罗马尼亚是广为人知的，不只是原则方面，而且是因为罗马尼亚人当时也觉得，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够表现以及反应出他们对大国的这种不满的情绪。所以罗马尼亚实际上是非常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的。

阿诺：请您稍等一下。

发言老外：我想说，越战的时候，在中国发生的是文革几乎是同时的，所以当时从东欧国家来说和中国很难配合，双方之间的关系很有限，我们之间的贸易额也很小，只是象征性的有那么点。合作也不多，另一个合作领域呢，就是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战争。我那时是住在中国的一个年轻的外交官，我当时是负责领事的事务。我去了东北好几次，这已经接近中国的国境了，那么我卡到了当时那边的一些民兵，军备这些东西，都是从苏联运过来的。刚才施罗德先生已经提到这一点了，就是越南将得到的苏联给他们的支援，而且要过境中国。那么我是帮他们把这一部分物资，交给中方，当时中国人非常有礼貌，他们很直率很直接，

领到多少数量的物资，军备，都很清楚。而且都有清楚的记录在案，中方到底接收了多少物资，而且他们愿意承担运输的费用，中方从来没有想，阻碍这些物资的运送。几乎所有的物资后来都运到了越南，没有中国的帮助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不多的合作领域中，还有一点就是，我方和中方在另一个问题上也有一致的立场，我们希望共同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战争。所以保加利亚和苏联的立场是不同的，苏联指责中国，而保加利亚没有，保加利亚确实没有，我们就是按照清单去接收物资了。

李丹慧：我就是想问一下，施罗特先生，刚才您谈到东德就是表态向越南派志愿人员的问题，65年3月波镍日镍副在红场上一个讲话，他表态，苏联在必要的时候，说苏联愿意提供志愿人员到北越去，我不知道德国东德是不是也是这个时间，就是65年3月份的时候，那么在表态向北越派志愿人员的时候，苏联和华约国家或者说是东欧五国，事先就没有就这个向越南派志愿人员的问题，有没有讨论过有一个统一的行动，怎么表态，再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说到那个，东德为北约培训飞行员，我想问一下，就是据您了解，东欧其他国家或者东欧五国其他四个国家，有没有帮助越南培训飞行员，具体的数字是多少，或者是您再告诉我一个具体，大概的东德的数字是多少在什么地方，是在东德培训。谢谢完了。

刘琪宝：在越南，防空设备地对空的导弹都可以使用，使用这个苏联的武器，因为当时在整个战争期间，17架飞机，当时苏联地对空导弹，起了很大的作用。光是靠常规武器的话，要打下那么多飞机不容易的，这一种能够用这种武器，东德能培养，因为东德这种武器很多。

俞邃：我当时作为在对苏联的工作，我讲一个刚才主席提的问题，我做一点补充，当时在援助越南这个问题上，苏联是援助的，中国是可以援助的，东欧国家也是援助的，因为援助的物资要经过中国过境，而这个时期呢，中苏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这一种分歧，有的时候就带到援助问题上来了，比方说，不是中国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苏联就指责中国，在制造障碍，反过来呢，有的时候认为原来苏联并没有给越南最需要的武器，相互有争论，这是事实。但是这不影响大家对越南援助的本身的客观性，还想指出一点，就是当时中国主要是针对苏联跟他进行争论，曾经有过一篇文章，驳苏修的联合行动，没有错，但是对东欧国家来讲，中国采取的态度是宽容的有区别的。

阿诺：请您再提一个很快的问题。

提问老外：就是关于对越援助的态度方面，是因为战略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越南该如何进行他的战争，我记得在65年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反对进行游击战争，对不起毛主席是支持人民战争，游击战争，而苏联则希望进行一场现代战争。

施罗德：在我们的国家呢，从来没有训练过越南的飞行员，我们只训练那些地面的防空部队，也就是说，我们训练士兵和官员。他们是涉及那些新型的反导弹设施，而且训练的只是战术方面的一些援助，因为导弹他不光是本身，它还有整个系统，我们要确保这个系统保养很好，这些系统都是在东德生产的，但是我们没有培训那些飞行员。因为那些没有经验的飞行员，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护这些设施。他们没法很好的控制这些战斗机的保养。所以我们在飞行员中进行了挑选，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有能力使用这些现代的战斗机。可能他们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受的训练。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训练了导弹方面的一个人员，他是在越南工作的，后来他成为我方驻越南的武官，但是他主要负责的还是

地面防空设施。至于讲到别的国家有没有帮助越南培训飞行员，我不确定，因为在这个会议之前，我和我们国家很多武官进行了讨论，他们当时是援越的人员，没人跟我讲到，其他的国家有参与训练飞行员的项目，东德在这方面的想法就是，那些设施是相对比较精密并且专业的。

陈兼：我想问一些关于这个时期的更大的问题，

阿诺：李大使您没有特别要说的。之后再说。陈先生您先说。

陈兼：今天早上李大使早上讲到，1965 是很重要的转折时期，从中苏关系来讲的话，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越南问题，莫斯科三月会议，苏联之所以坚持要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联合行动，这个之前科西金先到越南，然后到中国同毛主席谈话，二月份谈话很重要的问题是越南的问题，科西金很大方面承担苏联党内的一定风险，谈这个联合行动，结果毛主席拒绝他了，再接下来，中国党内我们大家都知道，到 1966 年，还有日本共产党工本显之到朝鲜到越南，然后到了中国，也是谈联合行动，结果同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以后，已经基本上谈出了一个协议来了，毛主席在最后一刻出现了，说他们讲话不算，我讲话算，从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这样看一看，我觉得我们对于现在是研究这里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中苏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是中国对外政策问题，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而我个人觉得，中国在这个时期的问题的态度，同当时整个中国内外政策全面左转有很大关系，正因为这样的话，使得三点不可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支援越南不可能，因为当时中国提出反帝必须反修，第二点，使得中苏之间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科西金当时非常失望回去以后，现在也可以说，就在我们不久前，在布达佩斯那个会议上面，毛泽东同科西金原始纪要都出来了，你可以看到，第三个同时给越南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给东欧国家，怎么处理中苏关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为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龙头，互相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样来看，是不是我们对把握这个大背景，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就总的来讲的话，中国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造成了中国的一个十年浩劫，那么他对中国对外政策，究竟有什么经验教训需要总结，文革初期中国内外政治的全面左转对中苏关系，对越南战争时期的所有的这些情况，有什么影响，这是需要一个面对的问题，而且这也可能是我们中方的这些老大使，可能有很多情况可以讲的。

阿诺：李大使。

李凤林：陈教授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值得我们研究，我想讲很简单的几点，第一点，就是在这个时期，中越之间，关于越南战争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这个时期，中越之间关于越南战争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时间，一直到 69 年，也就是说，至少在 65 年内，那个时候越南方面也不准备同美国谈判，而且中越之间，就这个问题，有许许多多的高层的接触，意见是一致的。那么苏联方面，是想要开始谈判，我感觉还可以再查材料，越南方面，不同意苏联这个观点，但是不便于向苏联方面公开讲出这个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总的当时一个判断，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因此呢，也就是说，那么有一些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有的同志提到，波兰匈牙利外交官员去越南，中国方面加以阻止，这个我想这是太小太小的细节，而且中国人也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也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事情。而且苏联他高层同越南有直接的接触，也不需要再通过其他的国家，作为中间当时绝对没有这个必要。我倒是有一个总的问题，我想问问，东欧国家的大使阁下们，就是关于对越南的政策，在当时苏联方面，同这些国家是怎么协调的，就是说，苏联方面是

不是明确的讲出了，他们对越南战争的立场，我想不仅是讲说志愿军这些问题，而是说，从政策层面的协调，苏联人跟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我很想知道这一点，那么至于刚才陈兼教授谈到的这个，65年的这个转折的问题，周恩来同科西金的谈判，科西金很失望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参加这个谈判，我是做翻译的，我不知道你把你这个文件给我看一看。我也是翻译的，你给我看看这个文件，我可以判断是不是当时是这样，因为所谈的问题我都记得很清楚，包括越南的问题。

阿诺：李大使你能再帮我们回忆当时那次会晤的具体情况吗。一会儿再谈。

发言：刚才有个问题，刚才听了余虽先生讲关于援越东欧的问题，提到就是说，在中苏分歧影响到对越南援助的问题上，但是对其他东欧国家不一样，比较宽容，因为这个问题是我在这会上第一次听到，想到的，我想问一下，对东欧和对苏联不同，主要是指的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有这样一个不同存在，是不是当时中国决策层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越南问题上，要区别对待，第三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别。这是我的问题。

阿诺：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时间可能不够了，我想请（）来回答一下问题。回答李大使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有一个问题，就会结束这个讨论。

老外回答：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主要是讲一下，我方在这个事件当中的作用，以及关于共同支援越南的问题，有没有派特使到北京来组织这样的行为，还有另一个问题，我们对于越南战争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很简短的就回答掉。因为首先呢，就会讲到，是否派遣秘密的外交官员，进行斡旋活动，从64年底到65年初，有官员到莫斯科以及到北京和当时的中国的副总理王炳南进行了会面，后来和越南方面的胡志明书记，以及其他的越南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他在莫斯科得到了全力的资助。我当时在大使馆工作，是二秘，我参与了这些会谈，当时的大使说呢，我知道王副外长，会解释我们方面的立场。以及关于中国的那内政，还有当时比较激烈的一些变化。你们知道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在这些会谈之后呢，我们比较失望，因为当时王副外长，实际上是完全反对我们的提议的。后来我方又去了河内，在河内方面的讨论当中，我们企图向越南方面解释美国的14点原则。你们能不能考虑使用，哪怕是一部分也好，或者你们考虑一下它的可行性，越南方面的回答实际上和王副外长的差不多，但是更礼貌一些。所以总的来讲，在我方人员去莫斯科，见了俄方领导人之后。他后来就认为没有时间开始讨论了，在我看来如果你看一下这一段时间，就在我看来，不太可能阻止越南战争的升级。这在某份报告当中也得以体现。

在古巴危机之后呢，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中国关系相对紧张，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当时外政和内交那么紧密的联系。

再有的是关于美方的一个政策，我下面想说的是河内领导人他们的意见，他们希望能够统一越南，那么美方他有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考虑，而在66年的11月底的时候，是有人提出了一个美方的十点的建议。是在6月6号的时候。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当时实际情况来看，不太可能，或者说据他来看，当时不太可能出现政治讨论越南战事这么一个可能。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一点不清楚，这是和莫斯科方面的立场相关的。那就是他没有公开说这一个。所以只是我自己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能说，苏联安全没有利用他在各方的那些影响，去影响事态的发展。那么我们有一些文件，我的朋友曾经翻译过这些文件，当时的谈话言辞很激烈，成果也不好。一方拿出了67年5月4号的人民日报，当时那份报

纸上，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以统一我们的，可以团结我们的，每一个事情都是让我们分裂。我们是站在两个完全对立的立场上。

阿诺：没有时间了，非常感谢，现在我希望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发言人请做结尾。

刘琪宝：我刚才注意到大家很多的发言，都是很好。但是这个问题呢，一下子讨论不清楚的，我想我们在下面讨论的时候，有的还能通过下面的讨论，我相信我们在刚才讨论的问题，我也有更好的了解，在这个里面呢，我想侧重的讲一下就是在这个里面，中国苏联东欧越南，这四方面的关系，跟越南本身的一些变化，还有苏联本身的变化，都有很大的关系。有许多问题，那个时期，那个背景下我们要讨论很多的问题。

阿诺：很好您的作结很有哲学的意味。

施罗德：越南战争中包含了很多各方利益的矛盾。他牵扯到很多大国和他们的盟国，各方都希望有一个出路，但是看上去都不丢脸，现在我们时间很有限，要商讨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却还是有了很多真知灼见。这很好。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本节会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刚才所有发言的同事。那么我们还想谈一点就是，此后关于中国和东欧的前外交官你们可以多给我们一些关于当时你们内部的政策出台的过程。这一节谈我们是关于越南战争，但是之后还有其他的话题，所以可能的话，透露给我们一点，不光是外交的情况，还有你们内政的，也就是外交幕后的情况，这样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非常感谢。

章百家：下面呢，我们就来讨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我们这个议题讨论的时间是从1966年到1969年，我想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的对外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个问题呢，我想在座的诸位当事人，都有发言权，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到5点30分结束。下面我们就请范承祚大使首先发言。

范承祚：各位同事各位学者，按照会议议程呢，那我就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先发一个言。1966年到1976年间，中国出现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传统的文化革命。而是政治革命，文革的理论依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叫基本路线，他的具体说法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资产阶级就在执政的共产党内。斗争的矛头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理论的提出，和稍候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给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带来震撼，对此呢，他们的态度总是反对，但是坚持中国苏联之间中立的罗马尼亚，表面上不反对，当然也不支持。同中国关系十分友好的阿尔巴尼亚，在开始时是有所不理解。因为一般人们都以为，阿尔巴尼亚自始至终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我告诉大家，开始不理解，所以我下面讲几段。

第一个部分我讲一讲，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文革的态度迅速加温。这里面第一在文革发动的前夕，即1966年4月底，阿尔巴尼亚派总理谢户，劳动党中央书记瑞斯林卡包，组成的党政代表团访华，由于中阿双方对与共同反帝反修，特别是反对苏霸苏修，另外呢，谢户，卡包在同刘少奇国家主席，周恩来政府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会谈，和同毛泽东的会见当中，在对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在谈到国内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同中国的观点有差异，阿尔巴尼亚承认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因为呢，阿尔巴尼亚说，反动

阶级的残余还存在，但是不存在资产阶级。不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为此阿尔巴尼亚在国内推行革命化运动，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对中国阿尔巴尼亚仅仅提什么支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避免提中式的阶级和阶级观点，阿尔巴尼亚称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而且要研究，他表示不理解，可见阿尔巴尼亚对于基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理论和即将正式出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态度，是有保留的。这是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呢，就是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1966年6月以后，就文化大革命发动了，起来了，如火如荼，阿尔巴尼亚方面密切的关注中国发生的情况。同年10月底1966年10月底阿尔巴尼亚主要领导人，安威尔霍差，参加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成员康生说，康生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对康生说，欢迎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欢迎，现在阿尔巴尼亚说欢迎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是阿对文革的正式的谨慎的公开的表态。下面第三点我就讲的，1967年2月，阿尔巴尼亚派出了他领导成员，党中央书记卡包，率领党代表团派了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贝兼巴路库军事代表团同一个时间访华，1967年2月，考察文化大革命是这一次，两个代表团访问的一项主要内容。他们在同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分别会见时，都声称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一次用的是支持，第三点呢，又过了一段时间，1967年7月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阿方派出了政府总理谢户，党中央书记，爱利亚率领一个大型的党政代表团访华，这一次访华，是积极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比原来一般的支持加了分量了，在访问中代表团还兵分两路，在所到各个省，各个市组织的万人大会上，宣扬阿尔巴尼亚对文革的上述表态。积极支持，有力支持，甚至于有一点，以前都不知道，我今天在这儿公开，谢户总理在交谈当中跟周恩来总理表示，他要在公开的讲话当中，对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点名批判，到那个时候为止，中国只讲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被点名，谁都知道他指的谁，谢户总理说我来给你们点名，周恩来总理对此不以为然，淡淡的，说这个事情，你去问毛泽东主席。当然他也没问。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阿尔巴尼亚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发生的一些转变。

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讲一讲，汇报一下支持文革是两国特殊关系的重要标志。大家都知道中阿之间，关系是非比一般，是特殊的关系。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文革的态度，从不甚理解，逐渐发展到谨慎欢迎，到一般支持，到积极支持，在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名义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就是阿尔巴尼亚一家。此举构成了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三大支持之一。三大支持，第一个支持就是支持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第二个支持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讲的，第三个支持就是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自始至终支持的，第三个。现在我们回顾往事，回过头看，这后一项支持，就是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是最具成效，始终如一，难能可贵的。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是中国特殊关系的显著标志。大大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怎么发展的，我们看下面，这几个方面，

两国高度评价双边关系，中方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说，阿中友谊坚如钢铁，纯如水晶，双方认为两国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表示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再看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民间交往也多，就中国访问阿尔巴尼亚来说，除了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前的1964年的，1965年，1966年连续三次访问过阿尔巴尼亚以外，文革期间中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成员，他们也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哪些人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文革小组陈元，姚文元，解放军元帅徐向前，解放军参谋长黄永胜，解放军总政治主任李德生等，他们都曾经率了中国的党政军等代

代表团去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访问呢，除了霍查，只有在 1956 年出席中共八大，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再没有到中国来过，或者说参加莫斯科会议以后再没有出国，除了他在 1956 年出席过中共八大以外，所有的领导人无一例外的，都曾经几次来过中国，两国的民间互访更是不断。其中还有一个中国的红卫兵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二战前历史上素无往来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中相互了解，竟然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今天我们在座的一些当年是青少年时代的，我们一些教授们来讲，那个时候时期中国，这个电影院放的都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那个相互了解非同一般。

我们再看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全面大增，大大的增加。中阿 1949 年建交，1954 年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大使馆，从建馆的 1954 年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的 1978 年共 24 年期间中国援助了阿尔巴尼亚有一个整数叫做 100 亿元人民币。当时在 70 年代的时候，折成美元是 60 亿美元。文革 10 年的前 6 年，就是 1966 年到 1972 援助的数目占总数的 80%。尤其是 1968 年因为今天上午，我们讨论的时候多次讲到了 1968 年，那个时候呢，中国文革处在高潮，苏联侵略捷克，就在这个期间，阿尔巴尼亚呢，针对苏联侵捷克，退出了华沙条约，就在这一年，1968 年中国一次就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 30 个成套项目。那个期间几乎做到了有求必应，这个文革期间，这些年呢，在中国援助下，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显著改善。这是要讲的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这个小题目是支持文化革命，是阿中关系的一个标，刚才说，是个标志，不是本。就在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文革，中阿共同批苏的岁月，在两国关系火热的时机，中阿之间也同样有过分歧和争执，阿尔巴尼亚对中国 1969 年接待苏联总理科西金过境，大家知道科西金去越南，回来的时候在北京机场停留的，阿尔巴尼亚对中国 1969 年接待苏联总理科西金，和周恩来科西金北京机场会晤，表示反对，可见中阿间在涉及对超级大国关系上，是相当敏感的。那一年我还记得，那一年由于这个事情，阿尔巴尼亚提出反对以后，在 1969 年中国这个国庆 20 周年之际，阿尔巴尼亚原来打算派总理代表团来庆祝的，后来降成副手，副总理这一级。60 年代后期，苏联霸权主义更加膨胀，气焰嚣张，它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占领阿富汗，对中国对罗马尼亚，其实对阿尔巴尼亚加大了威胁，中方因势利导，反对美苏两霸打击苏修，在 1971 年接待基辛格博士，和 1972 年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旨在共同对付苏联。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期阶段。中国的这种做法，同阿尔巴尼亚一贯强调反美反苏的斗争不妥协，这个立场相背，为此阿在这两个年头的春天，71 年 72 年春天，先后针对中国外交上的如此重大的举动，进行指责。并发表了许多不友好的不点名的批判文章。随后不久，1976 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逝世，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阿中分歧进一步加深，关系日益冷淡。

这是刚才讲这个中阿经济援助到了 72 年为止，这个是 72 年是个关键年，不然过去写过文章，写过中阿关系的春夏秋冬，春季建交，夏季就是 60 年代共同反修，一直到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夏季，秋季 1972 年到 1978 年撤退专家，秋季以后一些岁月是冬季，这个时候也进入了秋季了。面对着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国家关系中不断的反华浪潮，中方做了一条，叫做骂不还口，不与争论，1978 年秋天作出决定，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退专家，阿尔巴尼亚反应强烈，从此一直到 80 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对华的态度几乎是敌对的。中阿间维持着表面的外交关系，经历了漫长的，我刚才讲漫长的多雪冬天，如果说按年月分是 1978 年到 1985 年。最后呢，第四部分因为既然讲到文化大革命，是个标不是本，

下面第四部分，我要讲一下，中阿关系破裂并没有断交，我想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通常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什么因素在顺序中，更重要呢。具体到当年的中阿关系来说，无疑文化大革命曾经是影响中阿关系的重要因素。有力的推动过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阿方的主要领导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更计较的是对美苏态度上的意识形态因素。阿声称这是阿中关系的基础，就是我现在讲的是个本。不能容忍这个基础遭到破坏，我们现在回过头看，明眼人都知道，当时不断的反华调子很高，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说反对毛泽东，反对最厉害的是谁，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赫鲁晓夫，当时阿尔巴尼亚主要领导人反毛泽东，反周恩来，也反华国风，也反邓小平，那个时代那个调子特别高，文章特别多，连篇累牍，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们没有公布这些东西。因为怎么骂我们不还口，所以这样明眼人都知道，这样反下去呢，必然会导致经济领域断源，两国关系破裂，这是不计较后果的。

但是人们要问，阿尔巴尼亚为什么没有像 1961 年对待苏联那样，同中国断掉外交关系呢，我以为有以下三条，第一呢，中国当时坚持对阿骂不还口，不与争论，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如果我们要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互相对打必然矛盾激化就要断交，第二中国不像苏联当年在阿尔巴尼亚有军事存在，在地中海地区有海军基地，苏联当时，因为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不构成对阿尔巴尼亚领土主权的威胁，第三中国曾经主动的提出，要停止援助，要撤退专家，但是文化领域里面的专家不撤，继续要跟阿尔巴尼亚要保持包括贸易换货，文化交流在内的正常关系。所以调子是很暖的。最后呢，我想讲一讲，最后我要说，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我曾经亲身经历刚才讲的春夏秋冬，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80 年代中期以后，因为 1985 年阿尔巴尼亚主要领导人，霍查也去世了，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 9 年他也去世了，后果两国关系，双方都主动，逐渐有所改善，我最后一个任期在 80 年代中后期，我亲眼感觉到，冬天正在过去，来了个早春 2 月，后来我的同事们继续努力下去，还是又出现了春天了，我们现在两国关系是正常的，是友好的。所以呢，我就主要就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影响做了发言，就是这些。谢谢。

章：范大使做了非常有意思的发言，讲了中阿的关系，从中国角度看这个历史过程。下面我们请卡普拉尼顾问，来讲一讲从阿方的角度看。

卡普拉尼：谢谢，谢谢主持人，他对中阿的关系，尤其在文革期间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而且生动的描述，他已经讲了很多方面，我不会再重复他讲到的方面了，因为他讲的很多都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没必要重复了。所以呢，我能够讲的也就是，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的一些描述。尤其是关于霍查。他对于中阿关系的影响，以及起的作用。还有阿尔巴尼亚的整个过去 40 年中的政策和外交政策。正如范大使所讲的，在二战前中阿两国几乎不了解对方，而中共和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开始交流，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大会上建立的。这是在斯大林死后。后来霍查到了北京来，他见了毛泽东，这是他们刚刚开始认识对方，并且相互交流意见。尤其是关于国际关系方面，讲到霍查呢，他和毛主席在 56 年进行了会面，他们讲到，南斯拉夫的问题，毛泽东问霍查为什么你们和南斯拉夫的问题不太好，霍查就说，因为那斯拉夫想控制阿尔巴尼亚，而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和南斯拉夫关系不太好，毛主席的反应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你们的问题，也不是南斯拉夫的问题，应该是苏联的责任，从今天看，共产党情报局把铁托赶出了该组织，所以毛泽东认为，苏联在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过于傲慢。

在讲到阿尔巴尼亚呢，在 65 年的时候，在见了毛泽东以后，霍查认为，他种下了中阿之间友谊的种子，那么在苏共 20 大以后，关于斯大林的这个秘密讲话，就开始使得阿尔巴尼亚对苏共有了不同的想法。赫鲁晓夫指责中国，而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和霍查就捍卫了中国的立场。他并没有说赫鲁晓夫指责中国是错的，霍查说的是，你不能把学生赶出学校。不能把中国赶出整个共产主义的运动，那个时候是中阿双方逐渐交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后来霍查对赫鲁晓夫的攻击更加公开一些，说他是修正主义。而他对美帝国主义呢，也是非常的尖刻。正如刚才大使所说的，赫鲁晓夫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他使得党际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联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在 61 年的时候，因为苏联的原因，我们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断绝了。所以我想说，范大使说了三个原因，为真正中阿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没有断交。我想他说的很对，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说要断绝与阿之间的关系。这就表现出中国对其他的国家和政党，更明智更宽容的态度。

我想这是中国做的很对的一点，而在 72 年 73 年 74 年的时候，当中阿关系恶化的时候，如果中国像赫鲁晓夫那样的做法，那么阿尔巴尼亚就没有什么出路了。但是中国表现出了他成熟的风范，做的很有分寸。尤其是在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上，那么为了满足大家的兴趣，我想讲一讲霍查以及他的阿劳动党的关系，我完全赞同范大使的观点，一开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国的文革比较困惑，但是后来呢，他对于文革就渐渐有了转变，后来进行支持。一开始呢比较冷静，后来是非常积极，支持中国的文革。我想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就是霍查和阿尔巴尼亚认为，他们有责任来支持中国，因为和苏联断交之后，中国是唯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其二，霍查认为，文革是用来抗击内外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这样他就成功的阻止了国家内部任何自由化的措施。而文革的这种激进的想法，就对阿尔巴尼亚来说是个很好的借口。

可以使阿尔巴尼亚方面来进行社会以及党际比较激进的改革。阿尔巴尼亚从某一方面来说，可以是借鉴了文革的想法，但是这种反对官僚主义的做法，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有很多的政府以及文化机构的领导人，被下放到了那些生产队做劳动的工作，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上，而所谓的工人阶级，工人队就控制了所有的政府部门，从这方面来讲，我想指出一点，霍查在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他认为不应该像毛主席那样，攻击执政党，攻击司令部，他不想这样做。因为他对阿尔巴尼亚的政党实际上控制相当的严格。他需要这个政党，但是他怕的一点，也是他怀疑的就是政府，就因为这个，他就把所有的工人组织派到那些政府部门，而把那些他认为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人赶下了台。

在阿尔巴尼亚革命化运动当中，我们不是讲叫他文化大革命，而是叫做革命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有阿尔巴尼亚特色的一点就是，阿尔巴尼亚反对所有的宗教组织，实际上是像红卫兵那样，高中生阿尔巴尼亚的高中生冲入了所有的阿尔巴尼亚的宗教机构，并且关闭了那些宗教机构，当时没有什么法律来限制这样的做法。从此阿尔巴尼亚在宪法当中，就宣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话的国家。这是在上世界上是首创的。这实际上是像中国的说法，宗教是人们精神的鸦片。还有一点我想讲呢，我们的所谓的小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铲除所有的私有财产，哪怕是家庭原来的那些自留地，都被农村集体化了。还有家里养的那些仅有的几个家禽，也是收归农村集体化所有。完全没有私有化的财产可言，国家生产钮扣和拖拉机，几乎什么东西都包了，但是这个市场上，却没有最基本的那些商品和消费。

在阿中关系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也就是我们之间所谓的蜜月时期受到了破坏的时候，就是美中缓和，以及建交的时期，尼克松访华之后呢，中美建立了关系，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完全反对中国的这个做法，并且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事实上呢，霍查作为党的领导人，从历史上来看，一直二战以来，他一直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领，他执政 40 年，他是马克思主义坚实的捍卫者，他认为他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他和铁托断绝关系，后来又和斯大林断绝了关系，指责铁托而苏联和铁托关系好起来的时候，他又指责了这样的做法。从此他就和苏联的关系交恶一直到 1961 年。而和中国的蜜月时期就来到了，于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大量的援助。阿尔巴尼亚对此十分的感激，而且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帮助。72 年霍查是不能接受中美之间的这些缓和，关系一直恶劣到，中阿最后只剩下外交关系，这实际上是阿尔巴尼亚固步自封的一个典范。从此阿尔巴尼亚和世界几乎隔绝，这也使得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人们对此表示不满意。那霍查死后，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希望他的继任者阿利亚能够改变他的政策。

希望他成为巴尔干地区的戈尔巴乔夫，但是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自从柏林倒塌之后，阿尔巴尼亚的围墙也不应该继续保留在那里。至于讲到中阿之间的关系，我想说今天阿中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友好，而且他们是基于一个新的基础上，摆脱了以前的意识形态的包袱。基于相互之间的利益，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这也有利于一个真正的冷战后文化的形成。我们看到双边关系更积极，更富有成效的发展。这对于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是有好处的。我讲的相对比较短，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讨论，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章百家：我们两个非常好的发言人，他们讲了一个，大家都很关注，但实际都了解很少的故事，下面请大家提问。

老外：我想问两位一个问题，能不能更详细的谈一谈，阿中缓和的具体的细节。在 60 年代霍查给予中国很多支持。他应当不会是无因之果，所以两国关系缓和，他的根源在哪儿。跟苏联有没有关系，是谁更主动一点。是阿方还是中方呢。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缓和。

卢西：非常感谢你们两位的演讲，我现在想问关于文革的事情，我有两个问题，在 66 年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有几个东欧国家的政党，包括越南的政党，他们就把红卫兵称作裴多菲俱乐部。并指责他们是反革命的。所以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东欧国家，都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个反革命。或者是一个极左的思潮和运动。我的另一个问题是，东欧国家是否认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中共党内的权利斗争的体现。或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第三个问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在 79 年之后，中国至少给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看来，是更实际了，更务实了，我曾经看了所有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政党，在 67 年和 80 年之间的政党会晤的记录，当时希望东欧国家对华步调一致，但是让我发现有一点很奇怪，在 69 年的时候，却没有一致的行动，是不是东欧国家对于 69 年的时候发生的事件有更一些微妙的看法。谢谢。

阿诺：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中方。这是关于文革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我们知道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在文革开始后几乎一夜之间就恶化了。竟然我们看到有报道说，有边境冲突，那么当时北京是怎么看的，他是不是认为，朝鲜他是背叛了中国对他的支持呢。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在文革期间总的发展方向。这方面研究很少，我们所知甚少，我们希望中方同事能多告诉我们一点，有一些外国学者，他们说中国在文

革时期，实际上是向内看了，断绝了和外国交往和接触。比如说，在越南问题上，我们前面已经商谈过，文化大革命在这一个对越问题，对越援助的问题上，有什么影响。文革是不是双边关系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越中争吵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与 69 年越南政治领导层的变革有没有关系。

沈志华：我的问题和（麦克）教授有点相似，但是时间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就是霍查他在中苏分裂过程当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因为直到 40 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的时候，当时霍查的态度，是非常微妙的作用，导致斯大林跟铁托之间产生很多不信任的事情发生，1960 年到 1961 年我们现在从中国方面资料看到，中苏分裂和阿尔巴尼亚和法那那，苏联基地有关系，和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关系破裂也有关系，但是我们不太清楚，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霍查，还是霍查利用了毛泽东跟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哪一个更有预谋性，更有预测性，或者你们在阿尔巴尼亚的档案当中，或者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方面，就是在阿劳动党当中，在讨论怎么处理中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谢谢。

李向前：我想问卡普拉尼先生一个问题，刚才讲到阿尔巴尼亚的发生了文化反革命，我不想问相互关系的问题，我想问霍查刚才你讲的，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才这么做，我想就是说，能不能在深入的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会在马克思主义者要消灭的私有制，和宗教，这个情况在 60 年代 70 年代会变成一种现象，我们看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也有所谓的小革命，还有其他柬埔寨这样的问题，他们之间有没有，或者是从文化上，从他的文化传统上，或者从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上，或者是本身的体制上，等等这些问题，是否造成了这种现象，变成了一种非常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另外从阿尔巴尼亚各案看，霍查发生这样的思想，他的根源到底应该怎么看，谢谢。

李丹慧：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 68 年 10 月 1 号包路库来华的时候和周恩来有一个会见，周恩来有没有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一个有中国参加的，包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这几个国家在一起的一个反苏反干涉联盟，有没有这回事，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1961 年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以后，为什么苏联当时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华约国家，一直到 68 年 9 月份，阿尔巴尼亚自己宣布退出华约，我不知道这个是苏联方面，阿尔巴尼亚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考虑。谢谢。

陈兼：因为我们这一节讲的是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早上的时候我离题结果被章百家痛批一顿，所以我想还是要有一个因为我们作为，我也是当事人，文化大革命，刚才那个范大使说了，我们年轻人的一代又是学者，我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是中国对外政策特别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很清楚的反应出来的，刚才讲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越关系恶化中朝关系恶化，中巴关系恶化，到一段时间，世界上就剩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到很有意思 70，71，72 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后走下坡路了，中朝关系从 1969 年 10 月 1 号，1970 年 3 月、4 月周总理访问朝鲜，还有呢，中国同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罗马尼亚的关系，很明显在 1971 年有大回升，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从 72 年以后有很大的改善，同时作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今天早上我讲的，同匈牙利的关系，在 70 年以后，居然第一次，我当时读报很仔细，居然称匈牙利为同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这个大背景看，中阿关系，成为中国外交一个非常时期是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其他国内事情做都乱作一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阿关系好的不得了，等到中

国其他的事情好起来，中阿关系不好了。所以这个事情，怎么来理解它。

章百家：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给牛军。

牛军：我的问题跟上午还是有关系，就是上午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再一次参加学术会，我现在有点记不清的，三四年以前，听到中国学者讲，实际上其实中国在1969年就是珍宝岛冲突的时候，当时有那样的考虑，苏联入侵捷克以后，曾经有不只一个东欧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行动上作出一些表示来反对苏联的这种扩张，因为他们感觉到压力，我看了一下那个时候，大概到中国来的东欧的代表团，一个是罗马尼亚，一个是阿尔巴尼亚，我想问一下阿尔巴尼亚大使，当时阿尔巴尼亚在苏联入侵捷克以后，在对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在访问中表达过什么样的内容。就是在应对苏联入侵捷克这个事情上。

陈兼：还有一点，刚才范大使讲到中国代表团去，叫中国党政军代表团，是史无前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还没有派过这样的代表团。

章百家：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想把这些问题，分成三个组，首先是不是请中方的大使，来谈一谈，文革期间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因为刚才我们有好多问题，是针对这个，然后我们再请东欧其他国家的一些大使，来谈一谈，当时东欧国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最后我们留一些时间给卡普拉尼先生，因为刚才有好多问题是向他提出的。哪一位大使讲一讲，文革期间中国对外政策的评价。

李凤林：我认为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实际上是失控。当时的情况实际上全国主要应付的，是国内问题。那么国内的动乱，使这个外交呢，因为外交部还出现了一段夺权的问题，就是造反派夺权，那么在那样的一种非常的情况下，那种极端主义革命思潮的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外交是很难说，有一些很具体的政策来执行，那么只有一个口号，或者一个方针，反帝必反修，那么实际重点呢，实际上是要反修。因为这个反修呢，又对内又对外。那么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一个反修的问题，所以呢，就出现了同朝鲜越南，古巴关系恶化的问题。另外还可以讲一点就是当时的外交实际上呢，是思想意识化，那么外交的任务，就是要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就是中国当时的外交，我的理解。我要是说的不对的话，请各位纠正。可以请余教授讲一讲，他是很有研究的。

刘彦顺：在那个时候，外交失控举一个例子，在1967年的夏天，我们当时驻东德使馆，有几位同志，乘自己开的车子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路上发生了车祸，车子给人家大卡车撞了，我们里面有的人死掉了，只有个人活着，这样使馆里的人，根本不向国内请示了，断定这就是修正主义要谋杀我们中国同志，在使馆门口呢，打个大标语，这个大标语是打倒德国修正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车祸发生了以后，是很明显的车祸了，德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外交礼貌到我们大使馆来慰问，结果我们使馆的一个人，不让他进来，而且骂他。但是这个事情呢，国内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周总理就立即做出批示，他说这个车祸的事情要调查，因此呢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德国去，他说这个事情一定要调查以后才能做结论，因为总理看那个，他认为这个可能性德国人这样做可能性很少的，因此他就这样一个，这样的话，我们外交部的造反派说周总理立场不坚定的，因此周总理在接见造反派的时候也讲了，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发生过车祸，也死了人，当时呢，有人怀疑是不是特务搞的，后来经过调查是人家误伤，人家并不是要打死我们这个人，这个案子了，讲的一个例子，这个失控的情况，不仅发生在驻东德使馆，很多的地方，并不是当时中央做出新的决策，而是在外交，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对外交事情本身，整个我们的路线，在很当具体的案件发生，是下面的一些同志，所采取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另外呢，在那样的情况之

下，很多的关系都是不正常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东欧国家对我们很警惕了，关系不正常了，我们当时有一个在东德的他的共产党里面，有一个党员，这个党员呢，是在 1956 年的时候，他原来是在 30 年代在天津经商的，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后来解放以后，又回到了东德以后，他成了共产党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他对中国感情很深，他不愿意批判中国，德国很重视这个事情，找他谈话，要跟中国的毛主席划清界线，他坚决不划清界线，后来到中央，有个中央委员找他谈话，找他谈话以后，他思想不通，那个中央委员说的，你这个同志啊，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好你这个问题上，不能跟中央保持一致，你必须离开统一社会党。到东德和中国关系好了以后，才恢复了党籍。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很多具体的情况，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对普通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时有少数的人，有这么一个例子，当时有个东德的留学生在中国的，他要结婚，到了 1966 年的时候结婚了，结婚了以后，两个人到了德国去了，到了德国去了，这两个人很使馆，包括我本人，一直有联系的，当时我们过去对他们的看法不大好的，他们在德国的生活遭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个困难很多的因素，我今天不讲了我只要讲一点大家清楚了，两人结婚了以后，他们再回到中国看看中国，这个女的经过了 17 年之后，他在 17 年在德国回不了中国，这个男离开了中国 14 年之后，又回到北京来看看。我又把他们两个，他们这两个人的这个几十年的遭遇，写一篇文章在一个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人看了这个文章问我，这个情况很有意思。我讲这个情况，当时的影响很大。

章百家：下面我们请罗文斯基讲一讲。

罗文斯基：我是学者，不是外交家，我想说几句话，关于如何我们在东欧，看中国文化大革命，就事论事，苦口良药，所以这个是出发点，现在我讲英文。

文化大革命在 69 年 66 年到 69 年是他的高潮。在中东欧也有很大的影响。不只是那些支持毛主席的人，还有那些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艺术文化以及很多的方面，第二点呢，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发生，就滋长了强硬派在莫斯科和许多东欧国家的势力。在外国公众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就是这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想推广，毛氏的共运的模式。对不起我可能措词比较激烈但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么看的，但他们觉得，毛泽东这体制还不如他们的体制好。甚至不如苏联的体制。所以当时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就是对苏联的制度比较乐观，但对中国的制度比较悲观。这是当时人们所面临的两种选择，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当时被我们看来是想把革命传播到其他国家，是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利，尤其是林彪的一篇战争，人民战争万岁，那么当时，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也被传播到了国外，广为人知。所以那些关于缓和防扩散，减少军备的那些话题，都和他完全抵触。

当时在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有三篇社论，调子都非常高，但是这也必然的反应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面。所以中国领导人是在很多年后，才理解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大家去调阅 70 年 76 年一直到 89 年的波兰方面的文件，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见中国外交政策在当时的转变以及在东欧是如何被人们看待的。这一个外交政策的转变，有许多成分，但是如果没有 78 年 12 月份那次政策转变，外交政策这个转变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中国决定对外开放，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从传统的意识形态至上，到转向务实。开始变得实事求是了，并且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章百家：我们下面还有五位先生。要做评论，所以我希望每个人只有两分钟，首先请施罗德先生。

施罗德：我记得文革当中有一段，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社科院，试图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有人跟我说，他们希望了解文革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结论是，他们在内部谈论，防止反革命夺取政权，因此要有一个非常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他必须建立在强有力的党内纪律的基础上，党要对社会所有部门实施最多的控制，这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的理解来说，文化革命没有推进民主，而实际上是党内在关于社会制度的争论方面的一个相互的较量。但很快这种探讨就被制止了。

俞邃：很简单，讲一点看法，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可能用混乱这个词来总体概括比较好一些。因为国内的形势比较混乱，外交部的领导的班子也处于混乱状态，所以总体上来讲处于比较混乱的这个情况，但是有几种情况，当时带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是毛泽东本人加上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因此在处理对美关系以及对付苏联这个重大问题上，利用乒乓球这个小球推动大球，这个是清楚的，另一方面跟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我赞成李大使的说法，可以说是失控，或者说基本失控。但是也没有说跟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冲突，或者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总归来讲还是混乱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某种失控。再一个领域，就是跟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基本上，是动静不大，或者叫无所作为这个期间没有出现在关系上一些新的突破。我想这样描绘文化大革命的状态，是不是比较合适一点。

罗明：我必须承认，范大使关于中罗关系在文革期间的描述是正确的。罗马尼亚没有以任何方式介入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罗方没有支持文革，这和阿方的做法不同，所以我们就没有和中方关系的春季和冬季了。即使在76年之后，我们和中国还是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和批评文化大革命的国家站在一起。一点都没有。你应该知道，在从66年到76年整整10年，在罗马尼亚的报纸，在我们的杂志上，从来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内政的批评的表达。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不应该介入他国的内政，但是这也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意识到了，我们在中国面前，没有力量去阻止，没有办法去影响中国发生的事态。在文革十年中，在中罗之间，我们有很多互访，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访问，从中方访罗的，除了这些访问呢，我们还有中方对我们的援助和贷款，在71年的时候我们遭受了洪水，中方给我们非常慷慨的援助，我们的人民非常感激。与此同时，在这些年中，罗马尼亚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这就包括美国，包括奥地利，意大利，包括北欧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且在71年72年之后，尤其是在72年之后，罗马尼亚在帮助中国重返国际大家庭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最后一件事，在那些年代中，罗马尼亚的文化音乐，电影，在中国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我和我在上海新疆的许多朋友，都见面了，他们都记得，罗马尼亚的音乐，罗马尼亚的电影，哪怕是在文革期间，罗马尼亚的文化艺术也得以在中国上演。我们当时的合作还是有成果的，对我们上面都有好处。

卡普拉尼：我会说的非常简短，有些问题和我相关，我谈一谈，霍查作为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么一个问题。许多西方的分析家当他们比较霍查和包尔布特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法国受的教育，他们觉得，法国受教育和极左思潮是有一定的联系，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站得住脚，但是经常有人这么说，在阿尔巴尼亚呢，霍查他是在二战时候取得名声的，跟铁托在南斯拉夫的情形相似。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声明和威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人可以置疑他的任何做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态。权利是会腐败的，绝对的权利绝对会腐败。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有必要说一说，李丹慧女士曾经提到，周总理曾经访问巴尔干半岛国家，他

就问到关于一些国家的盟友关系的时候，为什么赫鲁晓夫没有把阿尔巴尼亚踢出华约，那么我知道霍查他拒绝这样的一个决定。不想和铁托一样，他曾把铁托比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特洛伊木马，至于阿尔巴尼亚退出华约，我得说双方当时其实都挺谨慎，在苏阿断绝外交关系之后，苏联在阿尔巴尼亚的海军基地，仍然存在，但是在 62 年的时候，霍查就把这些潜水艇据为己有，说这些是我们的。只有两个是苏联人的，你们两艘船开走，其他的四艘或者五艘得留下，苏联没有把阿尔巴尼亚踢出去，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 68 年的时候，霍查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退出华约的时间了，因为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说，我们不想和华约有任何干系了，当时国内国际上的反应都很好。另一个问题就是，中阿后来修好根源在哪儿，这实际上是双方面的，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认同，敢是存在的，双方都接受，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说，应该不停的进行革命，以维持社会制度，防止被资产阶级腐化，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另外现实因素呢，阿尔巴尼亚和苏联交恶，他没有可以依靠的朋友了，所以阿尔巴尼亚就指望中国，可以把中国视作一个很好的盟友，不光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他可以给阿尔巴尼亚以实际的援助，而且实际事实也是这样发展的，所以既有意识形态也有务实的角度，所以我说对双方来说都是这样。

罗明：就我记得，在 61 年的时候，华约的咨询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防止阿尔巴尼亚代表参会，罗马尼亚是支持的。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犯了错误，是因为这一点，中国朝鲜和越南的观察者就没有参加那个会议了，这是在 61 年时候发生的事情，在 65 年 1 月份在华约同样是那个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罗马尼亚希望重新让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亚洲的三个观察国参与会议，但我们没有成功。

章百家：我们这个讨论必须结束了。

3 月 25 日

阿诺：首先我要感谢党研室对我们的热烈欢迎，以及他对我们的宴请，这让我想起我来的第一个餐馆是 25 年前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北京烤鸭令我印象一直很深刻，在我向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一个议题的时候，我想讲一讲昨天的讨论，这是根据昨天讨论的情况做的一个总结，我想昨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每个人都参与了讨论。每个人都积极的参与，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各位大使来自中东欧的大使们，提问都很直接回答也很直接，我们很感谢，我想提出一点，也是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做到的，首先就是我们似乎太客气了一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时期，是充满了矛盾困难的时期，我们似乎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太礼貌了一些。似乎在中国大家特别注重礼貌，认为这样做比较得体，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对主人的尊重，但是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讨论历史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很好的利用机会，进行讨论，你们不能把你们当时工作的经验，以及看到的事情讲出来，那么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的损失。所以我第一个要求，或者说是请求，也就是我对昨天的评论，我希望大家能够更直接更坦率，哪怕是比较苦难比较难起口的问题，第点就是，对于各位在座的学者，我想大家提的问题都提的很好，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切题，最好是讲到那些比较特定的事件，能够直接问那些当事人，他们参与的事件，你们可能准备了一些问题，我看了，我觉得也很有帮助，谢菲尔先生就准备了一些，但是什么时候问，问哪些问题，请希望你们能够注意

到，问的问题一定要切合当时的议题，章百家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议题，也是第四议题，就是苏联侵捷克，以及中苏边界冲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1968年到1972年，三个问题总的来说需要讨论的，在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看一看，中国当时的看法，以及决定，也就是北京关于苏联侵捷的反应，尤其是中苏69年边境冲突之后，是怎样影响了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制定。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在下面一节讲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这个事件有没有影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节的讨论，第二点，在东欧方面来说，东欧当时认为，中国和苏联之间，有没有可能发生战争，可能性有多大。你们那时候是否知情，这个战争是不是很可能爆发。当时东欧各国的政府的立场是怎样的。第三点呢，就是关于中国和东欧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71年72年期间，当时有相对缓和的趋势，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你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中国企图一起缓和局势，尤其在中苏冲突的时候，那么在中国方面来说，中方是采取了怎样的努力，来缓解当时的紧张局势，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议题要讨论大部分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会请罗文斯基先生，再请朱先生谈一下。

罗文斯基：非常感谢，首先我想谈一谈，关于苏联侵捷的问题，然后我想谈一下中苏69年的边境冲突问题，苏联侵捷，以及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运动，表明苏联想对当时捷克的局势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涉，当时各方需要对局势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布拉格之春在捷克方面，想打破一个恶性循环，这是一次改革行动。但是在苏联方面，他们的那些想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们想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扰。同样在这样的经过下，我们必须考虑到当时各国内部的保守派，以及倾向于苏联领导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冲突。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许多国家，都希望有更大的自主性。罗马尼亚呢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主要指他的外交，而不是内政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之后在捷克方面，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改革的迹象，但是从外界来看，苏联希望把这种改革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我想说的是，布拉格之春并发是发自内心的自上而下的反抗运动，他和80年代在波兰发生的情形是不同的，他不是一种推翻现存制度的努力，而是希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平的改变制度，并且能够希望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他希望能够实现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从杜布茹科那里受到一个启发，而有的想法。苏军侵捷是为了能够镇压在那里的改革倾向，并且能够杀鸡给猴看，在一定程度上惩戒其他的东欧国家。中国当时的立场非常坚决，就是反对苏军侵捷，但是我在这儿必须很坦率的说，当时在西方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反抗的声音。

但是当时很多国家认为这些声音并不是主要为了维护国际法的那些原则，其他国家都把这视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夺领导权的一场斗争。当时对于布拉格之春中，受到迫害的领导人，他们曾经受到了很多的指责。当时有人说，毛泽东的思潮比苏修更右的想法。是苏修和铁修勾结的结果。我在这儿想比较坦率的说，布拉格之春是当时的一个唯一的希望。但是我想说，另一方面也有一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说，如果你们记得中方在56年匈牙利事件中的态度，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我们今天看，是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当时有一些东欧国家，他们的领导人，他们并不赞成中国领导人的主张，我想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当时有一些人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对捷克予以支持，但是当时各方的考虑是基于一些因素，就是觉得各方有没有必要去介入，防止苏联侵捷。当时东欧各国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波兰匈牙利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在68年3月份的时候，隔莫而卡在波兰他的地位并不是特别的稳固。当时在波兰国内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以及对他的不同认识。所以当时就有人对格末而卡说，有一个其奥赛斯库已经够了，

我们不想有再多的。所以我们如果有历史的深度，回头看的话，当时的事件是非常让人惋惜的。

但是回到我们讨论中来，那么我们认为尤其在波兰，社会各层之间的一种交流和一种相互之间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时苏军侵捷他就引发了人们一场辩论，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他的主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尤其是为了保护社会主义的名义，到底是否应该进行武装干涉。苏联有没有权利在他所谓的势力范围内，就是东欧进行武装干涉。从历史的事件来看，在布达佩斯，在华沙，在索非亚，或者在东柏林，各方的态度都不一样。中方和罗方当时的意见是，他们绝对不赞成苏军侵捷这样的立场是我们现在很容易理解的。那么在南斯拉夫他的公众对于苏军的行动，也非常的不满。有一些公开的指责。好，下面我们谈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这一个话题很难谈，李丹慧女士，牛军教授，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著述，所以我就泛泛的谈两点，从我们在东欧来看呢，中苏的边境冲突，并不是问题的原因，而实际上是中苏分裂的一个后果之一。他不是因而是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苏边境冲突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是符合逻辑发展的。那次的事情在67年的时候，在朝鲜和在越南也有类似的事态发生。69年的边境冲突反应了莫斯科和北京他们希望争夺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权。决定他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由苏联还是由中国来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他们为了他们各国的国家利益来进行争夺。因为双方当时在根本的战略方面，就有不同的看法。双方在各自的社会中，都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而且相互的立场互不相容，也拒绝理解对方的立场。尤其在普通公民中，都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就使得局势后来发展的比较糟糕。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如果公众中有这样的情绪的话，那么迟早他都会发展成一个具体的关系到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方面争夺的事件，这在整个世界史上来看，都是不可避免的。中苏边境冲突也不例外。

当时双方都可以希望借这样一个边境冲突，可以转移国内的公众，对自己国内社会问题的关注。而且把它鼓吹为一种爱国主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对于转移视线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随着边境冲突发生以后，他就成了内部各国内部派别争斗的一个工具，他就难以制止了。随着冲突的深化，双方在那边的军事集结都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边境冲突的时候，在双方都有非常强烈的内部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中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曾和一个访华的日本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团谈到波兰的问题，这个我一会儿还要讲，但是69年的珍宝岛事件，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而其中的很多内部的事件，到现在还没有披露出来。我们也无从知道。因为我们很难知道双方各自当时内部的讨论是怎样的。在苏联方面他们有什么考虑，有什么争论。他们当时有一种争论，就是他们在军事冲突方面，应该走多远，在多大程度重复68年侵捷的事件，他们是否应当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阿诺：还有一分钟了。请您进入您的结论。

罗文斯基：但是关于当时中苏之间争论，他们的背景，到现在我们来看，还是很模糊的。中方领导人的考虑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当时中方的观点是既要反帝也要反苏，尤其是要反苏修。但是这对边境冲突有什么影响呢。我想这个问题还有待回答，一会儿我们的中方同事给我们一些他们的一些想法。作为我们来说，总的来说，我们是不愿意中苏发生战争的。这是从我们的国家利益来考虑的。我们希望试图阻止中苏交恶。对于华约国家来说，中苏如果发生战争的话，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综合考虑，国际何国内的局势，以及考虑之前发生了

68年的苏军侵捷事件，此与我们如果再考虑各国内部，在意识形态方面在经济方面，以及在民众情绪方面的各种考虑来看，这场冲突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之后在69年在莫斯科曾经有一个会议，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外交解决。能够把局势控制住，这种外交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中国在69年中期实现了他内部的外交政策的转变，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您做的开场白做的很好，您讲话很直接，而且很到位，对我们帮助很大，那么我们再请朱大使讲话之前，我们达成了一个一致，就是约尔士在这个问题上，对中苏边境冲突上讲了一个讲话，我不会马上请您讲，但是在朱大使讲了以后，也是在我们的讨论开始之前，会请您讲一讲就是叶同大使，然后我们再开始大辩论，我们这个议题可能会讨论时间长一点。然后叶同大使在下一节讨论当中，时间归短一点。

朱安康：我想先着重谈一谈，我们同东欧的国家的关系，其他的在讨论过程当中在谈。苏军侵捷和中苏边界冲突以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变化。我们同罗马尼亚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对南斯拉夫的关系由坏变好走向正常化。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由好变坏，逐渐恶化。同其他五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先冷后温的变化。我首先谈的中罗关系。这一个时期有几件事情，对中罗关系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个就是苏军侵捷。在苏军侵捷以前，罗马尼亚曾经多次通报中方，苏联即将侵捷罗马尼亚希望了解中国的态度。1968年8月21号晚上，罗马尼亚领导人布德拉拉西紧急约会我们的代办，说苏军已经入侵捷，罗马尼亚面临大兵压境。已经处于战争的最前线，罗马尼亚决心抵抗侵略斗争到底。不做任何妥协，罗马尼亚想知道，能不能够得到并且依靠中国的支持。8月23号晚上6点，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紧急约见周恩来总理，通报情况提出有关的问题。6点30周总理临时请示毛主席，决定亲自出席罗马尼亚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并且在讲话当中强烈的谴责了苏联，表示坚决支持捷克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强调罗马尼亚正面临着外来干涉和侵略的危险。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罗马尼亚总理事后在一次讲话当中说，周总理的声明使罗马尼亚在最关键的时刻得到了最关键的支持。另一件事情就是，1970年罗马尼亚发生了大水灾，不久以后又发生了地震，损失非常惨重，罗马尼亚政府向国际社会求援，当时苏联反应冷淡，甚至于有人想趁机向罗马尼亚施加压力。中国当时无偿提供5000多万人民币的物资援助，到12月份还应罗马尼亚的要求，向罗马尼亚提供了2亿人民币长期无息贷款，和一亿美元的自由外汇贷款。1971年其奥赛斯库总统访华时又增加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罗马尼亚上下都很感谢认为中国是真诚的援助罗马尼亚。第三件事情是罗马尼亚在这个时期积极的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早在60年代罗马尼亚就替美国传话，1970年9月29号尼克松发表谈话，想到中国去访问。10月1号毛泽东主席和美国记者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在这些信号以后，10月下旬尼克松会见其奥赛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压的时候，又一次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11月份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列斯库访问中国，向周总理通报其奥赛斯库和尼克松的会见情况，并且传话说，尼克松对寻求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变化十分关切，尼克松请齐奥赛斯库转告中方，美国准备通过任何途径，任何地点任何时候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改善两国关系。齐奥赛斯库说，没有中国的参加，目前的重大国际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尼克松对其奥赛斯库这个说法表示理解，而且说他有同样的看法。

周总理当时给罗马尼亚副总理说，中美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关键就是台湾问

题。尼克松现在真有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派特使来北京会谈。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应该说，1971年和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来华，罗马尼亚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一件，罗马尼亚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段时间积极做一些国家的工作。罗马尼亚还为推动一些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做了大量的努力。中国对这一点是很感谢的。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实际上在1964年前后，中国和南斯拉夫都试图调整关系，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明显的进展。苏军侵捷促使双方加快了调整步伐，这第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1968年10月1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坝了库说，南斯拉夫可以成为我们的间接同盟军。在这同时中国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宴会上，第一次在讲话里面，没有批判南斯拉夫。1969年5月，中苏发生了边境冲突以后，中国政府关于冲突的声明当中，第一次谴责了苏联在威胁南斯拉夫。1970年5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南斯拉夫代办握手。南斯拉夫代办祝贺我们中国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祝南斯拉夫发展。铁托总统对这些信号在内部表示非常高兴。认为双方有了共同点，在这以后，中南之间就逐渐停止了公开的论战，先后派出了新的大使，加强了经贸合作，增加人员往来，恢复了文化交流。

南斯拉夫新大使到1970年到任以后，强调在反帝斗争中，中国可以把南斯拉夫当做同盟军。过去的事属于过去，我们应该向前看。1971年6月，南斯拉夫外长德帕挖次访华，这是从南斯拉夫和中国关系破裂以后，第一次政治访问。以后我们的副外长也访问了南斯拉夫。在会谈当中，双方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南斯拉夫方面强调，双方共同的利益，大大的超过了分歧的意见。中国方面指出，我们处理关系的时候，应该求同存异。1975年10月6号，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的主席，比也里奇访华，这次访问很成功，为铁托访华铺平了道路。铁托访华问题我不想说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昨天大使和卡普拉尼先生谈的很清楚我不说了，我谈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苏军侵捷以后，在初期五国对中国的攻击加强，各方面关系停顿。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会见以后，五国一方面配合苏联劝和，一方面也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采取了主动的态度。要求同中国改善关系。双方的关系逐渐升温，这个时候的特点，是对中国的攻击有所减少，要求同中国恢复和发展关系的表示增多。各方面来往逐渐恢复，贸易额普遍大幅增长，东欧五国间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继续坚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对东欧在这个时候继续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但是我们已经逐步的在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做法上越来越合情合理了。我们把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分开。不谈或者少谈分歧，只谈国家关系。我们把党和国家的关系分开。在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发展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我们采取积极的态度。

我们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在政治关系成熟的时候才做，否则我们就不做。在经济方面，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另外我们也很注意，不强人所难，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少说多做。一般我们也不采取主动，避免对方造成误解，给他们造成困难。我们以匈牙利为例，匈牙利总理1970年6月份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到中国，或者去越南的途中路经北京的时候，同周总理会见，不久以后我们就表示欢迎。以后匈牙利又提过几次这个问题。我们内部分析，夫克和卡大尔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友好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难处，到底能不能来还是在两可之间。1972年2月副克访问越南的时候没有来中国，原因就

是因为其他的人阻挠。我们当时是持理解的态度。但同年9月份，匈牙利一个副外长，他访问朝鲜的时候，他内部要求访问中国，在中国访问过程当中，态度友好，他只谈发展关系问题，不谈国际问题，只谈双方的共同点，不谈双方的分歧。73年2月份，匈牙利外长在巴黎，参加越南问题国际会议的时候，三次主动的要见我们的外长，他希望有机会能够访问中国。并且强调说，他这个举动，是受到匈牙利党政和人民的支持的。在这前后两国逐渐实现了外贸部长，卫生部长，多起副部长的访问，两国的贸易额从1970年时候已经达到2300万瑞士法郎，比69年增加了27%。就是我们区别对待的政策，应该说体现在这些方面，最后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不仅对匈牙利如此，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好了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朱大使的发言，对不起必须让您现在就停止了，但是我希望我们一会儿有更多的时间讨论，但是您的发言非常好，尤其是关于中罗关系的以及中南关系的谈话。你的很多观点，我们此前都没有听见，一会儿我们可能会有朋友，还要问您问题，那么我们还想知道，和中苏边境冲突直接有关的东欧国家他们当时的态度立场是怎么样的。下面我想请叶桐大使发言。

叶桐：我想补充一些，刚才罗文和朱大使讲的话，我特别高兴因为到现在的我们的研讨会上还没有机会谈匈中关系问题。这是个特殊的问题，现在也没有时间详细的谈，我们方面也是分开政策朱大使，分开政策，论战一开始的时候，党中央和外交部要求我们把这个党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不要混为一谈。另外外交部也要求，外交官尽可能避免跟中国的外交官争论。这就是把争论和外交相隔分开，在1978年这个世界会议上，卡塔尔讲的很清楚，他说当然我们跟中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这是理论性的，但却并不是外交的任务。这是他的话，另外还打算跟中国的内政，和中国的对外政策隔离分开，按卡塔尔的看法，把中国的内部情况，尽可能不要当做批判地对象，这恐怕跟他的战略思想和对匈牙利对内对外政策的考虑有关系的。也跟他坚决反对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开除出去，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两国关系的最特殊的方面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帮助改革伙伴，1978年苏联方在书面上要求匈牙利接待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考察匈牙利，考察改革的经验。79年他们就来了，匈牙利方面为他们安排了近40个项目，使考察团感到满意。苏联方面非常反对这种合作，1980年1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外事部部长，从日本回到匈牙利路过莫斯科。当时苏共中央国际司的司机非常谴责我们在改革方面的合作。尽管如此，这个合作一直继续下去了。

阿诺：对不起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偏题了，请您能不能提一下68年苏军的侵捷事件以及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在以后的会合中谈到。

叶桐：我还想补充一点，1968年对捷克的武装侵略，这个侵略在匈中关系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中国方面批判匈牙利参加这个侵略。当时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中国方面没有充分估计到匈牙利参加这个武装行动，不是很高兴的。卡塔尔劝过杜别且克，好几次，你要做一些让步，因为你还不知道他们，但是捷克方面没有让步。当时我和我的同事，非常明确，对捷克的武装干涉，也就是对匈牙利改革派的警告。谢谢。

阿诺：非常谢谢叶桐大使，那么刚才我和章百家讨论了一下，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按照话题来分别进行讨论，那就是我们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来看，首先我们想谈的，是68年的苏军侵捷事件，现在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问答和讨论。其他问题我们之后再谈，但是首先我想感谢刚才的发言者，下面我们进入讨论68年事件对于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

老外提问：我希望能得到东欧大使的回答，那就是当时罗方已经告诉中方，苏军侵捷已经迫在眉睫，我的理解是，从我看到的罗方的档案来看，罗马尼亚确实事先没有估计到苏军会侵捷这里面有一点矛盾，您能做一点评论吗。

罗明：我同意朱大使刚才提到的，罗中双方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感到奇怪，为什么苏军会侵捷，但是我们却知道他们之前，苏联是准备进攻的。我们也知道这一次侵略可能即将发生，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这次侵略所发生的确切时间，大家应该记得，在当时8月份的时候，其奥赛斯库他访问捷克，这不光是为了支持捷共的立场，这次访问也是为了表示我们和他站在一起，我们在道义上，在政治上，都已经准备好了可能苏军会侵捷。所以，真正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或者我们当时不掌握的，是到底这次侵略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是会发生。我还记得，在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子夜了，我们的外交部长接到了布拉格的一个电话，那是他派出的一个，派到捷克的一个记者向他打来的电话，那位记者先生就说，苏军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机场附近，而且正向捷共的中央委员会进发，而他们正在开会。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把这个消息报给了其奥赛斯库我们的政治局就立刻开会，这是在早晨凌晨两点的时候。两小时后，苏联大大使馆一个信使两到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向我们递交了一封信，告诉我们苏军已经侵捷，或者说即将侵捷。所以我想在这儿重申，从道义上，从政治上，我们对于苏军侵捷是有准备的，我们的军队已经处在戒备状态，我们已经集结了一部分军队，分布在我们和苏联的边境上，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具体的侵略何时会发生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罗明大使，我还想也问中方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你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当时北京的领导人对于苏军侵捷他们具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一些历史学家会说，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在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前奏，之后苏联会突然的增加对中方的军事压力，那么我想请中方的外交官谈一谈这方面的，在中方的情况。

老外：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苏军侵捷他对于中国的感觉有什么影响，他们当时是否觉得，当时苏军在中蒙边境的集结感到特别的害怕，是否会加剧了中方这种恐惧的心理。还是认为当时认为侵捷事件中方可以从中获得政治的利益。

阿诺：中方有哪位大使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让我再把问题重新问一遍，那是中方当时对于68年苏军侵捷第一反应，以及和当时的情况结合起来看，中方领导人觉得是不是苏军对于中国的军事威胁，一下子增大了。先是李大使，然后沈志华先生。

李凤林：这两件事情导致了中苏关系恶劣化的升级，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就中苏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这一点，那么这两件事情也无疑的促使中国人大大的增加了，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进攻的这种准备。这个昨天我已经讲过了，那么从整体外交的层面来讲，那么这两件事情导致中国对安全和威胁的估计方面，明显的开始觉得主要的威胁是来自苏联。那么后续的行动，后面的局势的发展，就表明了中国对外交开始侧重打击苏修，中国从安全的考虑开始考虑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就是69年以后的政策的思路。关于珍宝岛事件，我想讲一点情况。算是我一点材料，供大家参考。首先就是中苏之间的边界冲突，到底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还是结果，我觉得它是一种因果的互动，也是原因也是结果。这个不是诡辩，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意识形态的争论，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那么苏联方面把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边界上的冲突。边界的冲突是苏联方面最先挑起的。那么边

界冲突的不断的积累，从60年一直到69年就发生了武装的冲突。那么至于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这件事情，究竟是林彪利用了这件事情，影响国内的局势，到底这个因素有多大，我觉得还值得研究。

那么这个就联系到我昨天讲的，说黄总长讲到中苏战争的可能性，他是不是主要反应了林彪的观点，还是毛泽东的观点，因为现在有一些文件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一号命令，是反感的。那么毛泽东的这种反感，是因为林彪没有，他是军委的副主席了，没有通过毛泽东这个军委主席，就做出了这个行动。还是说，对形势的看法有不同。这个问题我觉得，还需要历史学家来加以研究。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东欧国家的大使们，就是当中苏边境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东欧国家他们，你们是怎么看待中苏边界冲突的这种起因，包括对中苏边界历史形成到底是怎么看的。

阿诺：非常感谢李大使，您的谈话非常有教义，我能不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当时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您当时在哪儿，就是在69年冲突发生的时候，您任什么职。

李凤林：当时我在莫斯科，但是因为我是从1964年就参加边界谈判的，所以对于中苏边界的这些问题，我还是有相当的了解。既然问到，我还可以讲一点具体情况，就是珍宝岛事件，因为珍宝岛的这个冲突呢，是从3月初就开始，冲突主要的特点，为什么发生冲突，主要是在中苏边界东端的岛子上，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岛子上，那么冲突发生的原因，就是中苏双方对这个界江上岛域的划法是有分歧的。这个分歧产生的原因就是1861年，中俄之间边界条约有一个附图，这个附图上有一条红线，那么按照国际法，因为是很小的比例尺的图，那么这个红线只表明两国的边界是以江为界的。这是1861年的事情，他不可能表明江上岛域的归属。那么中国方面的理解，是按主航道中心线。那么中国，中国人一般的就到这些岛子上，去做一些生产活动，打鱼等等。那么苏联的地图，是把所有的岛屿，都划入苏联的境内。基本上就是划在中国的岸边，而且苏联的边防军就以这个图，他们有10万分之一到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用这个来控制。中苏关系友好时期，那么中国人到岛子上去活动，那么苏联的边防军一般也就不管了。那么关系恶化以后，那么苏联方面开始严格的控制边界，就是按照他们的地图来控制这个边界。那么对中国去活动的人加以干涉，非常的粗暴。而且打死了我们很多的人。那么经过许多的事件之后，一直发展到69年，就发生了武装的冲突。大概的过程就是这样。所以我说，边界冲突是中俄关系也是原因，也是结果。

阿诺：非常感谢李大使您的谈话，您的谈话非常有用。我想陈兼先生您等的很久了。您说话的可能东欧方面的某一位大使，可以准备一个答案，来回答刚才李大使的问题。

陈兼：其实我刚才最初要提出问题，被文安立提出来了，我进一步接着这个思路，讲一个问题，因为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这个事件，对中国对外政策和他一系列内外的考虑，影响极大，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就造成了中国整个内外政策当中一个基本定义的变化，把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提出了。那么这个概念提出的结果呢，实际上面就为我们下一节中美缓和创造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因为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那么美帝国主义就成为一个次要的敌人，就可以这么做了。那么同时来讲的话，

好像同当时整个文化大革命，全面退潮，因为当时正在筹备九大，而且苏修侵略捷克的时候，又是毛主席在整顿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很明显的斗私，所以如果把这一系列事件结合起来的话，我就觉得，对刚才李大使后来讲到的，珍宝岛事

件，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来理解，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从现在各方面的材料来看的话，珍宝岛事件本身是中苏边界问题发展的结果，这个事件本身来讲，又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段时间内，有组织有准备的就是这个地方要教训一下，要打一下一个解决，3月2号的事件特别是。然后呢，反过来来讲，这个事件接下来到了1969年全面备战那样一个局面，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好像就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单单从一个捷克本身对外政策不能解释了，这始终是我一个疑问，因为这个问题关系极大，不仅关系到中国对东欧政策和对苏政策的发展，实际上关系到中国整个内外政策走向的一个发展。所以就这一方面，我要请教我们李大使和其他各位大使，不知道在这一方面，你们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法。

阿诺：非常感谢，下面沈先生。

沈先生：我是想把问题问的具体一点，因为苏联侵略捷克这个事件，中共中央毛泽东肯定有反应，但是你让我们这些大使来谈，恐怕不大现实，我可以把问题问的具体一点。就是捷克事件发生以后，你们当时中国在东欧各个国家的大使馆，是否接到过北京发去的一些通知，决定或者消息什么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或者分析当时这个背景的反应。那么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东欧各国的外交官，就是因为入侵捷克是华沙条约国的一个行动，在此之前一定是有部署的，是有安排的，那么在这个安排和部署当中呢，究竟得到了莫斯科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可以分析这个信息，就知道他的这次行动，有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反应，是怎么考虑的。完了。

阿诺：非常感谢沈教授，您的问题问的很好，那么东欧的大使当中，有谁愿意回答问题呢。请叶大使。

叶桐：当时啊，边界冲突为什么发生呢。哪一方面主动，哪一方面被动，我们不太了解不清楚。那么当时怎么来解释这个冲突，这个武装冲突，我们认为要做评价，要把文化大革命作为背景，因此呢，我们认为，首先跟中国内部的斗争有关系的。中国方面提供的信息，几乎是没的。苏联方面的信息很多但是呢，

李：你们相信苏联方面提供的信息吗。

叶桐：这是另一回事。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卡塔尔本身也对苏联方面提出的信息和材料，他有怀疑的态度。因此他说，我们不要总是批判中国的内部情况。但是这个冲突的问题，我们认为最主要的背景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正在那个时候内部进行的斗争。

阿诺：那么陈先生刚才还比较委婉问了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希望中方一会儿能回答，但是首先请东欧方面，

罗明：就罗马尼亚政府来说，我们认为69年的边境冲突，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这是一个边境问题，双方的国界如何划线，另一方面就是冲突本身，我记得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我记得从64年开始，我方领导人和中国的大使一直有联系，而且我们的领导人访华的时候，也和中方谈到了中苏边境的问题。我们一直是有沟通的。我们当时也谈到了，两方面的问题，既谈到了边境划线，也谈到了可能发生的冲突。当时我方认为，苏联没那么傻，他不会主动挑起冲突，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认为罗方领导人，不认为中苏之间真的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军事冲突这一方面的情况，至于中苏的边境划界问题，我们当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边境划线的问题。而且从62年开始，我们自己的边境问题，在中罗领导人谈话中，也就得到了反应。我记得，我自己当时就是翻译，当时中方编辑一本小册子，中间提及了中苏边境问题的一些具体情况。这是一份历史文件，他把这个文件提供给罗方领导人。那么我们就希望利用这个

机会，向我们的中国同事表明，至少就我们国家的边境问题来说。历史和现实是有一定差距的。谢谢。

阿诺：先提两个很快的问题。然后是我们大使回答。

老外：李大使问您一个问题，我看到苏方克格勃的报告，当时苏方说是中方先挑衅的。当然克格勃也有可能是有意欺骗苏联领导人。昨天您提到 69 年的时候，大使馆方面的情况，您当时或者说大使馆，当时有没有试图影响北京的决策。你们有这样努力的话，你们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因为当时的北京决策者会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

李凤林：捷克事件发生后，我们怎么样估价，怎么认识，我当时是参与写批判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文章的人，根据我的回忆，当时有这么几点的认识，不一定很准确，第一呢，认为这个行动是苏联霸权主义的恶性膨胀。苏联的威胁更具有危险性。给他戴上社会主义帝国的帽子，其结果促使我国加强对苏联的防范，当时并不认为，这个行动是直接针对中国本身而来，不是刚刚有人讲的那样，这是第一。第二个看法，认为这个行动是东欧一些国家，对苏联离心倾向的发展。苏联为了进一步控制这个大家庭，杀一儆百。第三个看法，认为呢，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加剧，这有利于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改善与东欧一些国家的关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来进一步孤立苏联。第四这个行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调整对美关系。我的回忆大致上是这么一种估计和认识，现在我提一个问题，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很希望得到东欧国家大使的回答。就是在周总理在罗马尼亚大使馆的表态之后，国际反响非常强烈，那么东欧国家的内部本身，怎么评价这个讲话。完了。

阿诺：非常感谢，您是一个很简短的评论吗。

范承祚：我是简短的，我想说捷克受到侵略以后。苏联侵略捷克以后，这个中国据我理解，理论上刚才有同事们已经讲了，提出社会帝国主义，给苏联戴上一顶新帽子，行动上就在外交上，就是开始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就是我昨天也讲过这个，叫做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修。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我可否就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经常忽略了，阿尔巴尼亚，因为在东欧里面，阿尔巴尼亚在这个问题上，昨天我提到了，阿尔巴尼亚对苏联侵略捷克以后，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就是退出华沙条约，中方在这一方面，曾经倍加赞赏和积极支持了阿尔巴尼亚这个行动。当时中阿之间，刚才提到了中罗之间采取了一些措施，中阿中间也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这一年，阿尔巴尼亚专门派了国防部长坝落库，率领党政代表团到中国来。尽管没有像昨天陈兼教授向我提出来的，中国回应的后来去的叫党政军代表团，实际上阿尔巴尼亚派的这个代表团，带有军事色彩的。中方很少有的除了安排毛泽东主席见了巴乐库以外，专门安排了当时特别走红的林彪副主席，见了巴乐库，这不是一般的举动，表明了中国军事方面跟阿尔巴尼亚要大大的加强。我昨天讲到，我们给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时候，苏联侵略捷克以后，我们一下子给阿尔巴尼亚 30 个成套项目，这里面有不少是军事项目。我们整个对阿尔巴尼亚支援 100 亿人民币，60 亿美元里面，军援占到 3 分之一。紧接着，我们这是 10 月份巴乐库到中国来，就是国防部长，11 月份中方就派了一个同样分量，甚至于更加重的一个分量的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去，派一个党政军代表团，中国为了适应这个形势，为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援，派了党政军代表团，当时率领代表团是总参谋长黄永胜，他不是过去岁月那个里面的参谋长，在特定情况，他这个总参谋长非比一般，他是中央文革碰头会里面的重要成员，这个是中央文革的小组，叫中央文革碰头会，这里面周恩来第一把手，下面就是他们了，他的分量很重的，

也掌握军权，代表团里面有意安排了吴德，吴德是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实际上他是北京军区的第一副政委，派了海军司令。

就是显示一下派了这个军事合作这个色彩加浓了，阿方在这个方面，当然做的非常积极了，我最后讲一句，我有个形象的比喻，我说在苏联的眼中，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钉子，罗马尼亚是根刺，捷克只是一个沙子，苏联偏偏对沙子下手，这个刺没有动，因为中罗合作很紧密，苏联不得不考虑，阿尔巴尼亚决心又很大，所以他动手的是动沙子还没有动刺和钉子。

阿诺：谢谢，我们还只剩下 15 分钟了，我希望这 15 分钟能够集中在中苏边界冲突的问题上，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请罗文斯基教授和朱教授最后做一下总结发言。现在我希望其他的东欧方面的代表，能够讲一讲。那在中间呢，我可能会插几句，希望东欧方面的代表能够回答一下，69 年的时候，打仗有多可能，比如说，施罗德先生，你当时是军队里的一个武官也许您更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请您先等一下，我们先请马斯替尼先生问一个问题。请记住我们必须得回答很简单。

李向前：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共中央有电报向各地通报这个事件，向东德通报是说，中国想打这一仗是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准备欧安会，中国希望通过这一仗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和造成影响。我想问一下，施罗德先生，东德接到这个通报什么反应。

老外：在中苏边界的冲突，是在 69 年发生的，他是对布达佩斯特华沙条约，对政治协商组织是很重要，苏联当时对华沙条约的组织成员，加了很大的压力，以增加华沙在亚洲的影响力。我的问题就是，对东欧大使的问题，你们对于苏联的这个想法，是否知情。那么对中方的大使来说，当时中国对此感到恐惧。也就是为了扩大华沙在亚洲的影响。苏联可能会对华发动战争。同时把蒙古加入华沙条约。

施罗德：我想提一下边界冲突的事情，我想说的是在我 71 年访华前，我见到了国防部长先生，他希望我发现中苏边界冲突幕后的情况，尤其在乌苏里江的情况，尤其是珍宝岛发生的情况。这就是说，我们从苏联那边得到了一些通报，所以就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特别确切的消息，所以我当时访华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了解这个事件的真相，然后在 72 年的时候，参加在柏林的一个会议，并且和国防部长亲自讨论这一情况。来谈当时中苏边境冲突背后的情况，所以我想说，就当时我方国防部得到的消息来说，以及当时我们的政治局得到的情况来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消息了。从苏方没有，当然从中方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我们只是得到了苏方的一些内部的通报，而没有正式的通报。而且我们也并不认为他们所说的，都是事实。我想这样说，这一个冲突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更主要的问题，是他幕后发生了什么，就是双方各自国内情况有何变化。双方当时都如何看待他们应当采取如何的战略，尤其是在中方的领导人之间。他们有怎样的战略争论，是不是应该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如何处理和苏联的关系，如何处理和美国的的关系。那么当时中方领导人在这一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所以呢，我认为这主要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一个军事决定。

阿诺：非常感谢，首先是伯恩先生。

伯恩：那么当时东欧到底认为，中苏打仗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那么我认为在 69 年的 3 月的时候，在华沙有一个会议，当时伯涅日涅夫要求东欧国家谴责中国，并且准备苏方可能在远东地区使用武力，我想问当时东欧国家的政府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就是在 69 年的 8 月份，那么有一个

苏联的外交官见到了基辛格，然后当时提到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有这样的记载，那么我想知道当时东欧方面是否知情。以及中方是否知情，以及你们当时有什么反应。

老外：我想不光要看当时苏方的反应是什么，而且还有苏方当时反应有多强烈，那么我们对于苏军对中国军队的打击，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到底伤亡情况是怎么样。我知道，69年的时候，苏方死了58个人，但是中方的人员伤亡却超过3000。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军事打击。那么中方当时是不是以为，苏联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军事威胁。中国当时的伤亡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以及他如何影响中方对于苏联威胁的看法。先请刘大使。

刘琪宝：我们中国，我记得，我们对苏联，当时对中国的政策有个基本估计，那就是他是一夜出兵，希望中国内部发生变化，我们认为他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准备他大规模的进攻中国，但是这种可能性，我们认为是基本不可思议的应当说的，当时中国内部，有些人有另外一种看法，因此我们毛泽东，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一个基本的，就是争取最好的可能，准备最好的可能，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备战备荒为了，这个就反应我们的一个是基本估计，是内部的基本估计，他不可能苏联要大规模的进攻中国，他的困难很大。另外很难想像，他主要的是战略中间，无论美国也好，他的战略都是在欧洲，他这样是很困难的，我简单的讲讲，关于当时珍宝岛事件前后，我想讲一句，这个事情正如很多朋友已经讲过了，有他的必然性，但是这个事情本身来讲，是个偶然性。并不是双方计划好哪一天要打这个仗，是有很大的偶然性，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另外很快科西金跟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见面，至少反应了双方的态度，中国跟苏联都不愿意正面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要不然科西金不会到北京来，我们跟他打，周恩来也不需要跟科西金在机场见面，这次见面，虽然没有什么，有一些口头的协议，但是没有执行，但是表明，中国苏联双方面打是打的战争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双方都要避免的。

阿诺：下面丹切夫大使。

丹切夫：我想说一点，谈到69年中苏边界冲突，以及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谈到中苏关系，因为这是当时各方态度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中国和东欧的关系也要考虑到中苏关系的这个大背景。所以当我听到李大使刚才的解释的时候，您谈到边境冲突问题的历史严格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是从1861年的年边境条约发展过来的，但是我觉得，苏方可能不这么看，他会认为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不然的话，为什么中苏关于这个边界要谈那么多年呢。所以我想说，也许会议的组织者，应该请一些苏联的代表来，因为我们总是要谈到苏联，苏联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来说明他们当时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们要请俄罗斯方面的代表来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

阿诺：这可能是一个挺好的建议，下面请各方做结。

朱安康：我想谈一点对于珍宝岛事件的看法，我同意刘其宝先生说的，珍宝岛事件是偶然事件，两国关系非常紧张，双方都有防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双方不想扩大，也不想因此而大打，这是有证据，科西金在事情发生以后，想和我们联系，想会见我们周总理，我们内部毛主席有个批示，一个叫坚决反击，准备谈判，如果我们是想扩大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坚决反击，因为这是我们认为是苏联挑起的，我们要翻译，但是我们要准备谈判，周恩来总理对当时的东北军区的司令员陈西连说，要我们绝不示弱，因为苏联已经在挑起来这个争端，我们绝不示弱，但是呢，我们有礼以后要有节，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局部冲

突，不要扩大，看来是双方都有这个意思，不能把这个冲突扩大了，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双方都有意要谈，这个有一个插曲，科西金在珍宝岛事件以后，曾经打电话通过热线电话，当时在外交部有个热线电话，多年有没用了，但是他用了，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要求会见周总理，要求见我们领导人，直接和我们领导人通话，当时我们的话务员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他没有请示报告这个事情，当场就答复了，说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你凭什么资格和我们伟大领导人谈话。就把电话就挂掉了，这个事情就不知道了，事后他想汇报这件事情，周恩来总理严厉批评了这个事情，但是苏联方面造成了一些误会，以为中国不想谈还是什么，科西金在苏联领导人内部是个温和派，他这个做法，就给强硬派制造了借口，当时苏联的强硬派，就主张对中国要进行核打击，施行外科手术的手术，还采取了其他的一些措施，对中国加强了攻击，搞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想孤立中国，等等，这样子一来以后，这个关系当然更紧张了，但事后正好9月份的时候，胡志明主席去世了，这个时候科西金利用去越南参加吊唁的机会回到北京的途中和周恩来见面了，双方谈了，达到了，第一次谈了，这次会面以后，关系缓和下来了，大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珍宝岛事件本身的事情，现在中方说是苏联挑起的，苏联方面说是中方挑起的，现在这个问题，难以说清楚了，因为双方都说的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事情是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

阿诺：罗文斯基。

罗文斯基：我会说的尽量简短，我实际上是想问一个问题，而不是想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首先是问李大使，苏方说，和中国在边境上，存在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所有和苏联接壤的国家，都和他们有一个历史上存在一个边界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呢，在边界问题上，很难相信苏方的解释。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就像丹切夫大使，和其他大使刚才说的，但是我们手头仅有的就是苏方提供的信息，我不知道中方的信息是什么，中方的立场我们只有从人民日报上才能看到，但是中方对于珍宝岛到底掌握了什么信息，我们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们的分析家，就想知道，当时中方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所以地点是发生在珍宝岛，那么他的时间是在中共九大开始前，那么他的措施或者手段是为了解决中国领导层内部的争夺。但是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担心，中苏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至于苏联对中国核设施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情报。我们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是从美国那边知道的，而不是从苏联那边知道的。但是军方可能知道，这我不清楚情况，但是我们作为外交机构确实不知道很感谢地

阿诺：非常感谢，我也愿意说，在这一轮会谈中，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就像刚才很多代表谈到的，可以是我们未来讨论的基础，之后我们可以再回到现在的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似乎有两个对于事态发展的版本，这是关于69年边界冲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方面是关于中国的内部的政治局势，就导致了当时气氛升级，紧张，这应该是冲突发生的一个缘起之一，然后苏方进行了回击，这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在中苏的那段边境上，而且中方也没有预料到，苏方会做出这样的反应。这是苏方解密档案是这么说的，某些东欧国家的档案也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中方的档案是怎么记载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中外很多的学者也支持者一个版本的，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的版本，那就是苏方首先攻击中方，然后双方就相互之间发生冲突。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成了一场冲突，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们只有进行更多的研究，我们只有有机会查阅了中方的档案之后，才能知道当时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权衡各方的档案和观点，知道当时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我建议我们在 10 点 45 的时候再重新开会，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希望到时我们就能更好的有一些讨论。非常感谢。

章百家：各位先生们，现在我们讨论第五个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我讲了，我们上一个议题还有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把这些问题都讨论了的话，我们还需要举行另外几次会议。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议题，时间已经剩得不多，只剩下一小时 15 分钟。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尽快地进入正题。也可能这个议题需要有一个美国的伙伴，但是我们这儿也没有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所以我想我们的讨论还是集中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和东欧关系的影响上。下面呢，我们就请陈德来大使，来做组织发言。

陈德来：咱们个研讨会，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开得很好。两位主持人主持得很出色，大家谈得也很热烈。这就给我增加了一个压力，也就是如何在非常有限的时间之内，把我要谈的议题能够高度地概括，讲得尽可能地清楚。下面我就试着谈一点儿自己粗浅的看法。我今天要讲的议题，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影响。1949 年，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和孤立的政策。两国关系处于相互隔离和对抗的状态。从 1967 年 10 月起，美国总统尼克松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出发，多次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及时把握时机，推动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首先基辛格博士作为总统的特使于 1971 年 7 月访问了中国。他的这次访问实际上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过了半年，也就是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从战略的高度和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以政治家的气魄和胆略，实现了二十年以来跨越太平洋的第一次握手。发表了上海公报，重新打开了中美友好交往的大门。使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周恩来总理在 2 月 21 日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宴会上指出，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的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也有较深的影响，而且造成不同的后果。下边我想分别就中国同东欧几个国家的关系，介绍一下简单的情况。首先中罗关系，即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罗马尼亚对此予以高度的赞赏。罗马尼亚的报刊纷纷地发表消息和评论，予以积极的评价。评价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利，对国际关系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央官方报纸火花报（音）还发表评论称，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胜利，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早在 60 年代，罗马尼亚就满怀热情地替美国向中国传话。衷心希望中美两国能够早日实现正常化。1970 年 11 月，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奥列都斯古访问中国的时候，向周恩来总理通报了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的情况，以及同提奥赛斯库总统会谈的情况，并且替尼克松总统传了话。当时列都来斯古副主席讲，遵照其奥赛斯库总统的指示，他向中方通报如下，尼克松总统对寻求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十分关切，尼克松请求其奥赛斯库转告中方，美国准备通

过任何途径，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改善中美关系。如果中共方面同意，美国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科技方面的关系。奥都列斯库副主席还说，其奥赛斯库当时向尼克松指出，没有中国的参加，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

尼克松总统当时表示，他理解这一点。而且持有同样的看法，也就是如果没有中国参加，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1978年12月，中美完成建交谈判以后，也就是12月16日，韩建龙副外长，向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做了通报。12月22号，齐奥赛斯库总统，就向华国锋主席发来了贺电，对中美建交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两国高级的往来非常地密切。经济贸易额大幅度地增长。生产合作逐步地发展。共青团等群众组织，议会以及文化、体育、旅游等各个领域之间的互访频繁。例如齐奥赛斯库总统，先后于1971年6月和1978年5月两次访华，罗马尼亚的总理先后于1975年的9月和1978年的9月两次访华。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1978年8月访问罗马尼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于1974年8月访问罗马尼亚。另外还有多起的副总理以及部长级的代表团互访。当然中罗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及其改善，只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下面想谈谈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阿关系开始变坏。阿尔巴尼亚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不高兴，不欢迎，内心是反对的。对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媒体只简发消息，不作任何的评论。对中美联合公报只做简短综合地报道。阿尔巴尼亚官方人员不主动同中国人谈及此事。当时阿尔巴尼亚内部发出指示，说阿尔巴尼亚的干部和群众可以观看外国电视台播出的关于尼克松访华的节目。但是不得在中国人面前对尼克松访华发出任何的评论。从此中阿两国关系开始变冷。阿尔巴尼亚对中国党和国家的批评也越来越多。阿官方认为，中国同美国同流合污，中国共产党变修了等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范承祚大使非常了解，他是一位很有权威的阿尔巴尼亚问题专家，我想他一会儿也会做一些具体的补充。

南斯拉夫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予以积极的评价。南斯拉夫的媒体当时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广泛进行了积极的正面的报道。普遍地认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具有重大意义。是当代最轰动的访问。是十年来的大事。而且南斯拉夫官方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也持欢迎态度。当时一位副总理叫副拉杜沙他对曾涛大使讲，尼克松总统访华是本世纪的大事。是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成果的承认。对于这件事情，有人同意，有人保留。但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这是一件大事。南斯拉夫认为，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挠中国人民发挥历史赋予自己的作用。这位副总理讲，这是南斯拉夫领导的态度。

匈牙利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矛盾的心态。也就是既欢迎又有忧虑。既承认意义重大，又想贬低其影响，既在报刊上对这次尼克松访问进行说三道四，又不想反华过分，很注意分寸，匈牙利对中美关系的同意，应当以和平共处的原则，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争端，表示欣赏和赞扬。认为这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尼克松北京之行的重大意义所在。同时指出，中美关系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值得欢迎。但是另一方面，匈牙利担心中美关系改善，可能导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进而引起苏联对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控制加强。使他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因此匈牙利尽量地贬低中美会谈的意义，缩小其影响。说尼克松访华，没有也不可能震撼世界。

其他几个国家，波兰、保加利亚，东德和捷克，他们追随苏联反华。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不高兴，不欢迎。但是也注意留有余地。同中国的关系也并没有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化。波兰媒体对尼克松访华，反应比较强烈。在1972年2月初，至3月中旬，波兰主要的报刊和电视台，发表了70余篇反华文章和评论。虽然波兰也意识到尼克松访华已经引起国际形势的巨大的变化，认为以中、美、苏三角关系为主导的时期已经开始。中美接近使国际形势比60年代复杂得多。但是报刊又诬蔑中国勾结美帝，出卖越南。尼克松访华以后，波兰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波兰科协院就增设了中国问题研究室。保加利亚利用尼克松访华，积极地配合苏联，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华的浪潮。中央报刊不到十天，就发表了150多篇的反报道。有时间一天就多达30多篇。也系说中国同美帝勾结，出卖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华的宣传中，尽管保加利亚的媒体十分卖力，但是始终没有领导人出面公开地发表评论。所以保加利亚对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方面追随苏联表示反对，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和留有余地。

东德对尼克松访华每天只做简单的报道，但是却大量地报道美国轰炸越南的所谓的暴行，说尼克松访华，使美国在印支轰炸升级。诬蔑中国改变了对美国的政策。说中美会谈不利于国际关系正常化和国际的和平。供给中国对美和，对苏恨，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无助于和平与社会的进步。东德的外长，在2月28日在古巴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说尼克松北京之行不利于世界和平。因为尼克松一方面高谈和平，一方面却命令战争升级，在越南进行轰炸，屠杀越南的妇女和儿童。

捷克斯洛伐克媒体对尼克松访华也发表了反华文章，说中国怂恿美帝轰炸越南。出卖越南人民的利益。说尼克松之所以访华，是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有利于美帝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球战略，强调尼克松访华，是为了在苏美中三角关系中，建立中美反苏联盟。总之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除了阿尔巴尼亚同中国关系变坏之外，总体看东欧其他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发展是正常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的外交政策，同中国的关系发展得好一些。其他的国家作为华约和金合会的成员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受苏联的牵制很大，比如匈牙利就有所顾忌，但是呢愿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波兰、保加利亚、东德捷克跟苏联紧一点，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上，虽然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也还是有的。特别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之后，以及中苏边界的珍宝岛事件，周恩来总理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给苏联戴上了一项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这就使中国更加重视对东欧的工作。正如于教授刚才讲到的，此后东欧与苏联的倾向，离心的倾向有所发展。实际上东欧国家心里也清楚，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他们也是有利的。至少对苏联是个牵制，使这些东欧国家在大国关系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空间大了。回旋的余地多了。另外东欧国家尽管受制于苏联，但他们已看中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在国际舞台日益增强的作用，所以明里暗里都不愿意忽视同中国的关系。相反他们都想方设法保持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的东欧国家中，在这个时期，罗马尼亚同中国的关系最好。一方面两国关系都有需要，另一方面与当时的国际和地区的环境密不可分。首先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并近逼罗马尼亚边界，使罗马尼亚体会到中国是其可信赖的朋友。第二1970年和1977年，罗马尼亚先后遭受洪水和地震两次特大的自然灾害，人员和物资损失惨重，苏联不但不肯施救，反而想趁人之危，关

键的时刻是中国给予罗马尼亚巨大的物资和道义上的支持和援助，使罗马尼亚感受到中国朋友的真诚与可靠。第三，70年代罗苏矛盾进一步发展，苏联在华约和合坚会内，不但继续推行军事政治一体化，还要求实行军事一体化，造成罗马尼亚的强烈反抗，罗苏矛盾日益难以调和，使罗马尼亚更坚定决心，积极地发展同其他的大国特别是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此外显而易见的是，罗马尼亚发展同中国、美国的关系，也有牵制苏联的意图。时间已经到了。谢谢。

章百家：刚才陈大使非常全面地介绍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东欧各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反应。下面呢，我们请叶桐教授，就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

叶桐：我只想简单地谈两点。一点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国家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是矛盾的。正如中国整个对外政策的影响一样，带来了矛盾的影响，起了矛盾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对外政策，对这些国家的，特别是在匈牙利，为进行改革为活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困难。逼迫国家的领导人经常表态，令他们不想表态的时候也表态，迫他们参加所谓的共同研究。把意见协调一致，那样的过程。另外中苏对立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但是最重要在1974年就在中国这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出现以后，这个情况，消极的作用就更严重。我还想告诉朋友们，就是中国的反修路线，助长了在匈牙利党内的反对改革分子他们有的时候认为，他们可以依靠中国来反对国内的改革。同时，我同意陈德来大使的观点，对立对代表、对实现民族利益，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对中国的批评，是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的。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朋友们顾忌到匈牙利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强烈反对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开除出去，跟这个有关系的。中国的立场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也起了催化作用。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震动了苏共的家长地位，这是一点，这是起了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是矛盾的。我也很同意陈德来大使的看法，就是当时在中欧，中欧国家害怕这个事件就能够促进苏联更紧密地控制这个地区，第二点，匈牙利怎么对待中、美正常化。当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批评。特别在1974年以后，一直到中国的十二大，中国的十二大不是，1982年，就是独立自主发展路线，是一个转折点，在中国对外政策方面是一个转折点。但是这里我要强调，匈牙利批评中国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正常化，主要是批判中美合作，战略合作。但是没有批评中国正常化的政策，为什么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70年代初，匈牙利开始活跃跟西方的关系，1979年跟随苏联，跟其他西方国家断绝关系，相反地继续发展这个关系一直到1981年，匈牙利就不顾苏联的警告，就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此陈德来大使说得很清楚，匈牙利不会反对整个的中国对西方的政策，谢谢。

章百家：叶桐先生刚才的讲话，介绍了他们东欧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感受，以及匈牙利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实际上他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我理解和当时中国对外政策毛主席三个世界的战略，还有当时一条线的战略，有他自己的看法。下面也可以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意见。或者哪位学者愿意提出问题。

提问：谢谢，我有几个简短的问题，对中方，也是东欧方面的代表，首先对美国，有些评论家认为，中苏之间的边境冲突，也就是1969年的冲突，实际上是对美国新一任的政府的一个特殊的信号。因为中苏之间的这种冲突，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中美之间的这种复交应该加快进程。同时呢，当时的中方

和东欧是否也这样认为，第二个问题，就是涉及到第三方调停，正如中国和罗马尼亚代表刚才所说到的，他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调停，做中间人，在 1969 年到 1970 年，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传话，我们希望中方或者罗马尼亚方面，能够对此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也就是第三方在调停上面，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三个问题是给中东方面的大使的。我们想知道，罗马尼亚、蒙古对中苏边境的冲突的看法是怎样的，谢谢。

李丹慧：我的问题是提给一个是叶桐大使，一个是施罗德先生，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接着刚才那个单元，就是伯恩先生提的 1969 年 3 月 17 号，华约成员国在匈牙利召开了一个最高级会议，伯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都参加了，我想问在这个会上，伯列日涅夫，有没有提出来，让华约成员国和苏联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来对中国施加压力，也就是说想让华约成员国，派出军队到苏中边境地区去，有没有提出这个要求。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延续性的，中国调整了对美政策以后，中国要联美抗苏，在这个时候，苏联有没有想要利用华约组织，作为一种借用力量，对中国进行军事压力。因为苏联把蒙古接纳为华约国，我想它的一个意图，应该是针对中国的。那么在 70 年代，中国调整对美政策联美抗苏之后，华约成员国有没有接到过苏联这方面的一些提议，有没有这种建议，如果有的话，东欧成员国有什么反应，他们的对应态度是什么？完了。

？想问东欧国家的大使，施罗德先生，在 71 年林彪事件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于该事件的实质有何看法？是否该事件想与想和美国缓和关系有关？

伯恩：当时中方的有很多决策我们都很感兴趣，但是考虑到今天的出席人，我想问的是，中美建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决定，既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在确定中美建交将对世界局势产生何种影响时，中方采略的是谁的想法，他们觉得中美建交对东欧国家有什么影响，再就是林彪的问题，林彪事件是否有利于中美改善关系。

章：哪位当事人愿意做出回应，对这样多的问题。施罗德先生。

施罗德：这儿要是有俄罗斯的代表就好了，他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就我来看，当时苏联的领导人，在珍宝岛事件后，他们感到很困惑。不知道在远东的军事局势是的，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我们就需要知道，海参崴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基地。一个具有很重要战略地位的一个城市。苏联方面认为，如果中国有可能攻击西伯利亚的铁路线的话，就会切断莫斯科通往海参崴的道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有必要做出军事反应。但我不想说，政治领导人并没有下达实际的命令，只是要求军方做出准备。当时苏联方面就建议，要让蒙古加入华约。但是东欧国家它拒绝了苏联的这个建议，首先是罗马尼亚，其他国家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拒绝了苏联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当时关注的是我国可能发生的冲突，我们不想再介入到其他地区，比如说像远东地区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他们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被苏联人接受了，他们就收回了他们的这个建议。苏联之后就与蒙古方面签署了一个协定，是一个互助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是据这个条约，苏联的两个师就部署在了蒙古境内。并且在那儿布置了电子设备，以保护蒙古的领空。再有一点，就是当时我估计，我也跟柏林方面说了，珍宝岛事件，从中国的利益角度来看呢，它要反对的并不一定是苏联。而是要支持中美实现正常化。这是当时中国领导层不的一个争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是有利于中美正常化的，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也跟柏林这么说了。

我可能不愿意说中美缓和，我可能更愿意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我认为用正常

化来形容可能更准确。但是从苏联方面来看，他们认为中美之间改善关系实际上就表明着中国就标出了社会主义阵营，投入了资本主义的怀抱。这是他们的一种官方的宣传。但是我知道，在东德领导人内部，我们是有争论的。与此同时，我们的官员提到这种投入资本主义阵营的怀抱，提到这些事的时候，又参考了柏林当时得到的其他的一些消息。我们就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他们的国家、政治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不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军队从北部开始往南部转移。中国的注意力逐步转移到解决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那么我就跟柏林这么通报了，柏林方面也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就是当时各方更愿意关注中国海军的动向，而不是中国陆军的动向。我们当时重点关注的是海军和空军。而非陆军。而在那个时候，中国正逐步致力于国防的现代化。所以这就是我，从我的角度，对刚才问题的回答。

章：谢谢施罗德先生，介绍了民主德国的一些反应，而且他也是我们的会议上，最好地代表了前苏联的看法，下面请李凤林大使。

李凤林：关于中苏战争的问题，我还想讲几句。我想应该这样讲，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双方，都做了对付另外一方可能发起的进攻。苏联方面在乌兰乌德有一个基地，乌兰乌德基地，在乌兰乌德这个城市的郊区，成立了一个叫做东方战区指挥部。它是要在战时统一指挥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三大军区。这个指挥部，大概一直到1997年才最后撤销。蒙古的驻军，这个我想苏联人是把他的边界，等于是推向更远的前方，作为一个部分，可以防止中国对苏联领土的进攻。关于华约的问题，我认为苏联在华约内部谈到中国可能的进攻，或者是远东的军事行动。我想是两个用意。第一就是要统一华约内部对中国的看法。第二就是想用这个举动，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双方都认真做了防备，对对方可能发起的进攻，这是一个方面。可以说明从双方的政治领导，并不希望发生这场战争的。这就是刚才施罗德先生已经讲了，陈大使已经讲了。因为1969年9月11号，周恩来和柯希金在北京的会晤，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都重申不应该打仗。那么中国内部的考虑，朱大使已经讲了，毛泽东有指示。在北京谈判。也就是在9月11号的两国总理的会晤之后。很快又恢复了1964年曾经中断的边界谈判。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最后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美国朋友。当时媒体有报道，说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美国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材料，我想问一下，这些材料的真实性怎么样。另外我也想问东欧大使们，你们有没有文件证明苏联的领导、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有过这样的设想，或者说有过这样的计划。还是这件事情本身是美国方面散布的一种消息，到底事情怎么样，我不知道中国学者，你们手里有没有苏联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章：请施罗德先生做一个回应。

施罗德：知道有些情况，但是我却不知道当时有任何关于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任何消息。然后我就接到命令，就把我送到远东地区来了。当时柏林方面向我问了一个问题，就表明当时柏林方面没有从苏联方面得到任何信息。别忘了我们在和平时期，而不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已有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核设施的事件，但是我们都应该知道，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苏联人一定想过这样的一个选择。他们一定想过这样的可能性，而且会想过何时发动这样的供给。但是从政治层面来说，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章：我想还有没有当事人愿意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叶桐：霍施伯格教授，我们认为如果要有一次攻击的话，从逻辑上看是很理

所当然的，但是它选择的时机在我们看来是比较让我们感到奇怪的。在 1963 年和 1968 年之后，在中欧可能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但是我不太清楚，但是当时在中欧，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打击是不可能的。在 1963 年的时候，匈牙利的领导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卡塔尔认为，对于匈牙利的社会和人民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而那个时候他个人威信很高。非常感谢。

阿诺：您想提问吗？

提问：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您提到了 1963 年的时候，您可能说到当时夏天的时候，美国向苏联方面建议，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当时卡塔尔在莫斯科访问，美国也有代表在苏联，当时赫鲁晓夫有没有跟卡塔尔提及这一事件？

罗文斯基：最近我重新查看了从六七十年代我们政治局开会的会议的记录档案，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阿诺：我想问东欧方面，如果关注更广泛的局势的话，那么苏联人当时和之后都有讨论，那就是在七十年代早期，中国开始和美国交好。但是这是 15 年前中国政府正式批评东欧国家试图和美国交好。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中国之后才和苏联闹翻了，而中国现在就做了 15 年前他批评别人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和美国走得太近。在东欧国家看来，中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逻辑发展的正常结果还是当时东欧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不太真诚，中国此前所有的指责，都不是真心实意的？只是想自己和美国交好，而不让别人那么做？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之前我做过研究，因为从苏联看来，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开始准备和美国缓和关系。那么东欧方面是不是也这么看？

章百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哪位先生可以做出一些回答？

叶桐：你们知道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如果你先和南斯拉夫交恶后又复交，一开始呢，是批评和西方交好，后来又和西方恢复关系。当时对于中国的这种立场，可能对于匈牙利的外交政策来说，可以是作为一个榜样。

阿诺：我的问题是匈牙利的领导人是否预见到了中美之间这样的关系的恢复？

叶桐：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态发展，但是从时间上来说，大家都没有预见到。

罗明：还是讲这个问题，首先我想强调一点，外交家以及政治家，必须严格区分事实以及说法之间的区别。罗马尼亚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参与我们所谓的政治争论。我想提出两点。在齐奥赛斯库，以及尼克松之间的讨论开始了以后，当时尼克松就指责中国，但是齐奥赛斯库就对他说，你必须体会中国实际的处境。中国现在正面临着压力，他受到禁运，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你必须理解中国的处境。齐奥赛斯库和勃列日涅夫会见的时候，那是在 1965 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说中国怎么不是怎么不是，但是齐奥赛斯库又跟他说，你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想呢，在提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讨论构建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双方言谈的基础上。

章百家：我们已经到了结束的时间，但是我想给两位已经举手的，一位是施罗德先生一位是罗文斯基，请你们简短一点。

施罗德：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我接到一条命令。要向我的上级通报中国对越南的政策。接到命令之后，我就和我在河内的同事取得联系，他也接到了同一命令，当时我们的回答只能是，中国的对越政策没有任何改变，这对于我们的领导人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希望解读苏联方面，从双方关系来

看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那你就可以发现之后，我们东德方面的言论，论调就有所降低了。而东德和中国的关系，就逐渐改善了。这是在 70 年代早期的事情，另外还有一点我必须说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和中国人之间也有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关系正常化是指和西德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和莫斯科的观点保持一定的距离，非常感谢。

罗文斯基：中国成语听其言观其行，如果是这样，就中国政策，看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安全的问题，他说要达到的目的问题。不过解释这一个，在不同的时期，从意识形态或者宣传的方式解释，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如果我们从宣传来说，我们的翻译是一个，从实际分析中国的事情，是另外一个，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特殊的时期，特别是 70 年以后，我们的第一书记，我们想开放，搞改革。所以我个人的意见，是一个，内部我们分析的问题和宣传的问题，有点儿不一样。所以大概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政策，起码很难。实现我们对西方的看法。不过怎么说，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评价也要看我们对 X 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从 1960 年初，在所有的东欧使馆，有汉学家，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分析所有这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的问题。一切，包括文化、交易、政治、经济。所以我们领导跟苏联见面的时候，从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批评我们。他们争取控制这个，非常严。而且东欧国家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咱们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章百家：我们请两位组织发言人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的结论。陈大使。

陈德来：通过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和东欧国家这个关系的影响问题的研讨。使我考虑一个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涉及到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而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处理的时候恐怕应该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考虑他们的处境。因为东欧国家在那段历史时期，以及以后包括到现在，由于他们处境，因此在处理对苏联、对美国，对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大国关系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一些处境的考虑，所以这一点呢，通过刚才大家的发言，使我感到了这么一点。正如刚才波兰朋友所谈到的，由于东欧国家它特殊的处境，特别是这个时期跟苏联的关系，它说的和做的往往是不一样的，表里不一。既要看他说的，更要看它做的，它说的是一样，往往做的是另外一样，说的是一样，想的是另外一样，这是他们的处境决定的，东欧国家很有特点。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期是这样，现在我个人认为，由于我对东欧国家的研究，仍然有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章百家：最后请叶桐先生，您还要讲几句吗？

叶桐：谢谢。蒙古人有他自己的立场。您刚才问蒙古有没有自己的立场，我想说，他们官方没有正式的立场。但是我和蒙古朋友谈的时候，他说他们有。

问：你不能说到这儿就不说了，这种针锋相对的立场是指什么？

施罗德：我记得是在 1973 年的时候，我接到了命令，要给国防部的同事讲关于中国的问题。我在那儿就直率地说出了我自己的意见，但是和官方的立场不太一样。没有人提出异意，只有当时我们总参的人说，对不起，这只是您个人的观点，但是他没再说别的话，我们的国防部长笑了笑，表示他理解这一切。让我继续说。就这么多。

章：很简短。

丹切夫：我想谈一下关于蒙古的问题，在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当时在中国是使馆的二秘，但从 1972 年开始，我参与了当时的所有会议。直到 1982 年我到

中国又做大使。我想说，蒙古方面从未表达他们的立场。他没有对苏方的立场表达他们的态度，所以我说，在 1971、1972 年的时候，他们没有表态。

章：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想我们上午的讨论非常投入，我们有一些年纪非常大的代表，但是他们都非常地专著，我想我们的厨师已经非常着急了。

3 月 25 日会议记录下午

阿诺：首先欢迎各位与会，请大家入座。欢迎大家参加第六个议题的讨论，本议题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和东欧国家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大概是从 1978 年到 1989 年之间，我建议这只是我们讨论一个大致的框架，并不一定要限制于这个时间段。本次讨论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叶桐大使已经对这个问题讲到过了，同时我们也想看一看，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间，对中国的影响。因为这是一段比较复杂的时期。在 78 年以后，中国也进行了一些和东欧国家一样的改革，而且规模也挺相似。但是中国在 80 年代的改革措施要比东欧国家走的更远一些。这种双方的相互影响，是我们要关注的焦点。也就是在中国和东欧，他们之间的政策变化对相互的影响，是怎样的。正因为他们的变化，使世界的格局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不只对涉及的在座的国家有影响，对整个体系也会有重大的影响。我们今天有两位主旨发言人，每一位有 15 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这个讨论的议题开一个头，首先请顿切夫先生，然后请白大使讲话，然后我们再开始讨论，我希望在下午的两个议题之间，中间的休息时间会可能长一点。因为这两个议题之间，大家可以有机会多休息，因为吃完饭呢，大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所以我们在茶歇的时间可能会延长一点，你们可以喝点饮料。现在我们请顿切夫大使。

顿切夫：谢谢大家，马斯特尼先生，两位协调人，各位同事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想感谢本次研讨会的主办方，能够给我们东欧国家的代表以这个机会，参加这个研讨会，我们一生和我们的整个事业，都是做关于中国的事情，也能够和我们来自中国外交部的同事，以及中国党研室在一块来讨论，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见到，现在终于可以能够和中国，美国以及东欧的研究学者共处一堂，我们大家都对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所以这样的机会很好。我准备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材料，以及在此之后，中国对于东欧国家的政策是如何改变的，以及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如何实现正常化的，我可以递交一份书面材料，我现在叙述我材料第一部分叙述一下。

中国共产党的第 11 大是在 1977 年的 8 月份召开的，1978 年的 2 月到 3 月间，召开了全国人大的会议，这两次会议就确定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中国在世纪末的时候，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到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如何实现这么一个目的，当时并不明确，这是在 11 届三中全会上，才作出的决定，那是在 78 年 12 月份召开的一次会议。是在 11 届三中全会上，并且是在邓小平先生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成型和起步，11 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先生的建议，把主要的精力放到经济工作上来，邓小平希望能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个理论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一个理论，并且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指导思想。在 1978 年 12 月份的 11 届三中全会之后，根据大会上关于达成关于开放的政策，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就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但尽管这样，中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在华国风党的 11 大上做的报告，中国领导人会加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在当时还是没有指出，哪些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些国家不是。是直到了 1982 年的时候，是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的 12 大上，才提到了那些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中国要与之合作的那些国家，他提到了朝鲜，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其他的东欧国家在报告中，虽然也提及，但是当时中国并没有把它视作社会主义国家，他这一份报告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中国当时把社会主义国家分成了三个世界，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于世界局势的一种新的判断。

中国领导人当时对于东欧国家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要看这些国家当时和苏联走的多近，以及多少愿意和中国恢复或者改善党际和国家间的关系，而原先这些东欧国家，大部分都曾经是华沙条约的成员国，或者是金互会的成员国。所以从中方来看，他们希望采取的策略，就是这些一步一步很小的步骤，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现的。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材料来看，中国方面的这些考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在 1982 年 4 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做出的，当时与会的有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他们当时提出要分散开苏联和它的盟国，要拆散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而且这一点在当时的会议上，仍然有提及，这一点是当时外国媒体他们试图得到的，比如说，82 年 11 月 22 号法国的报纸就提到了上述说的这一点，那些东欧国家在这个时候，也希望和中国实现关系的逐步发展和正常化，他们采取的也都是很小的步骤。

下面我会着重谈一下保加利亚方面的进展，我们在采取改善对华关系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行动，这些小的步骤如何发展成大的步骤，到最后实现了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也包括我们的党际关系的正常化。保加利亚驻华使馆在 77 年 78 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方面对保加利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关于保加利亚的负面消息，已经从中国的媒体上看不到了。而有了更多的越来越多的关于保加利亚的正面的报道，而且当时驻华使馆也注意到有更多的安排互访和会见的机会。当时我们保加利亚驻华新大使，在递交国书的时候，就对中国人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谭振宁同志说，我们希望能和中国发展关系，这件事情发生在 77 年的 8 月 29 号，然后谭振宁先生就说，现在和保加利亚发展经贸科技文化关系的时机和条件已经逐渐成图，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召开了他的十大。在 81 年的时候，保加利亚驻华的使馆年度报告中指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应当重新得到审视，因为当时的情况不一样，这份年度报告还指出，其他的东欧国家，也包括苏联一段时间以来，都开始主动的采取一些措施，来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就是说，他们也在采取一些小的步骤，而且中方对于他们这些步骤的回应也是很积极的。

1963 年 3 月 12 号，保加利亚外交部有一份材料，其中强调上述采取的那些小的步骤，已经构成了对华关系正常化的一些具体的步骤。当时那份报告还指出，保方采取那些小步骤已经落后于其他的东欧国家。至于我们可以采取何中形式的友善的举动，当时保方的外交部认为，可以拜访大使，也可以建立直接的联系。就这在当时看都是可能的，但是任何举动，都应当单独和中方通过会谈敲定，当时还有人建议，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动议，比如说在经贸关系方面，在科技体育，和文化交流方面。在交换留学生科学家方面，以及到最后的在高级国家机构之间重新建立关系。这些动议都在 82 年年初的时候就变成了现实。在 83 年和 84 年的时候，这些小的步骤有所增加，而且他说涉及的领域也逐渐扩展，在 1983 年

的6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司欧司的司长马旭生，他访问了保加利亚，他是作为中国驻保大使的客人访问保加利亚的，他受到我方外交部的接待，并且与我们的高层领导进行了会谈，他还邀请了保加利亚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回访。在中方这次访问成型的时候，是由副外长钱其琛先生接待的，当时保方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能够互派留学生，专家，文化和体育使者等等。1983年的11月29号，当时在联合国正在召开年度大会，当时保加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实现了会面。根据保方的要求，中国支持保加利亚在1986年的时候，来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

在1984年的时候，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仍在继续，在赵子阳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做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前景是广阔的。在同年9月份，时值联大31届大会的召开，当时中国的外长和波兰匈牙利苏联和保加利亚的外长都实现了会面。在发展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中国着重强调的是发展经济方面的关系，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包括了中国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贸易额年复一年的得到了增加。在同年，波兰匈牙利捷克的外贸部长，以及东德的化学工业部的部长都访问了中国。中国的国务院的国务委员以及国家经贸委的负责人，陈慕华也访问了匈牙利波兰，捷克，东德，和保加利亚。这次访问是9月份的时候实现，并且签订了协议，建立了双边经济贸易科技委员会。在2月份的时候，保方的外贸的第一副部长，就访华。在3月份的时候，国家经贸委的副主任朱熔基先生，也访问了保加利亚。他当时是率领一个经济代表团访保的。在他的访问中，我们签订了一个协议，那么我们就帮助天津建造一个叉车厂，并且在青岛建立一个酿酒厂，这就是我们双方在生产领域的合作的开始。这对于我们双方的关系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步骤。在84年的11月份，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长江泽民，他访问了保加利亚，波兰，和东德，在5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会长王炳南先生，也访问了保加利亚，在6月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钱其琛先生也访问了保加利亚，他是应保加利亚外长的邀请去的。1984年的秋天也是双方的国庆日，也是双方建立外交关系35年的纪念，双方对此进行了庆祝，双方在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并且都有非常高规格的宾客进行了会晤，双方的媒体都发表了很多文章，也放映了对方的电影，在文化和体育方面，双方有很多的都动议。

在这些领域，有一些很高规格的双边活动，双方都签署了一些意向书和协议的起草文本都进行了交换，上述方面都有很多发展关系的意向，以及双方的贸易和科技合作都有所增加。但是中保之间关系的规模，和中国和其他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比较起来，还不是步子迈的特别大。这一点保加利亚驻华使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且在83年和84年的年度报告中，向我方外交部提出，我方的外交部在分析关系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作为我们保方来说，我们对于每一个中保合作的意向都做出非常谨慎的反应。因为我们要考虑当时华约的一些考虑。如何和其他国家协调我们的立场。有一些东欧国家他们希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非常广阔并且深入的关系。他们和中国的。

由于有些东欧国家和中国希望发展很良好的关系，所以中方就得出结论，就是并不是中方而是东欧方面，他们在主动采取这些区别对待的策略，那么我就要做总结了，从85年到87年，这个期间，在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方面，双方都采取越来越大的步骤。在87年的时候，双方实现了最高层的互访。这就接着带来了双方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包括两国的党际关系的完全正常化。这就是我做的报告的第一部分的总结。谢谢大家。

阿诺：非常感谢，顿切夫大使，我们知道第六和第七议题互相之间有一点重合，因为时间段是重合的，我们希望第六议题讨论时候，我们能够关注讨论各国之间的改革，以及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那么在第七段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关注，国家关系正常化那一方面。所以如果是在主旨演讲中涉及两方面没有关系，讨论的时候我们希望各有侧重点。这一节主要是改革下一节主要是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关系，下面是白大使。

白寿绵：我首先感谢两位主持者给我这样一次机会，来讲一讲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改革的这个阶段，因为从这个命题来说，中国的改革和东欧改革的相互影响，它本身要求的是更多的涉及改革，所以我也把我的发言，按这个要求调整了一下，着重说一下这个问题。我就中保两国之间的关系，刚才顿切夫大使已经说的比较详细了，还有一些细节。中国的改革和东欧的改革，在70年代末到89年这个期间，的确是中国也是东欧地区的重大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个国家的内政，也都牵扯到这些国家由于改革而引起的一系列国际关系。而且牵扯到历史问题，所以我这里面呢，就着重讲一下我的个人的一些体会，中国的改革是1978年11届三中全会确定国内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开始实施的。所谓改革，大家都知道也就是不管东欧也好，或者是中国也好，都是要为进一步发展本国的经济，寻求对现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种改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欧国家的改革，40年代就已经开始，因为东欧国家在战后是苏联建立起来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完全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也就是东欧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初期为这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很快，就暴露出很多不符合国情的弊端，一些国家就已经开始探索改造苏联模式，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大家记得1945年，格特瓦尔德当时领导的捷共就曾经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还可以通过别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捷克要通过自己的独特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并且根据捷克当时的具体条件，制定了捷克走向和平民主的独特的道路一套方针政策。但是因为捷克有了这个要求改革的诉求，捷共的领导人，被扣上铁托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甚至间谍，特务的罪名。遭到迫害，捷共当时7万人被侵袭，捷共的总书记，斯蓝斯基被杀害，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闹翻，也是因为要走自己不照搬苏联模式的道路，同样格莫而卡，走社会主义波兰的道路，也遭到迫害，1956年匈牙利事件，在很多方面，也是由要摆脱苏联模式的诉求，到1968年上午涉及那些问题，就是捷克的事件，捷克领导人当时的独布切克要领导发动的布拉格之春是一个更加目标明确，内容丰富，很有见地的为解决本国发展问题的改革运动。可惜，这个改革运动，遭到苏联更加残酷的直接的出兵镇压和扼杀。到了70年代80年代以后，东欧国家普遍都认为摆脱由于苏联模式和受苏联制约而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进行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改革。所以东欧各国前社会主义国家战后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不断寻求改革又不断遭到挫折和打击的历史，直到最后东欧发生剧变，东欧的改革问题，和东欧的剧变是有直接关系的。东欧改革的经历受到前苏联的限制和制约是很大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中国80年代以前，也就是中国的三中全会以前，对东欧国家的改革，基本上是否定批判，认为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包括68年的捷克的事件，我们反对的矛头主要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捷克的入侵，但是对布拉格之春，这个运动本身在改革上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给予评价，其实从改革的角度看，这个运动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三，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

的改革开放，开始重视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并且也开始考察这些国家改革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同他们进行一些交流学习最先是向南斯拉夫。其次我们比较看中匈牙利。曾向有关的国家派过大量的参观考察团组，在我们的改革实践中，也确实借鉴了东欧国家一些经验和教训。但是东欧各国的改革南斯拉夫不算，都受苏联的制约，由苏联的背景阴影，有苏联框框的局限，受制受控受束缚，东欧改革要求要保持同苏联步调一致和经会整体的利益，正因为这样，东欧国家的改革是十分不利和困难的。因此也放不开。东欧各国的改革情况不同，我们觉得，波兰匈牙利，比较胆大也较有成效，德国和捷克有些困惑，甚至有抵制的地方，保加利亚在这方面做的少说多做，尽量避免苏联的干预，就是后来邓小平在见日布科夫访华的时候讲过，他说我知道你们也在悄悄的进行改革。这一段时间我们同东欧国家交换了不少关于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赵子阳 87 年 6 月访问东欧的时候，在交换改革方面的情况占了比较重要的篇幅。提到改革是当前的潮流，不能再按旧模式行事，应当寻求符合本国情况发展的道路。从改革中寻找出路。东欧各国都支持和同意这个看法。

四，中国的改革从 78 年以后，从起步的时间来说，好像晚，比东欧国家晚，但是目标明确，改革的规模力度决心和效果，都远远超过东欧。对东欧国家是有震动和影响的。引起了东欧很大的关注，80 年代以后，东欧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包括最高级的领导人，主动积极到中国来访问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实践，包括 87 年 7 月日布科夫到中国的访问，他在他自己回忆录里面说的很清楚，他访问中国，除了要推动各方面关系的发展之外，很重要他心目中有两点，一点是要翻过过去两国关系旧的一页重新开始，第二点就是要直观看一看中国的改革的政策，和改革的实践。验证一下他自己，要在国内进行改革的设想，和他对金副会的看法，访问以后，证实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回去以后，在 87 年保加利亚 7 月中央全会，关于改革问题的设想，不能不说与他访华和赵子阳曾经在 6 月份访保加利亚，关于改革问题的交流没有关系。是很有关系的。中国和东欧在改革问题上，在 78 年以后，80 年代和 90 年代已经有积极意义上的，所谓相互之间互有需要，互可借鉴，互有影响。当时中国在改革问题上，同东欧国家没有什么牵扯和利益上的矛盾，但是在这一个时期，东欧国家的改革同苏联在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也就是包括金互（音）会了，都已经显现出来了矛盾和危机。

东欧一些国家，对于苏联不满的一些东西，已经都显现出来了。而且有一些比较新的发展，特别是对金互会，金互会成员国，对苏联损人利己的一些做法，抱怨颇多，一个例子，苏联把支付的手段，改成为美元，并没有跟东欧各国商量，因此呢，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后来是这些国家自己怎么样来美元支付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困难。苏联对中国和东欧国家在改革问题上互相借鉴，互相交流，是采取警惕甚至有施加压力和影响的，日布科夫在他自己回忆录就明确的讲到了这一点，就是他访问了中国以后，苏联的领导人有意冷落他，做了一些小动作，

阿诺：能不能请您赶快结束您的讲话。

白大使：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剧变前东欧对苏联改革的形势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普遍担心，这个时候苏联的改革兴起，有一种东欧国家的恐慌。那么一直到 89 年，先后东欧国家的剧变，东欧国家改革到这个时候到剧变以后的这个改革，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不再说了。今天从改革这个层面来谈谈中国和东欧的关系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白大使，你们两位的发言非常有教义，一个是东欧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保加利亚方面的情况，他就提醒我注意到，我们档案中看到的一点情况，那是在 50 年代的时候，中保之间的一些会谈的记录。当时双方的大的结论，就是双方没有什么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的话，之后时过境迁了，情况不同了，之后白大使给我们提出了，双方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在中方是谁来主导这种变化的。这非常有趣好，下面我们开始进行讨论，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开始讨论前，我希望再次提醒大家，本节的讨论，主要探讨中国改革和东欧国家改革间的相互影响。之后关于双方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我们将在第七节再讨论，谁愿意先发言或者提问。

沈志华：谈到东欧的改革，我想到这个波兰的团结工会这个事情。当时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呢，我自己也改革去了，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太多研究，那时候我下海经商了。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我很想知道，当时我们驻波兰的或者其他东欧的大使馆，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向国内报告的。因为这件事情，前后拖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改革，也许刘大使能谈谈。谢谢。

章：刘大使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刘彦顺：我想这个问题，在下一个讨论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再回答这个问题。

章：好的，看看还有。

牛军：我对两位尊敬的大使都有一点，都是小问题，第一个我想问一下白大使，刚才您谈到，我们中国 80 年代开始向东欧，就是至少了解东欧改革开放的经验，先是南斯拉夫，后来是匈牙利，这个问题我想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谁做的这样的决定，当然还有为什么一开始把关注点放在南斯拉夫。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您提到对捷克那个 1968 年捷克叫布拉格之春的评价，我想当时是公开没有评价，我们内部有没有一个，对这个事件本身的评价，不是对苏联入侵就是对对这个事件本身，有没有一个认识，这是问白大使的问题，问保加利亚驻我们国家大使，非常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发音，我的问题刚才您的整个的讲中国同保加利亚关系的发展过程，非常清楚，但是其中始终有一个，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保加利亚认为，中国改善同保加利亚的关系，同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之间有没有联系，保加利亚是怎么看中国国内形势的，不是看外交关系，看国内形势，就这几个问题。

章百家：白大使先回答一下。

白寿绵：为什么选择南斯拉夫，这个有当时的历史条件，就像是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我们同苏联公开化分歧的时候，拿着南斯拉夫的这个牌来批苏联的一个最主要的对象，这是在 60 年代，后来随着我们国际局势的发展和我们的政策的调整，我们跟苏联的这个分歧，已经公开化，尖锐化，我们对东欧区别对待，要想集中力量反对苏修那么就对东欧已经区别对待，那个时候讲的是整个的，那么捷克事件以后，我们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这个关系，有了更大的改变和改善。后来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南斯拉夫的看法，就已经完全变了。考察了解到，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后的结果，我们觉得，有很多可取的地方。所以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不仅在反对苏联当时的帝国主义的这么一个意义上层面上的关系的迅速发展，在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这个需要上，也进一步加速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发展。另外我们当时同东欧的其他国家，除了同罗马尼亚，保持比较好之外，同阿尔巴尼亚之外，另外我们改革开放通常不可能有什么借鉴，同其他的东欧国家，我们还没有完全开始在改革层面上的交流，

所以南斯拉夫在这之前，已经我们同他们进行了在这方面，有很多机会交流和改善。那么就中央来说，当时对南斯拉夫的工作和关系，也是大大的发展了，这个时候可以说，胡耀邦同志曾经访问南斯拉夫，这次的访问对于改善对南斯拉夫的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仅在这个层面，在政治经济甚至在安全领域，我们都全面开展了关系。第二，那么捷克当时国内是不是有什么评价，就是对于布拉格之春，不多，据我知道，当时即使有，大概也不便于更多的去肯定布拉格之春改革的，从改革意义上，从什么价值，和它的意义，但是内部谈过，据我知道，但是没有把它作为我们对待捷克和对待苏联要采取什么样立场的一个依据。而主要是依据苏联出兵对捷克的侵略，来考虑的行为，那么这个层面上的东西，当时内部也谈的不多。据我知道的。

章百家：内部谈过您知道谈的是什么内容吗。

白大使：只是我们知道我们部内，我们主管部门，像我们苏欧司，主管捷克的同志，那他们还是全面的，认为对布拉格之春里面的一些积极方面东西，内容都还是知道的了解的。但是这些方面，没有作为一种形成一种什么政策，上报，怎么肯定，没有这个条件当时。

章百家：谢谢，

（注：此人讲话方言比较重 打省略号处为听不懂）

刘琪宝：我讲一当时我们考察的，还有人民日报的，他们几个人去考察的，另外当时唯一的，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独立的，即使匈牙利，当时关系再好，他的确有新的体制在那儿，所以去考察那个地方，另外呢，布拉格之春，据我的一个同事，我们驻捷克那些同事，前两天跟他们交往，在那个时候，跟我们接触，要征求我们的支持，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个国内很多人，顾不上这个东西，另外当时对他们的看法，大修小修，大修不能去修小修的，并不是肯定布拉格之春，肯定是否定他的。我还想讲，对于上午的讨论，我想补充一下，70年代尼克松访华以后，对东德的评价，我想补充一点，从72年1月开始，东德就很想跟我们改善关系，他报纸上登的东西，跟他实际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从76年开始，我当时受我们领导的委托，他有一人，他受领导的委托，两个人经常接触，是非官方的渠道，都在使馆里面，但是什么都谈了，已经谈过了，当时在东欧国家的苏联，有一个叫（），实际上，这许多国家，中国专家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实际上是协调政策的意思。在这个会上，东德的……，我们两个交换意见，东德在70年代初他曾经也想，他们的领导人访问朝鲜的时候，在北京跟我们见面，我们国家当时同意没有问题，但是那个人通知我了，……。今天这个大使已经讲了，东欧国家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由于他的处境决定了他的政策，并不是他本人，或者他的国家要采取这个政策，各个国家处境不一样，东德就是这样的处境，他只能实行这样的政策，76年以后我们跟西德建设了外交关系以后，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要发展和我们地关系，苏联也不允许他发展，因此他只能采取一个第三条渠道来沟通，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领导人，跟我们外交讲非常理解，非常同情，因此给予他很多特殊的照顾，无论经济上政治上等等。关于东欧其他国家，到东德我们在70年代的中期，70年代的后期一直去考察，这个考察是由国家计委的一个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带着的，我是代表团，我是使馆主要参赞，考察了半个月，东德对我们接待了非常热情，介绍的非常详细，但是呢，我们代表团在内部讨论的时候，认为东欧国家真正是改革的，只有匈牙利跟南斯拉夫，其他国家步子太小，我们要走的话步子比他们大，这样一个观点了，使馆里讨论的，还有一些经济研究的人十几个人，我们代表团很大，在那儿半个

月，大体上交流经验的话，应当是东德的人，当时介绍很好，很详细，很具体，但是我们国内对他是不欣赏，认为他这个还是苏联模式的基础，他们当时的经济体制，比我们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迈出了不少步子，利用这个市场运作，比我们都好完了。

俞邃：接着牛军教授的问题，当时关于捷克这个事件我们写过文章，我们考虑过，怎么来公开的评价，我的记忆中间是这样，一个是积极的方面，一个是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我们写文章支持这个方面，就是说，苏联对通过驻军和其他各种手段对东欧国家进行控制，这个捷克这个布拉格事件本身呢，对这种控制的一种反抗。当时呢，没有认识到后来这个高度，就是说，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更没有认识到，像我们后来研究的那个深度，我个人就写过这样的看法，其实，二战结束之后，东欧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和民主化的程度，本来是高于苏联。那么苏联模式套上去以后，束缚了他们，后来对苏联模式的反弹，实际上是要恢复和发展他们原来已有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成果，但是没有认识这个，只从控制反控制的角度，总积极的方面讲，是支持他反控制，但是也有消极的看法，我记得我也在一些讨论过，就是刚刚刘其宝同志讲的，他认为这个是老修和小修之间的矛盾，说是有这个看法，就是说你搞的也有修正主义色彩，苏联搞这个修正主义，这个中间的矛盾，因此对这样的矛盾的，我们不去表态，不去介入，是这么个状况，支持是反控制，不谈布拉格之春，本身有什么积极意义，更没有像后来认识那么深刻。谢谢。

丹切夫：关于南斯拉夫，我知道赵子阳先生他对南斯拉夫的改革，个人非常感兴趣。他研究了南斯拉夫的改革状况，并且在四川省也做了一些工农业改革的试点，他对保加利亚的改革也予以了关注。在苏联改革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对于保方关于改革的意见，也非常关注。在日夫可夫的访问中，他很赞赏中国的改革的那些想法。当时还有一本书得到了翻译。那是他在保加利亚党校的一些讲话的稿子。那么这本书经过翻译以后，在中国得到了发表。所以当时中国和保加利亚方面，相互都对对方的改革活动和想法感兴趣。当时还有保加利亚派出了许多人和代表团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比如说中国的经济特区。以及在农业方面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方也向保方派出了代表团，这些都是发生在苏联改革开始前，戈尔巴乔夫就没那么走运了，苏联当时对他有这样一个压力，就是改革不能走得太远。就是只能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变革，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却不能有大的动作。这也就是后来日夫科夫下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日夫可夫想在保加利亚进行真正的包括政治方面的改革，这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而且我们对苏联还有依赖。我还想说，日夫科夫对于中国推行改革的方式很感兴趣。

阿诺：非常感谢。

提问：我想问东欧国家的大使，他是跟着刚才顿切夫先生的话题的，在 80 年代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在农业方面，经济特区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这个时候，在东欧的改革则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停滞，所以中国这些进展，在 80 连续取得这些进展，对于东欧国家的精英层有没有一点示范的作用呢。比如说，对于共产主义政权对于市场经济的看法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

提问：我们一直在谈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我想问中国的大使们，在 80 年代中期，至少有三个东欧国家，他们拒绝进行改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某种程度上以及东德都拒绝改革，中国认为如果他们拒绝改革的话，他们在政治上有哪些风险，中方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因为中国在 70 年代末期发现他必须

在经济方面作出改革，以保存他的政权谢谢。

阿诺：我先让东欧的大使来回答。

叶桐：改革有这样的也有那样的，不一样。在这个道路上走得最远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匈牙利。苏联一直反对改革，不管什么地方什么人，你说改革他就反对，这感到不舒服，中国在79年着手进行改革，苏联就批判中国，说的是资本主义。但是这不仅是向中国的批判，也是向人家的批判。这很明显，那么因为这个特殊的情况，两个国家就开始合作，又是一个题目，苏联反对的。但是这个过程没有中断，这是很重要的，坚持下去。79年来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代表团，82年赵紫阳中国那个改革委员会的代表团来了匈牙利，83年匈牙利改革之父，尼而士来了，最后呢，因为事情很多，我最后还说，87年卡塔尔，就访问中国。这是一个过程，当然85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我想，这个改革，谈这个改革的问题，在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匈中关系谢谢。

阿诺：罗文斯基。

罗文斯基：我应该说，我听了刘其宝大使的发言后，余邃教授的发言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想法，如何看反修在东欧，反对修正主义在东欧的斗争和改革问题，和我们改革问题联系在一起，就是我们在党和国家改革派的最大的，对中国的理解。最大的妨碍。就是从80年代实际上这已改变了，从80年代初，一个非常，我提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异端意见，就是没有中国的改革，我认为这是1989年的东欧的事件起码还要等几年，为什么，叶桐大使已经说过了，我们在改革当年，有一定的限制，有一定的线我们不能超过，因为这一下子，因为没有办法进行经济改革，不仅是一定的政治改革，这个已经不行了。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要改革怎么样就怎么样，谁都不能给你们说，这个不行，你们一改革，这个改革结果，直接的影响我们。相反没有中国改革，起码苏联的改革和变化，不会发生。因为这个是事实。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如何帮助在东欧进行这个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一个问题，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巨大的，对我们巨大的帮助。因为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或者很难进行这类型的改革。谢谢你们。

阿诺：非常感谢，下面是东欧方面的大使。

罗明：我想讲的一点，罗马尼亚的政策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接受，这是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不要过分的指责，这在一段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罗马尼亚没有指责中国的政策，也就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中国呢，也没有指责罗马尼亚相对保守的态度。但这个保守的态度只限于改革开放方面。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是在内政方面的罗马尼亚是相对比较保守。但是这个并没有对两国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在67年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改革的问题，当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要改革他的政治经济以及相关的政策，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件。正是因为这个事件呢，也说明了为什么罗马尼亚对捷克发生的事件比较同情。不仅是使两国之间在主权互不干涉方面的团结。这也是对于捷克改革这方面的同情。我们对捷克发展的事态是有同情心的，但是在捷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其奥赛斯库就吸取了其中的一个教训，捷克的一个弱点，就在于他内部政治的不团结，而且没有一致性。尤其是在他的主要的领导层方面，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呢，其奥赛斯库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加强他在国内的政权和影响力。于是呢，他就反驳了67年会议上就民主改革方面达到的一些一致的意见。这是在70年代发生的一些事件。另外我还想说，在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公开以及改革的政策，给

罗马尼亚的领导人，以及民众都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当时认为，要改革像苏联这样的一个国家，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这就让其奥赛斯库确信，他应该反对这些改革的政策。我还讲一点，在78年的时候，就在这里，中共举行了11届三中全会，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带领了一个代表团，到罗马尼亚，我是欢迎者之一。他对我们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也十分赞赏。但是在80年代初呢，因为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影响，让其奥赛斯库确信，应该采取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国内政策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很具体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谈的细节。

朱安康：我想就刚才叶桐大使谈的情况再谈一些情况，我们为什么第一个选择是南斯拉夫，作为我们的改革的榜样。当时历史条件白大使已经说了，就是因为当时的国家关系，南斯拉夫与匈牙利来讲，做的比较快，和他进行合作比较顺利，和匈牙利进行合作，其实比南斯拉夫更早，但是和匈牙利的合作呢，往往要受到苏联方面的限制，搞得太快了，可能要引起苏联方面的误会，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后来考察的结果发现，这个南斯拉夫这个体制，和我们的中国的体制不太一样。他是共和国体制，是工人自治的体制，他的农业是分散的，这个都不太符合我们中国情况，所以到一个后期，我们就把这个注意力又转到东欧国家了，转到东欧国家，结果我们也是多方面考察了，各个国家都考察了，考察的结果最后还是认为，匈牙利的模式，对我们比较合适，一来是因为匈牙利也是计划经济那个时候，我们很难处理这个问题，就当时，主要就是一个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怎么样处理商品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呢，匈牙利他解决的比较好，而且取得了成效，所以这个87年赵紫阳率领代表团到各国访问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他到那个一个东欧国家都考察这个问题，最后那个时候我正在匈牙利工作，最后考察到匈牙利以后，他觉得匈牙利这个办法，比较接近我们的这个具体情况，所以我们改革的趋向，还是以匈牙利模式为好一些。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当时我还记得，温家宝他当时是陪着赵子阳访问匈牙利的，他在访问结束以前，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就说赵子阳总理很重视匈牙利的经验，希望使馆以后多介绍匈牙利方面的改革情况。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合作，当时叶桐大使谈到了，我们合作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多，应该说，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初期的模式趋向是按照匈牙利这个办法走的，当然后来，我们改革走得更快了，很多地方已经超过匈牙利了，匈牙利到了后期改革进行不去了，又出现另外一个形势的问题。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

俞邃：就中国和东欧改革相互影响，我谈三个观点，一中国也好，匈牙利等也好。改革的矛头都是指向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当然还有政治改革，还不光是计划经济了，我说开始，因此这种改革，尽管国情不同，必然会有共同点，就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借鉴和支持。就必然导致超越意识形态，从而使国家关系带来改善，这就是刚刚有大使提到的这个改革和国家关系的原因。第二个观点，苏联反对匈牙利的改革，当然也反对中国的改革，当然中国的改革，他反了要困难一些。他认为这种改革就是革他的命，就是对他的领导权的挑战。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否定社会主义，苏联给予这种压力，对于东欧国家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就是削弱了或者叫做扼制中国和东欧国家改革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这个因素是存在的。第三个观点，到80年代中期，苏联新一代领导人，不得不走上改革的道路。其原因，大致上就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科技发展带动下，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差距越来越明显，苏联的差距越来越明显，第二就

是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改革的某些成功，一定程度上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启示。第三呢，应该说，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有所认识。在这样的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改革的道路，但是失败了。为什么失败，这另做讨论。

阿诺：非常感谢，但是我们现在时间有点紧，因为我们想多休息一点时间，那么下面我们请东欧方面的朋友多谈一点。那么因为现在在东欧方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档案了，那么我想多知道一些东欧方面的情况，请您给我们简要谈一谈，之后我们再休息。我知道施罗德你也想发言，但是你能等到下一个议题呢，那就特别好了，非常感谢。那么还有我们这次议题两个发言人，一会儿再请你们做结。

丹切夫：我没有再多要讲了，因为大家讨论的很好，而且对我启发也很大，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白大使：在这个议题，我想即是这个阶段 70，80 年代一个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一个目前仍在进行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改革在中国在东欧其他国家都没有结束，我想这个问题，随着问题的发展，还会有进一步的深入的认识和体会谢谢。

阿诺：你想讲一讲吗，大致讲一讲东欧关系方面，

老外：谢谢，我会主要讲一讲东欧方面文件解密的问题，我和马斯替尼一起合作，在过去的 10 多年时间，冷战中心对东欧的文件进行了解密，他是和当地的学者一起合作实现了这一点。刚才各位也提到了，我们已经获得了一部分的文件，如果你们希望得到这些文本的复印件，那么我可以向各位提供，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对于东欧国家文件解密的工作，有很大的进步。这是来自于民众的要求，也是因为政府开始逐渐认识到，他们需要公开他们的文件，以加强和民众之间的交流，我们有 4 种文件需要解密，一个是党的一个是政府的，军事的，以及情报的方面，还有外交部门的。党史方面是我们最关注的，所有关于政治局的记录，以及中央联络部。在那些东欧国家凡是关于冷战期间的文件都已经解密了，涉及是 45 年到 89 年。比如说，他们包括一些会谈的记录，东欧领导人之间以及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记录。有一些会谈的记录，在下一期的冷战中心室，简报上将会发表。东德的昂纳克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见面时候一些谈话的记录也会发表。同时还有关于党史文件当中，还有一些政府的文件，比如外交部和各个使馆之间的电报，那些比较重要的电报在党史文件当中都有记载。在 80 年 81 年波兰事件中，东德有一些很重要的电报现在已经解密了。这些解密的文件，对我们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还获得了一些政治局记录的文本文件。尤其是在 70 年代 80 年代的一些记录。那些政治局的讨论，一般都被录了音，而且现在我们也有了录音的文本。当时还包括一些政治文件，政治分析，比如说，我们有东德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备忘录，涉及到苏联方面，我们还获得了一些苏联的解密文件是俄语的，还有关于 69 年中苏边境冲突的一些文件。这在几年前已经出版了，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关于党史的文件，是最容易获取，对我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那么获取东欧国家政府文件，也得以实现。按照西欧和美国解密的标准，我们在东欧国家灵活的进行了解密的措施，相信大家也能够看到，那么对于各部门的，尤其是外交部的那些备忘录，电报，以及关于各部门之间讨论的记录。至于讲到军事部门的解密档案，在各个国家我们情况不一样，在涉及那些主要问题的文件，我们还没有得到比如说，华沙条约国家一些在战争计划，包括 1964 年战争计划。得以平行史项目的帮助。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一些外交备案。第四方面是情报部门的一些档案，这方面各国的情况也不太平衡，我们最容易查阅到的是，前东德情报机构的档案。许多档案已经被销毁了，那是

在 89 年 90 年的时候被销毁的，但是有很的材料，还得以存世，我们中有人已经深入研究的这些档案，并且史无前例了发现了其中的一些档案。比如说，前东德关于北约的一些内部讨论的一些档案。我和施罗德先生也提到了这一点，有些档案想找没有找到的话，真的是比较遗憾。那我们想找他当时发回国内的一些报告，但是他没有找到。那么我还希望找到当时一些非政府部门，但是为政府提供情报的那些人，他们的发表的一些报告。最后我做一下总结。我们正在东欧国家查阅档案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这之前是不可以想像的，我们可以找到亚洲，关于中国的，关于冷战情况的那些档案。这比我们在苏联获得的档案，还要多。所以我们找到的新材料是特别特别的多。尤其是从东欧角度来说，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材料。因此当时中国和苏联他的想法，他的政策，这个历史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东欧国家的档案来写的。我们希望中国和苏联方面可以公布更多的档案，这样情况就会更为平衡，就能更容易接近历史的真相。那么冷战中心和他的一些合作组织，在去年 10 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会，是关于亚洲的冷战情况的。那么那次会议的记录之后，也会发表。那么希望大家和我联系，如果想要直接材料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寄。好了我的话就这样了。

阿诺：非常感谢，对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将非常有益，那么之后我们就要休息了。

叶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知道中国档案解密的情况。

阿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一节没法讨论了，可能下一节吧。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两位发言人，这节讨论非常有益。大家现在休息吧。谢谢。

（茶歇）

章百家：我们现在开始最后一节的正式讨论。由于我们的双边的交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的多边会议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在新的一节开始之前，沃伊泰克教授，请你开始吧，他要先讲一些事情。

沃伊泰克：我想简要谈几点，就是关于东欧档案的开放情况，我想谈一下北欧华约平行史方面，以及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尤其是关于和华约国有关的历史方面。我们认为中方学者特别应该知道，去想办法广泛地查阅东欧的档案。来补充在莫斯科无法查阅到的那些档案。莫斯科方面国防部的档案几乎是无法查阅的。但是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他们的档案，基本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就有当时前苏联的总参他们的一些战争计划方面的档案。这些档案在东欧国家都是可以查阅得到的，是开放的，他们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补充。在平行史研究项目的网站上面，都已经有些档案公布。尤其是关于政治协商委员会他们一些开会讨论的情况。尤其在六七十年代，这个协商委员会谈论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也有当时的国防部长他们开会情况的介绍。咱们的网站上也有。之后他们的外长会的会谈的情况，在我们的网站上也可以查阅到。还可以查到外交部副部长他们开会的情况的档案。以及当时各国外交部准备谈参的情况，有些时候这些内容比外长会的内容还要重要，还要有意思。这就是为了补充上一节会里面，对一些关于档案开放的情况的介绍。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定期看我们的档案，看我们的网站上面公布的那些档案。里面不停地有新的档案，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布，有的时候是原件，未必有翻译，但是我们也在不停地想办法，翻译越来越多的这些已经开放的档案，但首先我们有一个筹资的问题。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研究，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档案，谢谢。

？我能再补充一点吗？除了可以用东欧国家的档案来研究中苏分裂，我们还可以用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国家的档案，比如说乌克兰的档案。以及某些苏联的某些地区，他们的档案。比如我就找到了一个 1969 年的时候柯希金和周恩来会谈的记录。我说这些情况是想说这些材料都能够表明，在苏联方面的情况，那么谈及这一点呢，我们想说我们尤其需要中国方面的档案。

阿诺：我不是想说苏联的档案是完全无法查阅，实际上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都可以查到一直到 70 年代的很多关于中苏关系的那些档案。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比如说尤其是在前苏联他们的外交部的档案，哪些是可以查到，哪些是不可以查到的，可以来找我们联系。已经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档案公布出来了。那么我就希望和我们的档案研究人员大家能有一个交流。

章百家：现在我们正式开展我们的第七议题，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个议题实际上和上一个议题是接着的。我们这个议题现在还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下面我们我们就请刘彦顺大使发言。

刘彦顺：谢谢。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我准备讲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概况。其次是想讲一下东欧国家的特点和中国的基本政策。再其次呢，想讲一下中国与东欧国家正常化前提条件，第四想说一说，在正常化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得出几点有益的结论。前面许多同事和先生，已经就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问题，做了很多好的发言。列举了很多生动的材料，我这里只做一些简短的回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诞生了八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同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的变化，是伴随着国际气候，大气候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演变，走过了高低起伏，由热变冷，由冷变热的曲折的道路。就国家关系而言，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四种不同情况。一个是阿尔巴尼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国家关系发生、发展的情况，范大使已经做了生动的介绍，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化，不多说。第二个是南斯拉夫。中南关系由坏变好，中南关系由坏变好，化敌为友，这方面的情况陈大使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也不多说。中罗关系，应该说没有经济所谓的正常化的过程。因为中罗关系一直是很好的。在 50 年代末，中苏分歧开始的时候，虽然是中罗关系受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但是时间很短很短，很快地就把这个关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所以中国和罗马尼亚不存在关系正常化问题。

第四个是中国同波兰，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五个国家。这五个国家有它共同的特点。中国同它们有一个关系正常化的过程。那就是说，过去在我们讨论的时间段里面，中国同东欧国家的正常化，是有三种不同情况的正常化。一个是同阿尔巴尼亚，是由好变坏的正常化，然后正常化。然后同南斯拉夫是由坏变好的一个正常化，再就是同东欧五个国家一个正常化，有三种不同的正常化。

东欧国家的基本特点和中国的的基本方针政策，在这方面呢，同志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我这只是概括地说一说，在我们看来，东欧国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主要是，我所说的东欧国家，现在是笼统地泛指东欧五国。不包括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东欧国家共同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们对苏联的依赖，他们在政策上，近军事上，对苏联的依赖。他们是大家庭的成员，是苏联的盟国和伙伴。苏联可以控制东欧。在中苏冷战中，东欧五国是同苏联站在一起的，不赞成中国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公开反对和攻击中国。

第三，东欧国家有其自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同苏联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同苏联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他们追随苏联反华，有其屈从压力的一个方面，当然也有其自身的因素。第四，他们在对华关系当中，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是贯穿始终的。他们对华态度的政策，既和苏联趋同，又和苏联有差别，这是我对东欧国家共同特点的一个粗浅的看法。我们对东欧国家的政策，我感到我们的政策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第一个就是要把国家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知道和平共处这个口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首先提出来的。过去对和平共处的理解，一般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但是呢在 1956 年发生波匈事件之后，中国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来，那就是说，和平共处应该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中国首先提出了这项主张。并且在 1956 年 11 月 1 日发表的中国政府的声明里面，中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 年 10 月 30 日宣言的声明，在这份文件里面，第一次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写到一个正式的文件里面来。这是中国的首创。从此之后，应该说不管是中国和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分歧方面有多么激烈的争论，但是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是遵守这条原则的。那就是要和东欧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上面，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点想法。第点呢，就是中国主张意识形态分歧不应该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个在讨论当中，同事们已经有很多的论述，我就不再说了。

第三个，中国是充分地理解东欧国家的处境，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多做工作的方针。毛主席在讨论国际争论的时候，曾经讲过两句话，大家都曾经在报刊文章上，也有所引用。一个就是豺狼挡道，安稳狐狸，还有一句就是擒贼先擒王。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中国对东欧五国，指责和攻击中国的言论和文章，都不予置理，中国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苏联。中国认为中国同东欧国家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厉害矛盾，东欧五国之所以公开地反对中国，是破与苏联的压力，有其不得已的一面，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决定了中国和东欧在相互关系当中，双方都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双方都表现出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问题上，双方都表现出来维护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我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 1964 年，是中苏论战非常激烈的一年，是发表九评（音）的时候，是赫鲁晓夫下台的前夕，波兰政府就曾经主动地协助中国政府营救在巴西被巴西政变当局逮捕的九位工作同志。这件事情是波兰政府主动做的，当时我在华沙，我在半夜里面，陪同使馆领导，去敲波兰外交部大门，就是这件事。因为波兰外交部从巴西得到了情报，要同胞给我们。打电话来说你们马上来，那我们就马上过去。那已经是深夜，23：30 到 24：00 这个时候了。可见双方，波兰方面在营救我们同志方面，他的主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恰恰是中苏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恰恰是赫鲁晓夫气急败坏，他下台的前夕。那就是说双方都有维护和保持国家关系的良好愿望，对这件事，我们中国方面给波兰以高度评价。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我们同志得救之后，专门写信给波兰外交部长表示感谢。

下面想说一说，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它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正常化的前提开始成熟。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世界形势变化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外交政策调整，即中苏关系变化的结果，也是苏联同东欧关系和东欧国家自身变化的结果。东欧国家自身的变化，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交，东欧各国的经济不同程度地陷入停滞和低速成长的困境，有的国家比如波兰，甚

至爆发了持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80年代以来，东欧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日益拉大，体制僵化和发展停滞，造成的不良结果日益显著，这种情况迫使东欧国家，纷纷要求探索新的解决办法。使得东欧国家改革之风再次兴起。为什么说再次兴起，因为东欧要摆脱苏联的模式，这不是第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看一看战后东欧国家的历史。我觉得始终存在着两种观点，两种理论的矛盾和斗争。一种观点，一种理论那就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东欧的社会主义。就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再一种观点，那就是要考虑东欧国家，本国的国情。寻找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东欧国家的国家情况结合在一起，有一种是照办的理论，有一种是结合的理论。在40年代，就是1947年，1948年的时候，曾经有人向波兰，向捷克都曾主张过，走自己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而后在70年代又有新的改革，也是要符合东欧特点，符合东欧国情，寻找它的道路。到80年代仍然如此。

进入80年代东欧国家已经普遍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继续照搬苏联的模式，必须结合本国的民族特点，进行新的大胆的探索。“新的大胆的探索”，这是东欧领导人的话，而在国际关系当中，除了集团的利益之外，还必须考虑本国的民族利益。东欧的这种变化，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遥相呼应，相互借鉴。同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认识，有相同和相似之处。这也为中国同东欧国家，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提供了认识上和理论上的基础，缩小了意识形态分歧，对国家关系的影响。这是东欧国家自身的变化，其次是苏联的变化。苏联的变化，最显著的是，表现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开始对东欧松绑。苏共27大，承认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样性。戈尔巴乔夫说，要以新的态度来处理同东欧国家的关系。这个所谓的新的态度，我觉得它的含义不外是，在国际事务中，苏联不放松对东欧国家的宏观控制，依然是强调协调和一致行动。而在东欧国家内政方面的一些做法，表示理解和谅解。允许存在多样化。苏联的这种变化，反应了东欧国家要求改革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东欧国家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这对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是一个推动。

苏联的变化还表现在对华态度的变化。1982年3月，布列日涅夫在塔斯干发表讲话，这是苏联发出来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一个信号。此后中苏开始了特使级的磋商，讨论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中苏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开始有所发展。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加快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步伐。1986年，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建立睦邻关系。苏联因素是制约东欧国家和中国发展关系的根本因素。因此可以说，苏联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意愿和行动，在客观上消除了制约东欧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一种障碍。

第三就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1976年10月6号，中国粉碎四人帮。经过两年的徘徊之后，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为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时邓小平曾说，1978年，中国在制定国内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志，也调整了对外政策，确定了同东欧国家发展关系的新方针。1982年夏，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个大的改善。同时，中国就加速了调整对东欧五国政策的步伐。我觉得这种调整，政策调整主要是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是承认东欧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过去的争论当中，两党关系中断，中国不认为东欧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在这个问题上，矛盾问题很大。很大的症结，所以中国是开始承

认东欧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方式，最先的一个信息的传达，是通过给匈牙利的国庆贺电，就是在 1983 年的贺电里面，中国用一个提法，就是祝匈牙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就，这么一个友好的提法，就是说承认了匈牙利是建设社会主义，自然而然地也就承认了东欧其他几个国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认为，东欧国家也是霸权主义的受害者。过去我们看东欧的时候，都把它和苏联看在一起，它受害的方面也看到了，但是公开地承认它是受害者，这是改革开放提出来的。这是第二。第三是东欧国家是要求发展的国家。第四认为东欧国家是维护和平的力量。

有了这些看法之后，中国对东欧国家，当时提出了三个三尊重的方针，三个尊重的方针。第一呢，就是尊重他们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的内外政策。第二呢，就是尊重他们在历史上，同苏联形成的特殊关系。第三，就是尊重他们同中国发展关系的设想和做法。这是三尊重的方针。中国当时调整和东欧国家的关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三点。下面第六，就是中国更多的突出，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共同点。主要是表现下面几个方面。

？请你重复一下第三个。

刘：第三个是尊重东欧国家，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做法和设想。中国突出和东欧国家的共同点，突出相互之间存在的传统的有意，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都致力于本国的社会建设，都致力于国际和平，并且都有发展相互关系的愿望。这种调整，反应在中国的正式文件当中，就是 1983 年 6 月，中国总理在全国人大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中国总理表示，中国人民对东欧国家的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我们关心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近年来，我国同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体育至今的往来共同增加，通过共同的努力，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

下面第四部分，就是国家关系正常化。我觉得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同苏联关系正常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和东欧国家，没有根本厉害冲突，不存在根本的，在某个问题上存在根本的障碍，因此也就无须在双边关系当中，消除什么障碍，无须在双边关系当中，经过像中苏关系正常化那样的长期的艰苦的谈判。而是逐渐升温，水到渠成，这方面呢，方才叶桐大使讲了很多，我就不讲了，匈牙利大使是怎么做的，保加利亚的大使，顿切夫也讲了很多，一步一步走上来了。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是 1986 年 9 月，亚洲康那基（音），1986 年 10 月，安那克访问中国，他们两个人到中国来访问，完成了中国和东欧国家恢复党的关系和国家关系全面的正常化，所以这两个方案，是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我们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我的看法是，有这么四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最好的方式，中国和东欧国家正常化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两种的国家关系的方式，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大家庭的方式，一种是中国和东欧的建立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建立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可以不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章百家：请您讲一下观点。

刘彦顺：郭比赛夫司机，访问中国的时候，也一再肯定了中国这种做法，第二点就是要相互尊重。第三点就是要善于求同存异。我觉得中国这个主张，在雅路赛基访华的时候，是爱共同语言的，他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求同存异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合作顺利发展的现阶段的特点是，双方都愿意加强我们之间，那

些共同的东西。那些把我们连接起来的东西，忘却那些次要的和不值得提及的东西，牢记那些重要的有益的和美好的东西。第四点就是要善于区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如果可以的话，我在这里还举一个小的例子，具体的例子。中国是正确地执行了这个原则。我举一个例子，在1970年波兰12月发生事件的时候，中国人民日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波兰人民革命风暴，波兰方面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在内部是向我们提了意见。这是在争论层上，在外表层上表现出的东西。而实际上，我们是严格地执行了不介入波兰内部事务，严格区分意识形态的分析和国家关系这个界限。当时我记得在使馆的时候，国内指示，要在波兰的同志，至少要遵守一个七不准的原则。当时在波兰港口有三艘中国的船，中国的海员大家知道，他们也是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在波兰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下达了七不准的规定，第一个是不准下船，第二个是不准游行，第三个不准贴标语，第四个不准启动船上的电台，第五个是不准向外人借用船上的枪支，第六个不允许外国人上船，第七个是不准接受波兰人避难。严格地限制。这就说明我们干涉波兰内政。我们在争论的层面上，我们对12月事件表了态，但是我们严格地限制我们的行动。我觉得我们善于区分的，那就是能够使国家关系得到好的发展，是明智的选择，不善于区分的，就会给国家关系带来损害。谢谢。

章百家：刚才刘大使对中国的正常化的政策的变化，做了很详细的说明，下面我们这一节只有一个发言人，下面我们可以提问。

赫什伯格：您做的演讲非常精彩。我希望您能够回答上一节的问题。我觉得您的讲话很好，但是我希望您能够回答上一节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对81年，82年团结工会的反应。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和东欧在70、80年代正常化关系中间的一个障碍。在这个时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上，中国和东欧世界国家似乎是针锋相对的，包括阿富汗，柬埔寨，以及安哥拉，他们会支持不同的方面。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这是由动德方面的文件解密出来的。当时在1982年的文件当中，就职责中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说是霸权主义，是毛泽东的大国思想。是为了从阿富汗抢回武汉通道。那么中国和东欧当时是怎样看，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种争夺的？谢谢。

陈兼：我就跟着刚才赫斯伯格最后提出的问题，想提两个问题。一个是给我们东欧的大使提的，一个是对中国方面的大使提的，关于中欧大使呢，就是当时在70年代，特别是到80年代，我觉得中国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刚才刘大使说的，没有实质性的大的问题，但理论上有个大问题，中国当时遵循所谓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样一来的话，把东欧国家放在所谓第二世界。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放在第二世界的。那么对这个问题，不知道东欧国家的外交官们，有一个什么感觉，因为改善中苏关系，已经是一个理论上框架上的问题，再接下来就是改善同东欧关系，有一个什么问题，这是第一个，要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提出的问题，然后对我们中方的大使们，就是同这个问题，也是相关的，因为从70年代以后，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局面，某种意义上来说，外交上的通路，是毛主席给打开的。没有中美缓和这一着的话，到邓小平要改革开放的时候，要在外交上面有很多问题说明，会困难得多。那么但是再进一步来讲的话，特别是我们处理同东欧国家关系的话，因为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外交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第一世界，那很重要。因为涉及到一个战略关系问题。第三世界又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当时在三个世界划分的过程当中。而相对来讲，第二世界呢，似乎就既没有第一实际的战略意义，又没有第三世界

的理论上，因为我们第三世界外交。第二世界似乎就变得相对来讲不重要了。而且更近一步来讲的话，在第二世界当中，我的感觉是资本主义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要。从你们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驻东欧国家的外交官，你们都是大使们，老大使们，都是这样的，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有没有感觉到，在这个时候，很多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不是由于东欧国家本身这个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受到了这样一个大的格局的限制，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东欧的大使的一个问题，东欧国家如何看待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你们当时是如何向国内报告北京的情况的？你们当时接收到什么指示了吗？

章百家：我们现在已经有比较多的问题。好，范大使。

范承祚：你的问题明确一点，我说一说我的看法，因为要做关于第二世界。我过去工作在关于第二世界，陈兼教授提的，我过去工作在东欧这一带，实际上并不是一刀切的，我们的掌握，甚至于具体国别来说，整个东欧这一片也并不是第二世界。跟我方友好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尽管阿尔巴尼亚那一段不友好了，这三个都是第三世界。第一世界是跟我们敌对的，第三世界是我们的朋友，非敌非友者，则欧洲的那一大片。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也算是第二世界了。所以这个并不完全是一刀切的，这是我的看法。下面我要讲一讲关于正常化的问题。因为我们下午，现在这个事主要就谈个问题。我的观点呢，什么叫正常呢？因为我们现在跟这些国家大多数国家，世界上关系都是正常的，现在跟有些国家还不正常，有特定的原因，我觉得不正常里面，大起大落都算不正常。具体到我们跟东欧这些国家，如果过去一直奉行刚才几位同事提出的那些原则，尤其是，我觉得如果做到了互不干涉，求同存异，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的话，关系总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跟这些国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正常呢，就中国跟阿尔巴尼亚而言，关系太热也不正常。最后关系冷下来了，接近敌对了，当然不正常。当然太热，我深深地感觉到，度过这个太热的时期，有的时候我们阿尔巴尼亚朋友，那个时候向中国提出来的要求援助，胃口太大。比如我举例来说，军援里面要坦克，要 500 辆。飞机要 200 架。还要导弹。后来周总理跟他们讲，你要这么多干什么呢？巴洛克说，我们把 500 辆坦克布置在亚得里亚海边，铸成一座钢铁长城，让敌人无法登陆，这个想法也不可思议的，他要真要登陆，你 500 辆坦克能挡得住吗，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作为朋友 我跟你讲，第一我们没有这么多武器给你提供，第二你们的御敌于国门之外这种想法不可取，到时候一锤子打完了怎么办。第三呢，我觉得 1972 年周总理跟巴洛克一再苦口婆心地讲，我们不认为苏联或者美国，华约或者北约，真的要对你们进行如此大的侵略，因为阿方给我们提出来，好像有根有据地说，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你们在座的诸位，再想想有这样的情报，因为周总理不相信，1972 年冬天巴洛克来的，巴洛克讲，根据阿方掌握的真实的情报，北约华约都要抢先占领阿尔巴尼亚，为此我们要这么大的军援，周总理说，我们解放军怎么没有获得这些情报，他就问在座的元帅，将军们，大家就摇头，周总理说难道我们的军方没吃饭？像这种东西就叫不正常。经济援助也是这样，浪费得太多，绝对不能说，中国给我多多益善，周总理说，如果你要什么，我们都给的话，消化得了吗，后来证明，好多大武器都塞在山东里面去了，那里面条件也不好，漏雨，最后大武器拖都拖不出来了，生锈了，给他的工厂好多都在睡觉，就是这样。所以弄得，我们中国深有体会，各位先生，各位同志，我们现在东北旧的工业基地的改造是多么地困难哪？难怪后来阿尔巴尼亚好多工业都瘫痪了。现在他们的经济的发展，不是靠的那些当年多要的那些

东西。什么叫正常呢，后来因为阿方对中国干涉太多了，1964年11月，对中国说，周恩来和其他人都不要到莫斯科去，但有一句话提得很好，我还记得，说赫鲁晓夫下台了，其他的普列尼涅夫，他们奉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是阿尔巴尼亚有先见之明的。我们1965年，1969年，周恩来和柯希金额五见面，阿尔巴尼亚都跟我们提出来，不能这样做，后来基辛格和尼克松，那就不是一般的不应该了，就是机会主义，以霍察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毛主席气坏了，阿尔巴尼亚说我是修正主义，那次巴洛克来的时候，毛泽东不见，尽管周恩来见了两次，叶剑英见了三次，但是他也可怜，不是巴洛克本人的主张，是上面叫他的。我告诉你们，我当翻译，我知道他多么为难，他会上念稿子，我知道巴洛克善于贪图，逻辑性很强，一听就是上面的领导人的语言，外来语好多，跟阿语交叉在一起，念起来很吃力，一听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语言。我也不懂法文。所以一听就是这样，念完了以后，周恩来给他一反驳，一说，巴洛克哑口无言，频频点头。对不起，巴洛克回去以后，完了。巴洛克屈服于周恩来的袖珍主义压力。后来巴洛克处死刑了，整个军事代表团的国防部长巴洛克军队参谋长，军队政治部主任，还有几位将军，统统处死刑，大部分抓起来了。

阿方宣布说，巴洛克的反党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通向遥远的地方。通向遥远的地方，当然不是波兰，不是东德，甚至也不是莫斯科，因为通不过去，通向遥远的地方，就是通向中国，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悲剧，所以太热太冷了都不正常。太热太冷，最后对自己不利，对别人有害。这一条对阿尔巴尼亚最后遭受的自己的创伤，更加深痛，所以我讲正常化是这样理解。现在我们两国关系是正常的。互相都不干涉，你们发展你们的，我们对阿方现在也是平等贸易，适当照顾。不像过去要什么都给什么。我们现在也不像当年，苏联像我们追债追得一塌糊涂，把专家撤走跟我们追债，朝鲜战争打仗，他出的武器最后要我们付钱，我们对阿尔巴尼亚不追债，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我们跟卡普拉尼先生在一起交谈，我们很好，我们关系是正常的。

章百家：谢谢范大使。

罗文斯基：我想提一个问题，说几句话，提议就是，我想我们的中国朋友和主人，如何今天看上个世纪的理论，如何用这个特征词？这是一个问题。我听了非常有意思。于邃大使的报告，我认为这个可以做将来分析我们之间的一个基础。这是很好的出发点，因为它很明确地介绍它的思维。不过一个我不同意。我离开华沙以前，到北京来，我就详细地看一切中国从1970年，69年是另外一回事，1970年以后波兰以后的文章，要是你再念一遍这个文章，它的语言，它这么解释事情，那它跟分析捷克内部的情况，有多大的区别呢？所以从这个问题来看，刚才的意思是不完全正确的。

刘琪宝：这个实践的理论，我知道是1974年，毛泽东跟卡文达（音）立出来的，当时中国的国际外交战略，在理论上这种概括，这种理论上的指导思想。今天后来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跟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这个理论应当说也是当时的一种概括，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外交的理论，应当与我们现在中国总结了这么多时间的历史经验，跟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到十六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外交政策，现在我们在外交文件里面，是不使用这样一个概念。当然现在的外交政策，不是今天讨论的题目，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机会详细讲。大家要看到，为什么今天中国要执行现在的外交政策，为什么今天的外交政策是个非常正确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我们会讨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六大，我们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分

析，还是请李丹慧分析。

李丹慧：我想中国驻东欧国家的大使，特别是刘其宝大使，中国和东欧建交以后，曾经发生过一个问题，中国和西德建交以后，中国曾经谈到德国的民族统一问题，东德来讲，从60年代中期以后，是不提民族统一，而是主张两德并存的。中国当时还有一篇文章提到东德，东德还抗议，你们为什么不提民主德国，提东德，我的问题是，中国这样做，当时调整对美政策，是调整对美政策对西方摆的一个姿态，还是一个失误，如果不是失误，还是摆的姿态，有一个问题，希望咱们的大使做出一个评价，在中国联美抗苏这样的大背景下面，中国对东欧国家掌握的区分的党纪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原则，是不是要服从于中国这个联美抗苏的大战略，我不知道你们如何评价这个问题，因为有这个现象反应了这么一个情况。

刘琪宝：我们了解得到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也是从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被四大国占领，后来分裂成两个德国以后，我们一贯的主张，支持它民族统一。相当长时间，两个德国都主张德国要实行民主统一。但是到了后期，民主德国…为了利益，政策发生了改变，改变了这一句话。不要德国统一了，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不能放弃统一的机制。但是我们当时，这样的话，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西德，分裂东德，这里面我们一般地说，只是对德意志人民，支持他们实行统一的计划，我们一直主张两个德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两个德国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讲一讲也是这个，在1972年，中国跟西德建交谈判的时候，有很多问题，由于西德的政治家，阿西诺德，大家知道两个德国都是1949年成立的，我们当时跟民主德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西德当时不可能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西德的政治家，并没有在这个时候，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他一直没有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到我们跟西德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不存在台湾问题，因此我们跟西德的外交公报直接一句话，根据它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没有台湾问题。同时像这个外交关系公报里面，我们也没有写支持德意志人民统一的愿望，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西德建立建交公报这句话，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谈台湾，在这个公报里没有台湾问题，也没有讲统一的问题，不谈这个问题了，这个东西民主得到看到了很敏感，知道。在他的公报里面有这个东西。东德跟西德，大家知道，得到问题占中心，…是个中心。后来四大国美国跟西方三国之间，东德跟西德之间，西德跟西方三国之间，东德跟苏联之间，他们四家是四种意见，四个概念，有矛盾的。我们跟西德建交的时候，西德对于这个问题要我们表态，我们表态一句话，是没有在公开的公报里，大家通过…的办法。这句话，不损害民主德国的利益。德国朋友也知道，（英文）这句话的意思很含糊，其实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处理，没有牵涉到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就说明，不是我们非要在…要牺牲东德的利益，来服从西德的利益，在处理两个德国的关系的时候，他们两家都没有话可以说的，…因为东德急于跟我们发展关系的时候，西德跟我们关系发展很快，到了八十年代比较早的时候，民主德国的议长要到中国来访问…，他突然把我找去，他说你不要…我跟你有点私人的话要聊聊，我就知道他有事，心里很紧张，我们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来了要跟我讲，我想到中国去访问。我们有这个想法也是中央决定的，也是我们政治局讨论的。…当时这样的身份来，我觉得很吃惊。他说你们方面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当时已经知道我们国内，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困难，这个访问很快成行了，他在北京来访问，主要是尽快好，立刻要到北京来访问，郝约克（音），所以领导人他们很快就来了。郝约克的夫人教育部长，也来了。后来由于东欧…这里面我主要想，我

们的政策的原原则情况，每个国家的政策性非常之强，而且这个东西，都是我们最高领导决定的。

阿诺：非常感谢刘大使。我想先简短地评论一句，然后就请施罗德先生给我们评论一下历史问题。我想我们现在必须确保。我们必须在我们看待不同历史时间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同历史时间是有不同的特点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不同的时期也是不同的。我知道当时中美之间曾有关于德国方面的讨论，那么这些历史细节我们都需要讨论，都需要知道。那么在那个时候，关于德国就有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新东方政策的问题，比如说有给西欧国家施加压力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是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地来看，现在请施罗德先生发言

施罗德：我想补充几点。刚才刘大使说得非常好。关于中国和西德关系问题。它和东西德希望在新东方政策下，和西德接触是同一时期发生的。西德驻华使馆和中国接触，是和西德，和我们东德方面接触，是在同一个月。中国人他们知道的，德国大使馆其实就是东德的试管。这时候我是武官处的负责人。当时的事情非常复杂，我来华的时候，之前没有任何经验。而且还有其他国家的武官，法国的英国的武官都问我说，你这件事怎么做，那件事怎么做？

但是后来呢，慢慢大家就平静下来了。当时在所有的西方的武官当中，我只和西德的武官进行了接触，尽管西德当时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就是因为西德人也讲德语，所以我们有亲近感，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西德的武官很紧张，但是后来就慢慢平静下来了，进行了讨论。这实际上是反应了东德对于中国的一个政策的变化，当然苏联对此进行了干涉。昂那克亲自下了命令。说他要求我们能够写一写中国关于自己的政策的看法。在六七十年代，他在东德出版的一些书，主要讲的是苏联对于中国的看法。但是却没有什么译文本，或者是著书立作，专门写中国自己的政策的。有一些已经都要胶印的书，他又下令要收回来。

阿诺：对不起，您能赶快结束吗？

施罗德：就在这个时候公众就开始有要了解中国的兴趣。在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有很多的讲座是关于中国的议题。大家对中国都突然有了兴趣。连基层的老百姓也是。很多人都参与了当时对中国的研究。这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现在我们请刘大使说。

阿诺：刚才还有几个问题提出了但是没有回答。现在能不能先回顾一下这些问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去年12月的时候，我在柏林我就看到了一些非洲国家他们当时的档案。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东德和中国的关系是怎么也说不上友好的。在安哥拉和中国的关系也不太好，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互相之间多有很大的龃龉，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六四事件的，东欧国家的看法问题。在七十年代中期，东欧国家当时是否认为中美实际上是在联手抗苏？东欧国家支持这种政策变化吗？

施罗德：对不起我忘了提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统一问题。统一当时既不是东德，也不是西德实际表述出来的政策，当时昂那克和克尔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他们互相问了这个问题。双方都决定，在当时先暂且不提统一问题。在官方文件中，先不提统一的问题。两德统一问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呼声，而不是最高层领导的意见。它不是政府层的事情，而是人民的呼声，这很重要。因为当时实际上统一对于东西德来说还不是一个问题，谢谢。

阿诺：谢谢。有没有谁愿意回答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座的

有哪位是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中方有人吗？

刘琪宝：中苏情况之下，中国跟第三世界的国家关系，都有一个，我们讲，从苏联讲起来是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中国，你当时跟中国关系好一点，我对你好一点，你跟苏联关系好，我就对你差一点，苏联也是这样。中苏分裂，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但是对一个国家之间内部，在安哥拉有这个问题，它本身有一些人比较主张跟中国关系好的，有一些人主张跟苏联关系好的，在这里面引起了一些矛盾。应当说有这个东西。但是总的说了，中国当时是支持第三世界是积极的，支持的，有一些国家，跟苏联的影响之下，跟它的关系密切一点，跟我们差一点，但是这个情况跟东欧国家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的。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无论中国也好，无论苏联也好，跟他们的关系，跟中欧国家，当时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阿诺：非常感谢。

俞邃：关于第三世界的问题，民族问题，讲一点简单的看法。三个世界的划分，这是一个战略的构想，这个战略的构想是毛泽东原先的中间地带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演变，第一世界规定的是美国和苏联两霸，第三世界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是中欧，这种比较发达的国家，这种划分是不是合理，今天不去讨论它。但是把东欧国家列入第二世界，它的历史地位应该明确。是争取对象。第一世界是打击对象，第三世界是团结对象。第二世界呢，是争取对象，可以间接利用，这个概念是明确的，所谓对第三世界的态度，和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构想，中国人喜欢简单地说法，叫做一条线，一大片，中国人喜欢顺口溜的，一条线呢，就是对付苏联，用毛泽东的话讲，对付北极熊，说美国到欧洲一线，整个的一条线，从中国到欧洲，对付熟练。一大片呢，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我们依靠的团结的一个基本力量。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是各式各样的，也是很复杂的。当时苏联的全球战略思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苏联来讲是它的天然同盟者。它要想把苏联的模式，苏联的应该要推进到发展中国家去，这种一大片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影响的问题，不必回避，是这么一个概念，我就说到这儿。

阿诺：现在时间很紧张，所以希望大家发言都能简短一些。

罗明：我想说的是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在74年的时候公之于众的。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在此前这个理论就已经提出了。是毛泽东在和一位美国记者的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那个时候三个世界和后来的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不一样的。那会儿指的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新兴的民族国家，这样划分的。所以我想呢，这体现了中国对于世界格局的一种看法。因为我们可以记得，中国的古人孙子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要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章百家：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我简单地介绍一点情况，从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外交政策部门，就对是否还要继续使用三个世界的理论，进行了讨论。有了不同的意见。如果你们注意一下的话，你们就会发现，从党的十二大开始，所有党的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政策讲话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不再使用三个世界的理论，只是使用了三个世界的概念。下面我想我们本来已经应该离开，请刘大使最后还要不要做一个非常简短的发言，然后我们这个讨论就结束了。

刘彦顺：方才沈志华先生提出来81年和82年团结工会的问题，这里面我简单地做一点回答。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就是波兰国内的问题。是波兰国内

经济困难引起来的工人罢工，工人反对物价飞涨这样一种工人运动，这是波兰的国内问题。但是呢团结工会在运动当中，又出现了一种声音，那就是说，反对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和剥削。这个就反应了波兰老百姓对波苏关系的看法问题，中国方面始终认为，这是波兰的内政。中国做了公开的表态那就说，详细波兰人民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反对外来的干涉。这是对 1980 年团结工会事件的一个基本态度。在 1980 年的团结工会事件的基本态度。在 1981 年的时候，团结工会事件进一步演变，出现了亚路在斯基，出现了军管这样的事件，中国也立即做了表态，这个表态就是说，中国一贯主张，波兰的事务，应当由波兰自己解决，坚决反对外来干涉。中国相信，波兰问题会在符合波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中国是做了这样一个表态，对波兰人结果自己的问题，反应外来干涉，中国是表示了支持，反对外来干涉，而且中国是尊重波兰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在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中国不仅是在道义上支持波兰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在物质上，也适当地在可能的条件下，可能的范围内，给波兰以支持、援助。那就是说，在发生团结工会事件之后，由于波兰市场供应紧张，特别是猪肉供应紧张，中国主动地向波兰提出给波兰猪肉贷款。这个贷款的条件是，非常优惠的，十年内没有利息。波兰到十年之后，再偿还中国给它的猪肉，贷款的总数是八万吨猪肉，这在中国的市场来讲，也是很大的负担了，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这个八万吨猪肉已经是很大的负担，这是回答沈先生的一个提问。

另外就是对其他，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我相信只要我们各个国家都严格地把自己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会搞得越来越好，我是相信这一条的，我是相信五项原则的生命力的，1989 年东欧巨变之后，我们和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么一个情况。完了。

章百家：谢谢来大使，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晚上在罗马尼亚大使馆有一个活动。我想我们需要尽快出发了。因为我们使馆给我们的时间是 6:30，但是我们现在肯定不可能在 6:30 的时候到了。

3 月 26 日会议记录上午

阿诺：刚才我和章先生讨论，今天的讨论将会很令人注目的，今天我们能够听到来自双方大使的口头见证历史的过程，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教义的，可能大家有一点累了，因为这是最后一天，而且以前我们经过了激烈的讨论，以前有一个巴西的外交官和我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跟我说的那些，有一些年轻的巴西外交官去了冰岛，他们学了冰岛的语言，他们和冰岛的外交部长进行了会谈，他们谈到了冰岛和巴西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双边关系的良好的状态，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年轻的巴西的外交官呢，就描述了冰岛是如何的美丽，接着呢，这个资深的巴西外交官就问他，接着怎么样了呢。然后我就把我们的外交关系搞杂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那个年老的外交官问，因为这个年轻的外交官说，他说我会的冰岛语言只有这一点。这就是在我们可能累了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圆桌讨论会上，我们可能不会再回顾过去我们讨论过的历史事件了。我们会进行一些新的议题的讨论，然后再看一看，有没有时间来对过去讨论过的事情进行一点补充。首先我们会请我们在座的大使进行交谈，那么再请那些没有

参加很多讨论的学者，希望他们也有机会加入我们。看一看他们有什么评论。

可能我们还会涵盖一些事先没有讨论到的，或者说是没有讲的很清楚的一些议题。我们在座的一些学者，觉得没有完全找到他们要的答案。希望在座的各位在提问和回答的时候，都能够简洁明了切题。在这里我们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还没有涉及到，那么我们在座可能会再提到，那么我和章百家先生在这里主持的时候，会提醒大家。首先呢，我们会请在座的各位提问题，尤其是那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谈及的那些问题，我还要提醒大家，现在不是表现你们的礼节的时候，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越坦诚，越直率越好。

俞邃：如果说今天上午的自由讨论，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进行的话，那么我现在按照会议两位主席的指令性计划来做一个简短的发言。这次会议以其准备之充分，内容之丰富，节奏之明快，讨论之热烈，气氛之坦诚，受到普遍赞扬。将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和思考。第一，上世纪 60 到 80 年代，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总是蒙上了苏联的阴影。东欧各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存在着差别，这是他们的国情决定的，是他们各自与苏联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的。中国对待东欧国家的政策，也离不开以苏联划线这样一个关联。因此我觉得，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那个时期中国和东欧各国的关系，就有必要加深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加深对苏联和这些东欧国家关系的研究。第二，中苏关系背景下的中国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一度恶化，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被扭曲的现象是一种悲剧。东欧国家即使是苏联有限主权论的受害者，又不得不在苏联反华这个过程中间，充当某种配角。而中国尽管将东欧国家与苏联加以区别对待，但是中国的一些做法，仍然免不了构成了对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的伤害。

第三，意识形态的争论，导致国家关系的恶化，乃至破裂。其结果既伤害我们自己国家的元气，又丑化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形象。使亲者痛仇者快，应该说这是断送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犯罪行为。第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这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格格不入的。是科学社会奠基人不可思议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难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应该高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起码也应该是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模范。第五，当年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将这种矛盾纳入敌我矛盾来加以对待，无论有多少的理由，都应该认为是错误的。第六，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先后选择了苏联模式，或者是被苏联模式所强加。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同时这又决定了这些国家迟早要推行改革要顶撞苏联的这种不可避免性。在改革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诱惑，插手，乃至干预，是导致一些国家偏离改革健康轨道的重要原因，第七，上个世纪 60 到 80 年代，中国与东欧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和平是人心所向，发展是大势所趋，改革是必由之路。竞争是通用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观察研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变革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八，面对改革的使命，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未必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终究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公正，专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未必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平等。第九，国家利益原则产生独立自主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不等于要结盟搞集团。多样性决定了各国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第十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是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产生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根据冷战结束后，我个人的研究的一点心得，我认为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产生良性互动，有一个内在的

规律，这个规律是由三个环节组成的，这就是起点，过程和结果。这个起点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必须尊重他国的利益，缺一不可。第二过程，这个过程是竞争与合作同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摩擦与妥协并存，既有摩擦又有妥协，要善于合作，善于妥协，现在看到国际关系长很多言论，说我们两国之间是合作伙伴呢，还是竞争对手呢，小布什上台以后，一会儿说中国俄罗斯是他的竞争对手，一会儿说是伙伴，我认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是一个钢币的两面，翻过来这面是竞争对手，翻过来那面是合作伙伴，第三结果，这个结果是双赢共赢不是一家受益，我想个人研究这种国家关系中间，良性互动的规律，应该是适用于我们和东欧国家今天和长远。最后我向东欧曾经驻华的使节们提出一个恳求，希望你们在今天自由讨论的发言中，能够结合一些生动的例子，谈谈在苏联高压的那种情况下，你们是如何创造条件，为发展和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悄悄的，做出你们贡献的。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余教授，你也提到了，我也想问一下 89 年在东欧发生的剧变，中国方面是怎么看的，89 年的事件在东欧各个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我希望能够从中方听到更多关于北京对于当时在东欧剧变的这些事件的反应。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两层要关注，一方面，中国很希望东欧能够从苏联的霸权主义下解脱出来，而从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很愿意看到所有的或者说是一部分的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阵营当中脱离出去，我也想问东欧的方面的一些意见。我们讲到了，中国改革的例子，他激发了，尤其是在经济的方面激发了东欧国家的改革的努力。我想知道在 85 年到 89 年期间，东欧的国家是怎样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我们会言请蒿斯伯先生谈他的观点，然后再请中方大使谈。

赫什伯格：非常感谢，我也想感谢余教授，刚才的那番谈话，尤其是他提到，我们应该考虑一下中苏关系，在上时期 60 到 80 年代中苏关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次研讨会的许多问题，无法脱离当时的中苏关系这个大背景。那么就着这个话题，我想谈几点，我想本次研讨会可以告诉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当事者他们在当时的一些想法和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再能举办一次类似的研讨会，有能够非常好了。把当事人的回忆，和我们能够看到的档案结合起来，这是相得益彰。刚才余教授讲的一个和有趣一点，那就是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种不同国家之间，如何相处。那么这项原则是在 54 年时候由周总理和尼赫努总理提出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当时的谈话，他们是如何想出这个五项原则的，如果能看到的话更好了，所以如果在，在一会儿的讨论中，我们能够探讨一下，历史上还有哪些疑团，我们需要来研究，尤其是关于中苏关系这一点。还有哪些我们不太清楚的问题。我们能够归纳一下，昨天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得到回答，那就是在 80 年代的时候，东欧和中国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是持相左观点的，今天当我们回顾那段时间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后冷战时代的一次冲突，是围绕着伊斯兰极端主义一次冲突，我想知道，我们的老大使，对于当时双方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有何见解。

阿诺：我们想请中方的一位大使，或者参与者来讲一讲 89 年东欧剧变以后，中国的情况。希望你们能够只是简短的讲一讲，中国对于 89 年东欧剧变情况的看法，不需要很长。

白寿绵：我首先就是对方才这个余教授讲到这个关于，对东欧我们的讨论会的有些看法，我很赞赏他的一些结论和看法，当时主持人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东欧剧变，那么我们中国当时是怎么看的，和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件事情，东欧剧变的时候，我正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也正是每天都在接触和处

理相关的事情。东欧的剧变它在很多方面，从它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事件本身，不仅超出了一般人的视野，甚至超出了我们这些长期从事东欧工作人的一些预料。事件发展的迅速，和它的程度当时我们感到是惊心动魄。那么东欧这个事情的变化，我们怎么看，现在呢，我只是说几点我个人的看法和与此有关的。

东欧的剧变是有它历史的根源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昨天我谈到东欧的改革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东欧之所以剧变，就是因为东欧在自己的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应当有过的改革，都被苏联所扼杀制止。最后集中到必然要发生大的剧变，东欧剧变本身有西方国家的插手，但是当时有大的环境，就是苏联当时的变化，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要寻求和要最终找到符合本国发展道路的这样一个诉求。把它变成了现实，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成熟了。这是第一。第二，东欧不管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当时都认为，这是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尊重各国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第三，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根据我们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是我们三中全会，也就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调整的外交政策，那么我们同剧变前的东欧，从这个轨道上来调整，对剧变后的东欧，我们仍然根据这样一个原则，这样一个要求，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和发展同剧变后的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这个政策，我们至今仍然执行，当时我们就是确定的是这样一个政策和原则。

我们认为这个政策和原则，是正确的，第四，东欧国家的剧变，我们国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有人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颠覆，也有人认为是，东欧国家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不管哪种情况，我们中国是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予干涉的。但是我们认为东欧这个变，剧变，并不表明是作为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和破产，像当时一些西方人或者是某些人看的，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包括苏联在内，所执行的所采取的一个固定的这个不成功的那种经济和政治的模式的破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因为东欧的剧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东欧的最后破产，来判断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是失败了，像有人讲的，共产主义消亡了，也不见得。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苏联也好，东欧也好，执行的那个不成功的模式的破产。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采取了对东欧的剧变是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韬光养晦，这就是我们当时对东欧这个剧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及也包括了个人一些看法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白大使的讲话，我觉得您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可以引导我们进行更好的讨论，尤其是在关于 89 年东欧剧变的中方的观点上。可见中方在这方面的态度，以及表态是很慎重的，说到在东欧这些剧变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那里，主权的问题在东欧国家日益显得重要，我过一会儿会请中方的大使来讲一讲，请东欧方面来说一下。

发言：我很高兴白教授讲到了在东欧的一些改革的要求，以及最后导致了东欧的剧变，我就想到了我昨天提的一个问题，从 78 年开始中国就开始了改革，中国当时是否推动了东欧在 80 年代的改革，希望在那些东欧国家能够发生像中国类似的改革。

阿诺：下面我会请中方回答这个问题。中方哪位大使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提问：谈到 80 年代的事件，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的网站上已经发表的一份文件，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它翻译出来，但是翻译很快就能完成，而且那份文件描述的事件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讨论是非常相关的。我们看了捷克方面的

一些文件，它里面提到了在 87 年 6 月份的时候，中方领导人访问捷克的时候，和我们的总统和总理的一些谈话的记录。那么这一次访问的发生时间非常有意思，当时捷克的外长还谈到了他和江泽民和李鹏谈话的内容。那次谈话发生在捷克政府倒台前的几天，我想那一份文件，对于我们理解当时中国对于东欧事件的预期是很有帮助的。87 年的那一次赵紫阳先生谈话的主旨是积极的，他对捷方说，捷克斯洛伐克正迈向改革，而且改革进行的非常好，而且中方也有类似的想法。那么在 89 年 11 月份的时候，捷克的外长在和江泽民和李鹏的谈话中，也听到中方说，当时他们认为，捷克的改革发展的特别快，那么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当时能够调整政策来适应东欧当时发生的变化，我想是当时那一届中国新政府所采取的一个正确的决策，他们当时愿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继续和东欧国家发展关系，而且改善了同东欧国家的关系。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一个功劳。所以我就想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网站上的那些文件，将会对我们的讨论非常有帮助。

阿诺：中方有哪一位大使能够像白大使那样，重新回顾一下，你们当时对于 89 年东欧剧变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是在当时是在外交部工作的，而且涉及到这些东欧的事物，有人愿意加一点吗。

于洪君：刚才已经白大使就这个问题做了很精彩的解释和说明，我还想补充几点，89 年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基本立场是冷静观察，客观，不做任何主观的评价和猜测，防止误导民众，第二点，就是在当时东欧形势非常混乱，前景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中国继续和东欧国家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就各个方面的交往，运转的，我认为都是很正常的，中国当时反复强调，尊重东欧各国人民的选择，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是这样做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东南亚面临着丧失政权的危险，应该说多少同志式的感情，是中国人民对东欧国家的事变，感到有一种切肤之痛，这是实实在在一种感觉，许多人都对东欧共产党人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对于东欧社会主义的前景感到担忧，理论界很多专家和学者，就明确讲，东欧的剧变，包括后来苏联的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大挫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空前未有个低潮，甚至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大的挫折。但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刚才白大使已经讲过了，我们国内理论界也包括党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是苏联也好，东欧也好，他们国内事态发展的一个客观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只能尊重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党内出了机会主义，国际上帝国主义长期推行和平演变的结果。这两种看法，现在都是依然存在的，但是不管理论界怎么看专家学者怎么看，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对待东欧，对待现在的俄罗斯，始终一贯的，切切实实尊重人家的选择，尊重他们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现实条件基础上，同他们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当时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关系非常好的，89 年罗马尼亚事件发生的时候，在那个之前，这个中国党曾经派一个级别很高的领导人去参加他的党代会，国外有很多报道，甚至有人讲，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 64 事件之后，有人误传，中国领导人向罗方传递了什么信息，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是中联部一个工作人员，当时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们领导人那里，在罗马尼亚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谈我们自己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就罗马尼亚将来可能发生什么，给他们出谋划策。绝对是没的，我们是非常非常严肃，非常非常冷静，非常非常负责的对待东欧可能发生事情的，这是一点，我再补充一点，1991 年，819 事变发生的当天，恰好有一个中共代表团，出现在莫斯科，代表团的团

长就是当时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则民，也有人传言，这好像是一种精心的安排，实际这完全是一种巧合，我们的代表团，是按照原先两党交往计划，作出安排，准备8月19号日前往莫斯科的，当天他们离开北京在北京机场的时候，我们接到莫斯科发生事变的这样一个消息，苏联大使迟了很长时间，才赶到机场去送行，他阴沉着脸说，我们国内出事了，当时我们面临一个抉择，代表团去还是不去，后来决定，既然苏方没有通知我们推迟这个代表团，我们还是去了，我们还是如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但是到了莫斯科发现，苏共已经瘫痪，预定的计划，访问日程，已经没有办法安排，当天下午，只找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两个人，他们说可以帮你找一找莫斯科第一书记，结果呢，到下午预定来的时候，他失踪了，听说被抓起来，这样代表团没法在莫斯科做任何事情，也没跟苏共中央搞什么接触，提前回国了，这些事都表明，我们中国党对待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方面，是非常客观非常冷静的，我们也是非常成熟的，非常负责的，我们的立场态度和做法，经得起历史检验。

阿诺：谢谢您讲的也很好，我也回忆起，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和我的中国朋友也谈起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其奥赛斯库被杀害的事件。当时这个事件的影响力很大，因为他是罗马尼亚的最高层的领导人。所以给我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有没有哪位中方的大使愿意再讲一下。我们先请西方的学者先提几个问题。然后再请你们回答。

提问：我没有问题，我只是想就瓦尔太克讲的再补充一点，我们就东德和中方的文件，有很详细的文件记载，我们在柏林发表的一本书里面，有很详细的中国和东德之间的文件，尤其是在87年到89年期间的事件。这些文件是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也希望达到能够上网去浏览一下。

阿诺：这一点非常好，文件的问题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谈。首先请沈先生，谈一下中方的文件情况。

提问：我想问一下关于，苏联解体的事情，在89年6月份的时候，挖尔尼先生在中国，而我当时在莫斯科，当时中国是否想在东欧的那些强硬派是想抵御改革的浪潮，那么刚才中方提到了91年的819事件，我想问，中国的老大使，能否告诉我们，当时中国政府对于91年8月19号到21号和苏联方面有没有任何联系。尤其是关于苏方当时的紧急会议的情况。那么当时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共产党政权曾经短暂的获权，并且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利，

阿诺：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不想谈太多，请刘大使发言。

刘彦顺：我还想就这个中国对89年东欧剧变的政策和做法补充一点看法。刚才白大使和中联部的同志，都做了很好的说明，我要补充的就是，我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处理的。比如说，东欧新上台的领导人，他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他是其他党派的人，我们要不要和他打交道。我们的主张是部分党派，我们跟他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部分他属于何党何派，我们都要和他保持正常的国家的公务的联系，比如说，在中国和东欧各国之间，过去签订了很多协议，合同，要不要继续执行，我们主张是要继续执行，如果是对方感到困难了，对方说不执行了，那我们尊重对方的意见。比如说，我们在北京要和对方的使馆打交道，已经变了，对方使馆见面怎么称呼，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个礼貌性的问题，但是呢，可能变成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相互见面都称同志，那现在见面怎么办呢，是称先生还是称同志呢。我们是主张看对方的愿望，对方伸手了说刘同志你好，我就回答说某某同志你好。对方伸手说刘先生你好，我就回答某某先生你好。是尊重对方，这是我们尊重对方的一个具体的，在一个细节

上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在发言当中曾经讲过，三尊重的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尊重东欧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做法和态度。实际上，我们是延续了我们这样一个主张。我们是坚持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上，建立和发展维护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完了。我提一个问题，我补充方才余教授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讨论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的回顾，我很支持余教授最后提出的问题，我作为多点驻东欧工作的一个人，一个工作者，我很想知道，东欧国家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怎么样考虑的，在哪些具体问题上，有哪些具体的决策，哪些指导思想。我很想听听这个问题，方才余教授也提出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外国朋友，东欧的朋友，能多讲一些。

阿诺：您的问题也问的很好，我现在想请东欧方面的大使，就 89 年的事件讲一讲。有没有哪位东欧方面的大使，能够对此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就关于刘大使的问题。他问的是更大的关于双边关系的问题，但是我向请东欧方面的大使，就 1989 年的事件谈一谈，我想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及了很多次。有一个问题，就是在 89 年的天安门事件当中，东欧的国家是怎样反应的。

罗文斯基：当时波兰的情况有一点特殊，因为当时在波兰有一个选举，那正好就是在 89 年 6 月 4 日那一天进行的。所以当时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波兰的选举情绪。以及当时的气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 89 年时候的中波关系。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政治气氛。当时中方对于波兰事件的发生的态度是不敢相信，当时中国在波兰的外交官曾经想和波兰的团结工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当时我们在波兰对于三个国家比较担心，一个是捷克，还有就是东德和保加利亚。我们很想知道当时中国方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会担心会 56 年发生的事件会得到重演。反过来中方可能也有类似的担忧。这就考验了当时我们的政治智慧，就是我们如何去判读各自对方的立场。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互信任。那么当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当时在戈尔巴乔夫和昂那克之间，曾经在对改革上有不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不赞成那些改革。当时对各方来说都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我们当时希望中方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所以我想当时中方的态度，和 56 年时候中方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当时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一些事态。这和中国在 68 年对捷克发生事态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我们必须看所有这些事件，56 年的事件，89 年的事件把它们在一块看，才能了解到，中方态度的变化，余教授刚才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那么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阿诺：非常感谢，您将也很令我们有启发，我想请大家想问问题的人先等一下，因为我先讲一点，就是关于您讲到罗马尼亚的问题，苏联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对罗马尼亚比较担心。当时其奥赛斯库被逮捕了，当时我和戈尔巴乔夫还谈到了这个其奥赛斯库的问题，当时中国有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对于苏联甚至是西欧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担心，李大使能不能请您讲一讲。

李凤林，非常简单的几句，89 年这一段时间，我在保加利亚。还是日夫科的时期，所以后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变化，那段时间我在东欧，我想，方才几位中国同事，就这个问题已经讲的相当的清楚和坦率。我想两个层面，当时中国对东欧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反应，要从两个层面去判断。第一个，就是从感情的这个层面，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感情，那么包括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些国家失去社会主义是同情的。这种感情到现在也有，这个是积极正常的。同时呢，对这些国家为什么共产党失去了政权，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些理论问题，实际上现在都在研究。也许就是像邓小平讲的，我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

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我想是一个层面，就这些问题都还在研究。我想第二个层面，就是从政策，外交的层面，我想讲这个，当时中国的外交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白大使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实际上，最根本的就是在外交这个层面，已经抛弃了意识形态的这个原则，而是用处理国家关系的这种原则，来处理同这些国家的或者变化了以后的这些国家的关系。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尊重这些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五项原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具体的你比如说，丹切夫大使在这里，我们在保加利亚是同事的，偶然钱其琛外长到保加利亚访问的时候，专门还会见了当时的赛德赛，民盟的领导人，反对党的领导人，所以我们是尊重这些国家的现实。所以这个关系的发展的过程，还是比较平稳的。就是这样的。

刘其宝：我们坚持尊重东欧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来表明我们对苏联解体以后，新独立的许多国家，很快跟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

阿诺：这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是我想这是不是和本届会议并不是那么相关，我们刚才很当次提到了保加利亚，是否可以请丹切夫大使，能够从个人的角度讲一讲，和中国关系的一些政策。因为在您的政治生涯当中，大部分是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您能讲一讲保中之间关系您的看法。

丹切夫：那么在 89 年的时候，我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我国的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当时我们的外长曾经访华，那是在 89 年 11 月份初的时候，当时我们领导人之间，有通信。当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通信有一封信，保加利亚的人民已经是家喻户晓。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时保加利亚的事态演变和波兰和捷克的事态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在保加利亚的时候是在 11 月 10 号的时候开了一次党的全会。之后，我们的外长访华，我当时随访，那是在 11 月初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党代会召开前五天的时候我们访华，当时我们和赵子阳和李鹏进行了会谈，也见了钱其琛外长，我就记得，当时在我们的这些会谈中，我家里面还有这些会谈的记录，那么李鹏就对我们的外长说，中国正在开一个中央全会，他们正在讨论经济事务。那么我们说，我们在保加利亚也要开一个全会，也是谈论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李鹏就立刻问我们的外长，他就问了我们外长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是在 8 号的时候离华，9 号的时候我们保加利亚的政治局就开会。我们当时保加利亚的外长就要求把我们和中国领导人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那么我甚至把这份谈话记录，带到这儿来了。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当时我们和中方领导人并没有谈到保加利亚局势发展的问题。那么之后，我们还在莫斯科过境，我们也和苏方有了接触，当时戈尔巴乔夫，给了我们一些积极的信息。然后我们就继续飞到法兰克福，然后从法兰克福回保加利亚。我想说的是，保中关系并未受到影响。没有受到保加利亚内部事务发展的影响。在我们的中央全会上，日夫科夫就失去了领导职务，有新的党的总书记，有新的国家领导人。有新的总理，这是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希望改革，这和一些其他国家的改革浪潮的发展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阿诺：谢谢，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说，要讨论一下保中之间的关系，像您谈的那那样，能不能请卡普拉尼讲一讲，您对于 64 事件怎么看的。

卡普拉尼：我想说，做很简短的几点补充，那就是，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发生改革，我想说是的，刚才我们谈到，当时东欧国家采取了苏联的模式，他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东欧国家的改革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我想他有点这样的说法有点过度简单了，那么当时的东欧剧变，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在之前就进行改革，我想谈当时欧洲的两个事态发展，在 70 年代的时候，欧洲有一个欧安会议，那么当时就提到了一些欧洲的安全和人权问题，那么我想，当时在赫尔辛基召开这次会议，对于东欧之后发生的情况有影响，我们不仅提到了经济改革也提到了民主

化，那么当时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过分强调经济改革，而忽视了政治改革，那么另一点我想提的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苏美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尤其在星球大战计划推出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说的星球大战的计划，苏美之间的竞争最后导致苏联垮台。那么是要大炮，还是要黄油，是当时的一个问题，当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需要进行变革，而且他推行的措施，对于之后东欧发生的事态，也有了影响。谢谢。

阿诺：现在我们请朱大使讲一讲。叶桐大使讲这个问题吗。请你们两个讲一讲。

朱安康：关于 89 年的事，白大使李大已经做了一些说明，他们讲的很好，我想就我当时经过的一些情况，再做一些补充。89 年 10 月份我还在匈牙利。匈牙利整个演变的过程，我基本上看见了。当时已经感觉到东欧可能要出问题，89 年 11 月份我调到外交部，负责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工作。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对东欧剧变的一些变化态度的时候，就像他们两位大使所说的，我们就基于这么几点考虑，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变化过程，不是偶然的。第二点，就是这些事情不管怎么样变，终究是这些国家自己的事情。所以本着我们一贯的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考虑到这些变化是他们自己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提出还是要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第二个就是，我们因为和中苏关系分歧以后，和东欧关系恶化以后我们也得出了教训，就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考虑对东欧下一步政策的时候，也考虑到，就是不能够在意识形态划线了，不管是社会主义也好，将来变成资本主义也好，我们还是要和这些国家保持和发展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定的第二条原则。根据这两条我们处理了这些国家的关系。不久以后，就发生了罗马尼亚的事件。当时我还在家里，听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赶到外交部值班室，处理这个问题，其奥赛斯库被抓，最后一直到被处死等等，刚才有位先生提出来，当时中国是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或者是和他们商量过这个问题，据我知道没有。因为这整个过程我都在那个外交部。我们一直在注意这方面的信息，对罗马尼亚事件，我们怎么表态，我们研究的时候也是这样，其奥赛斯库对中国很友好的，从感情上讲，我们觉得有点过不去。但是从我们一贯的政策来讲，我们觉得对罗马尼亚这个事件，也应该采取对东欧其他国家的态度一样。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保持我们原来的政策。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内是有争论的，也有人后来批评我们外交部，说都杀人了，你们还在那儿尊重人民的选择了，这不是人民的选择了已经。但是我们是总的国家关系考虑这些问题，从我们的原则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不是从感情上来处理这些问题。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两条原则，以后在其他的国家发生变动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的。甚至于包括苏联分裂以后，我们对苏联分裂出来的那些国家，也是这么做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关系，尽管发生这么激烈的变动，但是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没有遭到破坏，没有发生重大的挫折。是比较顺利的发展下去了，而且为以后的双边关系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您讲的话非常有道理，请叶桐大使讲。

叶桐：我很同意卡普拉尼先生讲的，非常的同意。您讲的非常重要，是怎样的导致整个系统在东欧的倒台，匈牙利的变化是一次圆桌会议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暴力，或者说是滥杀贫民导致的。当时在匈牙利的政治气氛，是比较宽松的。就我看来，我们在法制的以及民主的框架之内，民主在匈牙利一直是存在的，可以说天安门事件对于匈牙利的社会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对匈牙利共产党党员的影响也很大。从底层的人民有新的要求，接着呢，匈牙利的当时的领导人就下台

了。

阿诺：当时匈牙利的领导人就在这个事件之后下台了吗。

叶桐：是在6月份的时候，就在六四。这个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匈牙利是怎么看中匈之间的双边关系的。在此后的4年，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进行了选举，在5月份新政府掌权，在这之后呢，这个事件对我们都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匈牙利政府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当时新政府认为，同时也是我们外交部的看法，当时中国的政策是很冷静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关于我们未来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能够保持双边的关系。因为当时在匈牙利出现了一些新的反对党派。他们要求改变和中国的关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改成和台湾建立关系，当时在我们的外交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保护当时我们之间的双边的关系，我指的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且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当时的外交部长收到了我们的意见，当时我是在亚太处工作的。一开始是亚太司的副司长。当时我陪着他来了中国，这次访问在我们的双边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对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印象很深刻。而且也深刻感受到了，中方的友谊。他在华访问的时候受到了友好的接待。

阿诺：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很难就这一点再继续讨论下去了，那么我们先要请东欧两位大使谈一下，之后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了。

罗文斯基：这是人的因素，那时候在波兰，中国驻大使，是我们开玩笑，他是半个波兰人，他的波文是非常好的，他是波兰大学毕业的，特别对解决这时候的问题，就巨大的帮助，人的因素。

罗明：那么考虑到当时89年6月份的中国发生的事件，我们贯彻了这么一条原则，我们对于当时中国事态的声明是重复了当时中国新华社方面的报道。我们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但是不同的地方对中国当时发生的事态，是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在人民中有不同的看法，有许多人就回忆到，他们就回想到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情景。他们就注意到了，当时新出来的很多青年人打出来的标语，是一些应当接受的要求，是一些好的要求。当时我国的人民认为，在对待这些要求的时候，这些要求是好的，但是不应该通过抗议通过上街游行的方式，来推动这些变化，因为无可否认，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大字报这些群众运动的方式，他虽然是一种民主意见的表示，但是这种表示的方式是有问题的。我还记得，在我担任驻华大使之前，我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关系很好，我们之间谈了很多，关于当时中国的事态。他试着要说服美国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态，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中国当时正在进行改革开放。而在89年事件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仍然在进行。所以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他维持改革开放的进程。这才使最后我们有了今天这么一个好的局面。我深信这一点，那就是虽然当时发生的事比较悲剧的事件，尤其对于当时参与的青年人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对于那个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我还想再补充一点，那就是，我还记得，当时戈尔巴乔夫在长城上曾经和中国的学生谈话，我见到当时的一些画面，他们就提到了，苏联的改革和透明性的问题。他要求中国的学生在中国重演他在苏联做的事情，但是这些政策，在苏联引发了什么样的局势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得都很清楚的。在89年的时候，罗马尼亚救援委员会所接待的第一个大使，是中国的大使。我那时重申了中国对罗的两条政策，一个是中国会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另是一个中国继续愿意发展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当时双方呢，都告诉我，他们准备任命我作为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能够得到发展。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想试图影响或

者想更改，罗马尼亚人民，当时做出的决定。

阿诺：非常感谢罗明大使。布加勒斯特当时的看法，对于之后罗马尼亚的事态，也很有帮助，那么刚才我们这一节对于 89 年事件的讨论非常好。给我们非常的启发，那么但是我们可能上面花的时间太多了，但是我们现在就要谈下一个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现在我想提到之前，我们的与会者提出的两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会请沈先生来继续提他的问题。首先我们想把时间往回倒一点，第一个是在 69 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中方的老大使跟我提出，能够再向东欧国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他们认为，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知道一些当时的一些大的看法，但是中国的一些老大使还希望更希望知道当时东欧国家的一些看法，他们当时是否认为，中苏之间的冲突，可以很好处理的，还是当时事态完全可能失控。我想这和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中方解密的文件，是有关系的那就是中国领导人当时有多担心，尤其是在 69 年的夏末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是否认为，他们必须面对苏联迫在眉睫的进攻。那么当时我知道中国领导人当时就从北京撤开，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发生冲突。所以中国领导人当时似乎是把这个威胁，看得很重。他们是把它当真的。那么当时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迹象表明，当时可能中苏全面开战。我们当时离战争边缘有多远。

叶桐：我个人想，这不仅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一种严重的事件，但是他限于地区，就是地区性的武装冲突。因为苏联不会打算发动战争。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占领的国家。假如他有这个设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们不会有这个打算，不会有这个意图。那么中国方面，中国的真实思想，完全是有保卫的性质，不是进攻的性质。人民战争是什么呢，怎么样来保卫自己的领土。因此呢，我们想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很小。

阿诺：非常感谢，施罗德先生，话筒开着，您想发言吗

施：我不想发言，忘记关了。

阿诺：东欧方面还有谁有补充吗。

提问：我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69 年的事件，从苏联角度看待中苏关系来看非常有意思。当时苏联希望重新控制远东地区。但是我刚才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想问，范承祚大使，这是关于毛主席当时也想对远东地区施加影响，当时毛泽东和巴洛库有一个会谈，毛对巴说，他在 6 月份的时候，曾经对日本代表团说，远东地区实际上是中国的领土，这就是我提出的一些材料，我想请中方对此作出一些评论，尤其是当时处理对阿关系的人，比如说范大使。

阿诺：我们现在时间比较紧，有任何人对于 69 年的中苏边境冲突，还想再有任何问题，或者评论吗。那么现在有人想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吗。那就是中苏对于远东地区的争夺关于当时毛泽东说，苏联远东地区是中国的领土的这么一个说法。有谁有评论吗。李大使。

让我再提一下，我们最后要谈的一个议题中方提出的问题，那就是，中苏和中国和东欧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他们之间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先请李大使。

李凤林：这个问题我们这次会不要再谈了，这次会议谈不完，因为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李丹慧教授，他们都很清楚这段历史，所以这个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要谈起来的话就太长了。不谈了。

于洪君：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国和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都出现了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在 64 年的时候，是中国建国 15 周年，当时中苏关系很不好，那么中国方面呢，对于同东欧的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昨天大家已经谈到了，中

国曾经和东欧各国表示，中国和国庆 15 周年的时候，欢迎东欧各国各个级别的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无论是哪个级别，那个层面的。64 年中国希望利用建国 15 周年的机会，维护或者发展一下同东欧各国的友好关系表示欢迎东欧各国党派各种级别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但是事情令人很失望，东欧各国来的代表团只有一个国家来的是一位副总理，其他有的国家来的是工会领导人，有的来的是一个报社的主编，还有来的是一个民间友好团体的负责人，这显然没有给中国应有的回应，但中国方面，还是以党的规格来接待这些领导人，那么朱德，邓小平，中国高层党的领导人，同他们分别举行了会见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当时东欧各国党那么低调对待中国的盛情邀请。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以后，东欧各国党怎么来看待中国和印度的这场冲突的，那么这年冬季，苏联领导人在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中国，然后在匈牙利东德捷克几个党的党代会上攻击中国，紧接着东欧各国党跟着苏联一起反华，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一种协调。

阿诺：我们的先请罗文大使，罗明大使，还有叶桐大使简短的回答一下。

叶桐：中国建国 15 周年匈牙利派的代表团名称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不是什么工会的和其他的，这是国家代表团第一第二，这个代表团的领导人是谁，是政治局的一个委员。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委员，这也要考虑到，第二，您刚才讲就是在这些共产党的党代表大会上，一起攻击中国，这个一起我不太同意，你要好好分析，哪个党的语调怎么样，内容怎么样，另一个党的语调和内容怎么样，不能一律看待。没有什么协调，还有一点，在这里好像，朋友们认为，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环境就缓和了，就是发展双边的关系的条件就在匈牙利不是这样，因为卡塔尔 64 年从波兰，访问波兰以后回到布达佩斯，他在波兰访问的时候，赫鲁晓夫正在那个时候下，伯列日涅夫上台，他一到国内就发表了一个讲话。支持赫鲁晓夫，以后呢，伯列日涅夫从第一天开始，不相信他。因此对匈牙利来说，这个条件并不是好的。

罗文：您知道我们派来一个统一战线的代表团，为什么，毛主席跟日本社会民主党，大概 64 年提出边界的问题，也第一次提出波兰西方的边疆在内，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到中国外交部问，到底你们国界的立场，先我们问的王炳南部长，怎么样，他毛主席说过就是说过，就是退，就好像你们退我们退西方边疆，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基本的问题，就立场变了，我们等三个月，没有你们的回答，回答是什么样的我们领导人发给电报祝贺你们 15 周年的时候，你们回答，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个人，他们强调中国在波兰西方边疆的问题，没有变。不过这个需要三个多月，我们派代表团的时候，还没有你们的回答，关于印度的问题与边疆的问题，我想叶桐已经说很清楚了，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在这样的时间，独立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政策，和我们对亚洲国家的看法和印度的作用，不过不是这个因为苏联强迫我们。

阿诺：罗明。

罗明：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在 64 年的时候，在 64 年 12 月份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告诉我们，中方准备组织更大的庆祝活动，并且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当时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邀请罗马尼亚方面，但是过后几周呢，我们又接到了一条消息，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准备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代表团，所以在罗马尼亚方面呢，我们的代表团是由政府总理率领的，代表团成员还有副总理，以及负责国际事物的秘书谢谢。

阿诺：非常感谢。对不起，我们现在真的没有时间了，我们再下一节的时候，可能还有机会再回顾一下本节谈话的内容，但是前提是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但

是我们在之前，我和章百家先生，会先做一些评论，但是我现在想提及沈先生刚才的问题，就是中方的文件和档案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只有 7、8 分钟了。所以必须非常简短。

沈志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中国档案开放的情况，因为今年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了，虽然只是到 1955 年，而且只开放了这个时间段的档案的 30%，也就是 1 万多件，但是在中国的档案开放的过程来讲，这还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档案的解密，大家知道对于我们学者来讲，我们只能看到有关部门选择过的，编辑过，删改过的档案文件，虽然数量也不少，但是很容易引起出现问题，比如说，1950 年 10 月 2 号电报的问题，就是因为整理档案的人，不知道这封电报，并没有发出去，他不知道毛泽东写好了这个电报以后，收起来了，结果 1987 年就正式出版了，就引起了史学界很大的误解，这个问题一直到 1995 年底，1996 年才解决，因为俄国档案的解密，那么那个时候，在今年以前，我们就从学者来讲，我记得从 90 年代我们一起开会，总有外国学者问中国学者说你们开会带什么档案来了，我从来也没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今天我真的带来了，大家看看，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为什么，因为他开放了，我们可以复印，可以拿来了，我去了四五次了，虽然很有限，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材料，是挺重要的，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甚至在俄国档案馆里也没有看到的材料，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给大家。

还有一个比如说，有 1949 年 6 月 9 号毛泽东给斯大林一封电报，这个是在刘少奇去莫斯科之前，他这个电报非常长，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出让斯大林给中国派 600 多个专家，这 600 多个专家的名单拿出来非常长，而且要求在 8 月份之前就先派 258 人来了，这个材料以前我不知道，在德国档案馆看到过，我没有见到这个材料，以前只知道林彪曾经给斯大林打过电报，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材料，另外还有，譬如说，苏联专家当时到中国来的，回忆录曾经说过，原来斯大林答应是苏联专家只拿和中国专家同等的工资，但是没有任何文件来证明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后来 50 年毛泽东去的时候，苏联态度变了，除了他要拿和中国专家同等的工资以外，你还要补偿给我们一个月 3000 到 4000 卢布，那么这一个条件和 49 年刘少奇去的时候的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文件我找到了，是刘少奇去的时候当然他两个党中央签不是政府签，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一个协定书，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除了给他们工资和保证他的吃住以外，不再给苏联政府补贴金，还有很多了，包括日内瓦会议之前，苏联向中国通报了柏林会议的情况，还有格鲁米克，向中国外交部介绍怎样参加国际会议，包括说话怎么说，穿衣服怎么穿，照相的时候怎么办，等等，还有很多，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中国的人民币，第一次是苏联给印制的。有这么一个协定，所以这些材料呢，还有一些，当然不像档案馆他们有些或者新闻界讲的，这个档案一开放，历史的谜团都解开了，其实我们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毕竟中国档案馆档案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完了

阿诺：非常感谢，现在我很荣幸，能够在外交部的档案馆，从事一些工作，我的印象就是，我们现在的获得的文件，似乎不是很平衡，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我很惊讶听到只有 30% 的文件得到了解密，因为在印度尼西亚的档案馆有关于 50 年到 55 年的档案，那么我们事后对这个问题继续讲一讲，现在我们要对各位再次感谢，因为大家都进行了很热烈的讨论。我很感谢各位提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没有得到时间能进行讨论问题的学者。我们进行 15 分钟的茶歇。

章百家：各位代表，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个议程，请大家尽快入座。最后一个议程现在开始，请各位入座。

我首先讲两个小事情。一个我们刚才给诸位发了联系的表，所有的人的 E-MAIL 都在上面。但是我们发现这里边是有错误的。所以请大家看一下自己的 E-MAIL 是不是正确，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马上来把改正的收走，我们再重新印。

第二个事情，是我们现在有的参加会的学者，一些旁听的同志提出来，我们现在的简历还有一点儿问题，就是各位大使，我们一会儿有一个工作人员，想逐个地问一下诸位参与对华事务的年代，特别是你们任驻华大使的时间，或者是中国大使在哪些时间在驻在国。因为对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最后这一节，讲一讲对会议本身进行总结。首先我们两位主持人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然后我们各位代表可以，如果觉得自己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可以有一个自由的发言，最后我们再请握义泰克（音）教授和我们党史研究室的李忠杰主任做一个闭幕的发言。下面请威斯塔特教授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阿诺：谢谢章百家先生。之前我也提到，这次会议对我们非常有教育。它不仅是在中国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能够有资深外交官，有来自东欧和中国的老外交官，来讨论 60 到 80 年代这一个极具动荡的年代的双边关系，以及之后是如何逐步走向合作的。而且至少我自己觉得，我想大家也有同感，尤其是外方来看。开这次会使我们知道了很多当时具体的细节和史料。尤其是关于当时中方决策的一些情况。那么我想从这儿开始谈起。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在这儿有些突破，但是在 60 年代早期，一直到 89 年的时候，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之间，有几个断点。比如说 1962 年、1964 年，1968 年、1969 年的时候，1976 年到 1978 年的时候 以及 1985 年到 1989 年的时候。对于某一些关键的决策过程，我们还不是特别地清楚。尤其是中方的决策过程，原因很明显，主要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当时的档案，不知道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是怎么做出决策的。我觉得我们在未来有必要做得更好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够把各方现在可以收集到的档案材料，拿到一起来。在东欧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在苏联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知道，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在中国这方面的工作也开始起步。

我两会的时候在北京，当时我就看到两会中有关于透明度和公开信的讨论。要建立一个公开的政府，这是温家宝总理谈到了这一点。那么我希望两会上做出的这些关于公开政府决策的这么一个决定，对于历史，史料方面的时候，也能够得以体现。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中方的同事，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些事，外国人很难起到什么帮助。那么这次的研讨会非常地坦率，非常地有用，也非常地有教益，因此我要感谢各方的大使以及那些曾在外交部工作过的大使，你们在此做出的工作，你们在为档案开放方面，个人起到的贡献，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也希望有之后的关于共和国历史的材料，能够公开。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第二点，是关于东欧方面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的研究，在东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人在东欧进行研究，但是都不太重视当时的历史的现实情况。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我们已经纠正了之前东欧国家只关注东欧和西欧关系，以及东欧和美国关系的局面，尤其对于青年

一代的学者，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和今天与会的东欧方面的老大使进行合作。能够把对于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推向前进。 我还想提到，我们在几个月前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一次研讨会，那是我们第一次把东欧的学者，请到了一起，能够让他们在一起探讨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当时会议的许多组织者今天与会，我应当祝贺他们的成就，我们这次在北京的这个会议，是自那次会议之后，一个最成功的研讨会，我们希望这一个进程能够继续。

第三点也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关于当时的当事人的口述历史，以及他们个人回忆的这一方面。我觉得这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刚才沈志华先生已经提到这一点，那就是如果有一些文献资料之后，在它基础上，再有当事者的回忆，那将是非常好的我们研究的材料。那么关于我们的合作之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可以有深入，这既需要资深外交官，也需要当时决策者的参与，我们知道和君教授和他在北大的同事，正在准备一个中国的口述历史的项目，我觉得如果你们的项目能够和其他的国外的研究机构进行合作，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举。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完善我们现有的史料。现在在中国有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正在逐步纠正，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现在正开始做得越来越好，那就是一方面是外交人员，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前决策者的采访，我希望我们在下一步这方面能够得到突破，能够做得更好，趁他们还在世的时候，能够采访他们，令他们对当时的历史事件做出回忆，因此我对于刚才赫斯伯格教授提出的倡议表示欢迎。他希望当时的一些历史决策者，能够把他们当时的决策过程进行口述，能够让我们记录下来。如果有了这些资料的话，当时的历史事实就会清楚很多，如果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不然的话，这个机会失去了就太可惜了。

最后一点呢，是想对中国和东欧方面的老大使和当事人，对你们说的。你们愿意过来参加这次会议，来探讨这样一个敏感的并且有疑点的问题，我对你们非常感谢，问题是，即使你们愿意谈，你们可以谈得多深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有很多人大家都非常友好地，像同志般地谈论你们之间的双边关系。那么我想应当感谢你们，能够这么积极地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刚才我就指出了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以及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们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有三天的会期，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今天到场的许多学者，如果你们觉得章百家先生或者我没有给你们足够的提问机会，那么对此我会表示道歉。但是中方和外方的学者都有机会提到一些问题，并且你们现在也和当事人之间建立了联系，你们之后还可以继续这样的提问，可以继续进行各方面的合作，这次会议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章百家：下面我来做一个关于会议的小的总结。从我会议组织者的角度。我自己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在我的研究中，我感觉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就是这个研究是很不平衡的。我们对中国和大国的关系研究得比较多，他么其他方面呢，相对地来说，都比较薄弱。而其中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是中国和东欧的关系。当然也不仅仅是和东欧的关系，实际上也包括西欧的关系。我希望这种状态能够有所改变，这也是我们愿意选择这么一个题目，来开始我们的研究。而且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们需要一个更平衡的国际关系。在将来的国际关系中，不仅大国要发挥作用，小国同样有它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二点呢，是在外交工作中相互了解的重要性。过去双边关系基本上只是一个外交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事方很少有机会通过对话，来回顾这个过程。我想这将会使我们所有的人，丢失很多学习和积累经验的机会。所以开一个会，能够让当事人做一些历史的回顾，同时也让研究这个历史过程的人，来参与当事人的对话，他们可以了解到以前许多不太清楚的事情。而相互了解中，对于外交工作来说，相互的了解是一个软的文化背景的方面。没有这样一种软的比较深入的了解，实际上就不可能真正地明白对方政策的含义。也不可能制定正确的自己方面的外交政策，所以我想呢，做这种历史回顾，不仅对历史学家有意义，实际上对现在处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传统的做法，特别是研究外交史，主要是依靠档案。这使得外交史的研究和其他的历史研究，就有了一个差别。因为其他的任何历史研究，大概不会有外交史这样完整的档案，这也使得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外交史不是真正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感到，档案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还需要当事人的感受。因为档案并不能反应整个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不能反应当事人的一种直接的经验。所以现在的历史研究里，越来越重视口述史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我们的这个会议，说实话我们是希望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总的来看，我们这次会议，实际上我们的外国朋友，准备了大量的关于东欧国家的档案，那么这部分档案呢，我们会后会非常认真地利用它们。现在中国方面档案开放已经开始起步，但是还不能和我们这个会议配合在一起，它仅仅是比较早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我们是把这两个方面正在尝试着结合起来。关于这次会议，我要特别感谢来参加会议的当事人，我们的大使们。我感谢你们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我想不管是中方的大使还是外方的大使，他们都是做了很多的准备，而且询问了他们的同事。这点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会议的组织者，非常感谢。我想这次是学者跟外交官的对话，这种对话可能外交官跟学者，由于工作关系，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习惯，学者们更喜欢直接了当，更希望一下子就接近事情的核心和细节，但是外交官们更讲原则。在表述的时候，经常更婉转。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我们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可以以继续的方式，也许适当的时间，我们会选择其他的题目，或者延续这个题目，再召开一个会，至少我们可以通过E-MAIL 进行比较多的联系。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将来可能有更多的相互的访问。下面我想就请参加会议的各位代表，谈谈你们的想法或者建议。

陈兼：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同时也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和各位大使。中国方面的大使和东欧各国的大使，给我们历史学家上了一堂可。我在这里有几个建议和枪法。第一个建议呢，是对我们大使们的，我觉得大使们都应该写回忆录。这个写回忆录。是为了你们自己，这是你们多么重要的一段经历。是为了你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在你们生活当中，你们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主要部分的精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是为了历史。秉笔直书，不一定现在一定要出版，但是要把它留下来。这也会使你们退休以后的生活，更有意义。

第二个我就想讲，为了历史，因为这是对我们学者来讲的一个话，我记得第一天开会的时候，李凤林大使，曾经提出了四个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所谓个人影响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同东欧关系这一个特殊的领域来讲，更广大的层面，从中国同整个对外政策关系的发展，以及同这个对外政策关系相关的国内变化来讲。而且再进一步来讲，同整个冷战和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发展来讲的话，我想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一个就是说，三个人物，我们在这里面没有对它专

门的讨论和论述，特别重要，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邓小平。可以这样讲，60年代到80年代是中国由一个革命国家，处在世界体制之外，或者说从各种意义上来讲，向各种体制挑战的国家，到外来越进入到这个体制之内的国家，这三个人的作用那是不可忽视的。毛泽东为什么刚才讲到了64、65年，中苏没有和解，很大程度是毛泽东，我不想讲。但接下来的话，从中美缓和，毛泽东又以他特殊的方式，为中国重新进入世界，搭了一个桥。而当中国是革命国家的时候，中国仍然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理性，那是由于周恩来。而邓小平，让中国重新进入世界。而且在世界上，起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应该起到的作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后就简单地讲一讲，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当中，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命运问题。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想这是作为学者我自己的一个感受，现在来讲的话。社会主义到二十世纪的兴起到最后的变化，它的整个命运表现出的是，它本身来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历史震荡性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最后在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但是它的遗产，是不能够仅仅以社会主义本身的成功和失败来估量的。因为今天即便在现代资本主义当中，处处都糅合着社会主义的巨大影响。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问题的话，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思路会更加开阔。对理解中国的经验，和它对世界，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也可能能够得出更加全面的看法，谢谢。

赫斯伯格：非常感谢，我同意两位协调人刚才的发言。就是这次研讨会非常重要。并且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中国的档案，能够为我们未来的讨论定位，并且能够提供信息，并且看我们如何能够继续推进这次研讨会所开始的这一个合作的进程，能够让当事人能够在一块儿和我们探讨。不仅能够探讨中苏关系，也能探讨中美苏的三方关系，因为布尔金斯基和基辛格先生现在都还在世，但是可能请他们到北京来比较麻烦。但是趁当时的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可以抓住时机，很好地能够推进口述历史的研究，这样就可以为历史留下遗产，并且能够为我们现有的文件档案进行一个补充。

我再想提一点，可能对党史研究室也会很有帮助，那就是在美国，绝大部分的美国政府在他卸任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要采访所有的当事人，那么如果大家去看约翰逊博物馆，以及肯尼迪博物馆，他们那儿有上百份的采访记录，他们很多从网上就可以看到的，而且很多是在该政府卸任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做出的。那么如果能够知道这些档案的话，那么至少对于党研室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非常有益的视角，我也希望贵方能够对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可能一开始还不能公布，但至少能够保存下这些资料，让我们的后代能够读到。或在我年老的时候可以读到。我们这个研讨会会有老大使，有学者参加，其实我们还需要档案，如果把这三方都能够使他们坐到一起来，那么我们的研讨会可能就会更加成功，我还想感谢我们的译员，我和一些双语的学者不一样，我们几个人都需要他们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翻译服务，以能够跟踪会议的进程，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说，我非常高兴能够与会，谢谢大家。

叶桐：我首先感谢东道主，他们招待我们非常周到。为我们预备了良好的条件，为了进行这个研讨会。而且研讨会我想，我看还比较成功。我也有三点看法，在这里要讲。一个是我们的过去是共同的。因此呢，来研究这个过去，也应该一起做的。要不然你得出的结论，肯定会是片面的。

第二，因此我建议，我们要继续这个对话。

第三，我完全同意陈兼先生的建议，我认为当事人应当写回忆录，但是我还建议，写回忆录的时候，一定要查档案。避免主观性，谢谢。

罗明：我能够出席这一国际研讨会，感到特别地高兴。我深信，我们这一次国际研讨会的讨论，不仅仅对澄清一些历史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积极的贡献，同时对增进我们所代表的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也做出了同样的积极的贡献。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向组织者、机关、组织和人事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

章百家：谢谢您。沈志华。

沈志华：感谢的话，大家都说了很多，我就不说了。因为我还要麻烦在座的外交官和大使，刚才我已经联络了很多人。我提两个建议，对以后的工作。一个建议是跟我们这次会议直接有关的。我们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国和东欧的关系，但实际上从 20 世纪后半半个世纪来看，中国、苏联和所有的东欧的国家，他们都面临着两个问题，国内是改革的问题，国际上是个冷战的问题，因为它处在这么一个两个集团对立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研究者的思路，应该顺着这样两条线索来考虑。我们就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考虑到 50 年代的事情。我指的是 1956 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对中国和东欧国家改革的一个起点。是一次失败的，遭到了扼杀的改革。东欧的国家是一个情况，中国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这个详细的过程我就不讲，大家都有研究。但是现在这里面很多问题，我知道我们俄国的、匈牙利的档案已经公布了很多。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我今天私下问了几个问题，我看到一个材料，1956 年 11 月 1 号晚上，卡搭尔在离开匈牙利共产党总部以后，就去了苏联的军营，然后就去了莫斯科。但是在这个之间，他见了一次中国大使。我们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怎么谈的。那么卡搭尔态度的突然转变和中国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就很大。还有在波兰事件当中，10 月 19 号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向华沙的进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里面有没有中国的因素？现在我们在档案文献当中还找不到明确的或者准确的答案，就需要我们的当事人他们的回忆，来和档案文献进行结合。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能够下一次把这个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讨论波匈事件。

第二个建议是，我还想搞一次中苏关系的，像这种形式的讨论会。因为这次我们谈到所有的问题，都和中苏关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中国的发展道路，至少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是离不开苏联的，是离不开跟苏联的关系的，而在这里边我们也有很多问题，现在不清楚。所以在座的现在搞冷战史的几个重要的机构的代表人物都在这儿。握意泰克，克李斯汀走了，还有国家档案馆的，陈兼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学中心做主任

陈：我哪有什么主任？

沈：我封的。中国还有一个中心在北大，大家都在这儿，我们想是不是可以考虑下一步的问题。完了，谢谢。

李向前：刚才陈兼教授是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是从二十一世纪这些大的人为发展的角度来谈我们这次会议。我没有他那么宏大的眼光，我们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角度来谈这次会。我觉得尽管我们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但是大家经过了两天会议，可以发现，我们尽管是中共中央的一个研究部门，但是我们是有着对外开放，希望广泛的，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交流，来丰富我们自身的

发展的。尽管我们门口站着解放军的警卫，但是不像冷战时期那样，没有铁幕也没有竹幕，因为我在一开始开幕式讲话也说，这是我们党史研究室的许多个第一，我希望刚才像威斯塔特教授讲的，我们还需要和来自世界的许多国家的学者，和我们这些尊敬的老大使们继续合作，我们会张开我们的臂膀，欢迎大家，我们会尽量和大家密切合作，来共同繁荣我们学术的领域。我没有陈兼那么高远的，他是冷战中心主任，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谢谢。

牛军：非常荣幸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能够一睹来自东欧国家的很多前辈，这些外交官的风采，确实学习到很多大概有时候也不是说听到了有关历史事件，我在这儿一直想像，当年中国和东欧这些外交官他们是如何相处，如何打交道的。可能有一种文化气氛，是我们没有办法从历史事件陈述中，直接看到，而是一种感受。我在想，因为通过这样交流呢，整个这个过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是大大地超出我的想像，就是会议的成功程度。这里面我想，其实大家可能都有共同的想法，我现在看来，我又一次感觉到我们现在的中国外交的研究，一定要更多地交流。一定要有跟多交流，我们不能仅靠中国的档案，中国的档案已经很不够，如果我们仅靠自己的档案，有很多问题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对对方的理解，很多问题的产生，我觉得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学者要加强同外交官的交流，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外交，不是档案上的外交，而是真正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第二个进一步讲，因为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我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口述史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资料，就是那些录音，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有些可以发表，都要根据当事人是否同意，沈志华、李丹慧也参加，有很多年轻的教师和学生，都参加了这个工作，国际关系学院也提供了到现在为止还是相当充分的财政支持，但是我们在采访中也遇到了大家可以理解的困难。我现在想不了很具体，我希望找到一个方式，渠道，能跟国外的口述室机构，能够建立密切的关系，能够对这些口述的资料，真正鉴别它们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帮助我们研究。

最后一点我非常感谢党研室会议搞得这么经错，让我们有这么多收获。最后一点，希望有关这次会议整理的资料，能够让我们分享，不要进档案馆。谢谢。

章百家：我简单地回答一下牛军的过程，我们这个会议过程有速记，有录音。我们外方在会后将负责把整个的英文的记录整理出来，中方负责把中方的记录整理出来，我们在考虑以什么方式向参加会议的人提供，我想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因为我们的会议本身就是透明和公开的。最后我想请范大使再讲两句。

范承祚：开始我得到通知让我参加会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大相信。我说主办单位什么单位，当时我正在美国探亲，去年的时候。让我回来以后干这种事，就是我对面的刘大使等这样的同事推荐我的。当时中共党史研究室办这个，我说跟他们好像不对路吧，还不理解。我现在理解了，什么呢，何谓开放，何谓全面开放，连中共党委研究室都要办这样的事情了，好事。这是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体会，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凡事预则立，凡事情有准备就成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党史研究室第一次办这样的事情，我用了三个全字，我说第一个叫做全神贯注，我不知道好不好翻。第二个叫全力以赴。第三是全心全意。从上到下，从主任一直到下面的基层到厨师，真是，我那天跟我的同事讲，咱们给它挑挑毛病好不好，挑不出来，对不起，凡事欲则立，我很受感动，表示感谢。

第三点呢，就是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三个臭皮匠变成一个诸葛亮，就是三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智慧出来就不凡了，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有大智大慧的这样一个人。他真是出将入相，出去时候可以统领百万大军，回来以后当皇帝以下的最高的官员，治理全国，井井有条的。现在不是三个臭皮匠，在座的都是大使们，学者们，这个加在一起能量就可观了，所以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如果说我也发个言的话，我只是各个涓涓细流，大家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长流了，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我万万没想到，我的年龄将近 75 岁了，居然我现在感到有压力。幸好我的血压不高。为什么有压力，会开的时候有压力。陈兼教授让我们写回忆录等等的。这样子就打乱我退休生活的计划，我原来的生活内容。我跟你们说，我退休我可没有休啊，我每天都似乎在上班，我给自己定出的中国字叫八字标准，外文就叫四字要求。一个叫听听，一个叫写写，一个叫讲讲，一个叫走走，这四个字，有时候这四个字把它位置颠倒一下，比如跟北京大写合作，我也到那儿搞过讲座，讲过课，有的学校一讲过，我讲遍了大江南北，讲讲国际形势，我写了好多诗把我的主要精力写了两千首诗，我出了厚厚的诗集，一次又一次地写。怎么办，难道我就服从陈兼了，好像我要把注意力放在我头脑里，就像翻译的内容一样，还有他们杂志的主编也找我写，我的注意力有转变了，我感到有一股压力，总之一句话，我这次开会是有收获的，我适当地讲了一点，但大量地我听了一些，我觉得这几天，没有白白地在这儿待着，吃了那么多饭，更多地装了不少知识，谢谢谢谢。

阿诺：我们是不是能够请阿尔巴尼亚总统外使顾问，他可以请范大使去阿尔巴尼亚，并且可以看一下阿方的档案，然后再写回忆录。

？我参与了这次会议。我是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中心工作，我们之前也有一些类似的研讨会，比如说在古巴，在越南，在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但是我想说，我们过去的一些精力，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政府，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像刚才范大使实际提到的，但是他们一旦熟悉了这样一个概念的话，就是在一个合适的学术环境下，我们的研究不会对任何人、或者国家的利益产生冲突，或者施加威胁。而是可以为当事各方以及国家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的学术活动，是非常值得的。也是值得参与的。但是作为学者来说，我认为最有教益的就是，它可以给我们多一个视角。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还能同时反应当时当事人的想法和意见，我们希望这些大使能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们的同事。那就是这样可以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中国的学术研究，提供很多的帮助。我在这儿要感谢中国的主办方，给我们提供的帮助，给我及我的家人提供的帮助，我也非常欢迎这一个研讨会，它就让世界学术界更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声音，谢谢。

沃尔泰克：我看大家都说得那么好了，我很难再说得更好了。这次研讨会真的是非常成功，我同意大家刚才的许多分析的，这次研讨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经验，我再想补充几点。我自己对这个研讨会非常满意。这是因为我现在主持的平行史的项目，之前在开幕式的时候我就讲了，在之前我和我的同事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希望在欧洲办这些研讨会，但是当时我们在欧洲遇到了一些困难，在中国可能办这样的研讨会吗，在中国办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疑惑，而且我觉得我当时这样说，有道理，但是我想现在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另外我还想借此机会，来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的平行史项目，特别适合于作为一个中介，能够在此次会议之后，和大家通过邮件来联系，能够继续更多的合作项目，在未来展开，我希望可以办更多的研讨会。而且我也想，更多地有中国的学者，以及东欧的外交官，能够参与更多的各种活动和研讨会。能够参与我们主办的一些项目。你们既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也可以以机构的身份参加。我惊讶于我们谈话的轻松的程度，大家交流都没有障碍。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代表着不同的机构。而且我们中很多人之前都没有见过面。但是这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中方同事，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我们这次的会谈如此地顺利。也许我们有很多参与者是外交官，这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交流。刚才陈兼先生说，他提到了邓小平先生的贡献。他改变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使它变得更加务实，他很有理性也很有勇气。我想这两点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和中方同事所进行的这些讨论。我觉得这也是这次会议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最后我想说，我们很多外国人都愿意到中国来，中国是一个大国。它有很多的事物，也非常有经历，有很大的成就，而且有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未来。党研史就展现了中国的这些特点。我们希望贵机构可以展示更多的这方面的特点，说到这儿我要特别向我们的主办方表示感谢。我们的所有人，都从心底里感谢你们的组织。非常感谢。

章百家：我们党史研究室的李忠杰先生，一直在听我们的会，我们把我们的最后的机会留给他。

李忠杰：女士们，先生们，刚才各位发表了内容非常丰富，而又热情洋溢的讲话。下面呢我作为会议的东道主再讲几句。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准备，特别是这两天紧张而又有序的工作，我们这次国际研讨会就要结束了。从大家的评论来说，我们确实感到这次会议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成功我感觉一个首先是形式上，这次的形式是通过各方的努力，邀请到了东欧国家当年驻中国的外交官、使节。还邀请到了中国当年驻东欧国家的外交官，同时还有很多学者，有造诣的学者。所以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奠定了我们会议良好的基础。昨天我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也说过，这么多老大使，新大使的聚会恐怕是很难得的。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讨论的平台。成功的第二点，应该说内容上。这次会议的内容很丰富，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我们梳理了20世纪60到80年代，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发展的历程。探讨了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当时各个国家政府处理的原则，方针和一些具体的做法。通过交流，各自都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当时对方的立场和做法。加深了理解。所以就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历史是负责任的。我们对历史的研究是有进展和成功之处的。第三个，会议开始，我们的有关先生们，都谈到了，与会的各位基本上是素昧平生的，或者说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的。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聚到一块儿来了，原来认识的，叫做一回生两回熟了，没有认识的现在成了熟人了，朋友了。所以在会议期间，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加强了沟通，加强了交流，增进了友谊，增进了感情，所以这应该看作是会议的成功之处。对这样的会议，我们感觉应该是不错的。当然了仅仅两三天的时间，你要说把这几十年的历史，这么庞大而复杂的历史完全搞清楚，甚至想写出一本几十年的编年史，那当然是很困难的。这需要我们继续持久不懈的努力。但是呢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基础性的工作，为

我们更深一步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呢与会的代表们，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兴趣和爱好。或者说想知道不同的内容，要全面地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当然也还是困难的。但是这次会议它不在于满足哪一个人的，或者哪一部分人的愿望，而是说，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我们的当事者们，我们的外交官们，能够坐在一起交流了，从一个层面，丰富和完整了一个历史过程，这时候它的贡献，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要表示感谢。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使大家感到比较满意，应当说是所有与会者和与会者背后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或者说有些部门的支持，努力。所以我们首先要感谢东欧国家驻华的外交官们，你们很辛苦。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中国，有的年事较高，有的身体还有不便之处，但是都克服困难，来到了，我们很高兴，也很感谢。还要感谢我们中国的外交官们。他们虽然说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实际上还从事着很多繁重的工作，有的大使们还推掉了一些重要的会议，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事先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很精彩的发言。很深刻的发言，内容很丰富的发言。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很大。所以应该表示感谢。

我们还要为筹备和组织这样一次会议，我们的若干的组织者，国外的朋友们，苏黎世大学的朋友们，华盛顿的朋友们，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朋友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联系工作，沟通工作，把这么多人邀请到一起来，共同探讨，应该表示感谢。当然还有我们国内的有关部门，对于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很多的帮助，使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包括邀请外方代表与会都是有一些程序的。但是在走这样一个程序的过程当中，由于有关部门提供了方便，外交部，中联部，外办等等提供了方便，使我们很顺利地克服了一些困难。当然还感谢为筹备这次会议，我们的很多工作人员，付出了大量的辛劳。速记、翻译，以及住宿，食、交通等方面的人员也提供了很周到的服务，所以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应该说是所有各方面，各位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除了这个会议，对会议本身组织的有关各方表示感谢之外，我还特别提到，从各位大使这两天的发言当中，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无论是东欧的驻华大使们，还是中国驻东欧国家的大使们，当年或者现在，为了发展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友谊，维持这样一个关系，发展这样一个关系，改进这样一个关系，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从发言当中，从大家的所举的很多生动的事例当中，我们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特别要感谢，各位大使，为发展中国与东欧国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友谊，所做出的贡献。这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点，意义，我觉得这次会议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我们通过这样的交流，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描述。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解读。这是一个意义。再一个意义呢，我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要尊重它。但是我们研究历史，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现在，使我们的未来，发展得更加美好。所以从这个历史当中，我们能得到很多重要的启发，能取得很多重要的经验，正如刚才这两天，大家在讨论当中，交流当中，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借鉴着总结的经验教训，认清了这些，对我们今后更好地发展各国国家关系，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有益的。而且作为学术研究来说，举行这样一个多方的国际交流会，应当说对于我们升华学术研究，是很有帮助的。中国学者有中国学者的特点，国外学者也有国外学者的很多特点，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对于我们深化很多问题的研究是有帮助的，尤其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很需要也很愿意向国外学者们学习。所以这次会议，在这

方面应该说，也是有意义的。

第四点，启示。通过会议，通过讨论，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这样的启示是很多很多的，我常常在想，人类历史是什么历史呢，可以从很多方面概括，但我想能不能说，人类历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文明和进步不断发展的历史呢，我想也许是可以认为的，人类的文明不断地由初级向中级向高级向更高的级别发展，在这样过程当中，很多国家、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国，小国，中国，应该说都是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献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呢，应该说同样也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的。中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的。东欧国家同样也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感受到。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如何对待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有时候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我们可能会发生误解，会有一些分歧，会造成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学得更聪明一点，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文明也许是很好的，但是也是有不足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学习。其他国家的文明，是不是也需要进一步前进呢，应该说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共同的在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以自己的研究，来促成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使我们的人类文明发展得更加美好。所以我们的研讨会，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一个小小的角度，也许是大海之中的一滴水，但是我们只要朝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我们是能够取得成果的。我们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各国学者们之间的关系，是能够不断地得到改进的。也许还有更多的启示。但是我对这一点，感受特别深。

第五点，希望。这次会议就要结束了。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前进路上的一步。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走今后更长的路呢，我想是需要的。所以我需要通过这样一次会议，我们的外交官们，我们的学者们，我们的外交官与学者们，我们党史研究室，和国外的包括美国的，欧洲的，东欧国家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机构、单位，进一步加强联系，共同探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交流，丰富我们对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在这方面，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开放的。中国的二十多年来的大政策，就是小平同志所创造的，改革开放。中国是开放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同样是开放的。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也同样是开放的。如果说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的话，但也许做得还不够，如果说过去我们做得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努力，所以我们欢迎朋友们，给我们以支持，我们将乐意更多地参与国际学者们的交流。当然，通过这样的会议，我希望我们学者们，外交官们，互相之间也可以进一步加强交流。

最后一点，祝愿。会议就要结束了，我们祝愿与会的所有代表们，在北京的生活愉快，如果说还要到外地去参观考察，祝朋友们旅途顺利、平安。祝各位代表们，回国以后，在自己的事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功。祝各位的家庭幸福、美满。我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也许这又占了大家吃饭的时间，所以最后一句话，应该说是表示深深的歉意，谢谢各位。

章百家：在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之前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务的后勤部门的领导，他们为我们会议的成功举行，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位萧志贤先生。他负责我们的会场和我们的整个的音响设备，第二位冯国胜，冯国胜先生是我们这的技术处的主任。第三位是冯子辉先生，是我们餐厅，负责我们的餐饮。他为我们准备了非常好的饭菜。还有一位是刘丽萍女士，是我们小宾馆的经理，我们还

有会务组的两位，徐懿堂（音）跟陈鹤，最后我请我们两位翻译从他们封闭的小屋子里走出来，一位是孙宁，另外一位是张蕾。他们出来之前，我们还有两位速记，他为我们的全部会议做了整理。现在我们的会议，顺利闭幕了，请大家去用餐。